文物

WEN WU

FINE ARTS
DS
1701
.W46
1960 3

一九六〇年 第三期

目　录

一九六〇年第三期(总第一一五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表声明严重警告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
　我国在台灣文物的盗劫行为! …… (7)
美帝国主义企图劫夺我国在台灣文物的新阴謀 …… (8)
美国慣匪,住手! ……本刊評論員 (8)
首都文化界著名人士集会拥护文化部声明,强烈抗議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徑…… (10)
譴責美国图謀劫夺我国文物的罪行——首都文化界五百四十多人发表抗議书 …… (11)
戴着"和平"面具的强盗 ……郭沫若 (13)
不許美国政府劫夺我国在台灣的文物 ……茅　盾 (14)
制止以"展覽"为名的掠夺行为 ……陈　垣 (14)
斬断美帝国主义伸向台灣的黑手 ……翦伯贊 (15)
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地文化界人士及历史、文物机关工作者紛紛集会反对
　美帝劫夺我国文物 …… (15)

*　　*　　*

鼓足干勁,配合水利建設工程,开展长江流域的文物工作——在长办文物考古队
　队长会議的讲話……中共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委員会第二书記 李廷序 (18)
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議通訊 ……启　益 (19)
对于配合国家經济建設的文物考古工作的几点意見 ……王书庄 (21)

*　　*　　*

湖南古代墓葬概况 ……高至喜 (33)
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簡报 ……湖南省博物館 (38)
长沙柳家大山古墓葬清理簡报 ……湖南省博物館 (51)
长沙赤峰山2号唐墓簡介 ……湖南省博物館 (56)
略談长沙的五代两宋墓 ……周世荣 (59)
长沙太子冲文化遺存 ……周世荣 (64)
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調查記 ……湖南省博物館 (67)
从两次調查长沙銅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 ……馮先銘 (71)
介紹几件从廢銅中檢选出来的重要文物 ……湖南省博物館 (75)
湖南的文物工作 ……高至喜 (77)

*　　*　　*

浯溪 ……湖南省博物館 (79)
岳阳楼 ……刘与为 (80)
南岳 ……湖南省博物館 (82)

*　　*　　*

北京鲁迅博物館开展业务工作的几点体会……北京鲁迅博物館 (86)
"楚公蒙戈"辨伪 ……于省吾　姚孝遂 (85)
瓷器淺說(續)……馮先銘 (87)
文物工作报导(8則)…… (90)

封面: 长沙金盆岭9号墓出土的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青釉对坐书写俑

插頁: 1. 首都文化界著名人士举行集会,热烈拥护我文化部对美帝阴謀劫夺我在台文物所提出的严重警告和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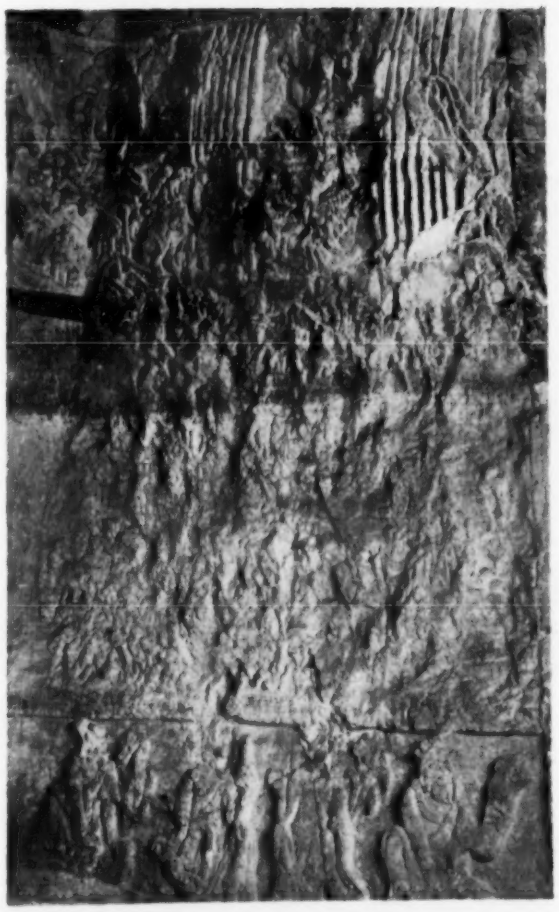
2. 美帝国主义盗劫我国文物的罪証

美帝国主义必須停止盗窃我国文物的勾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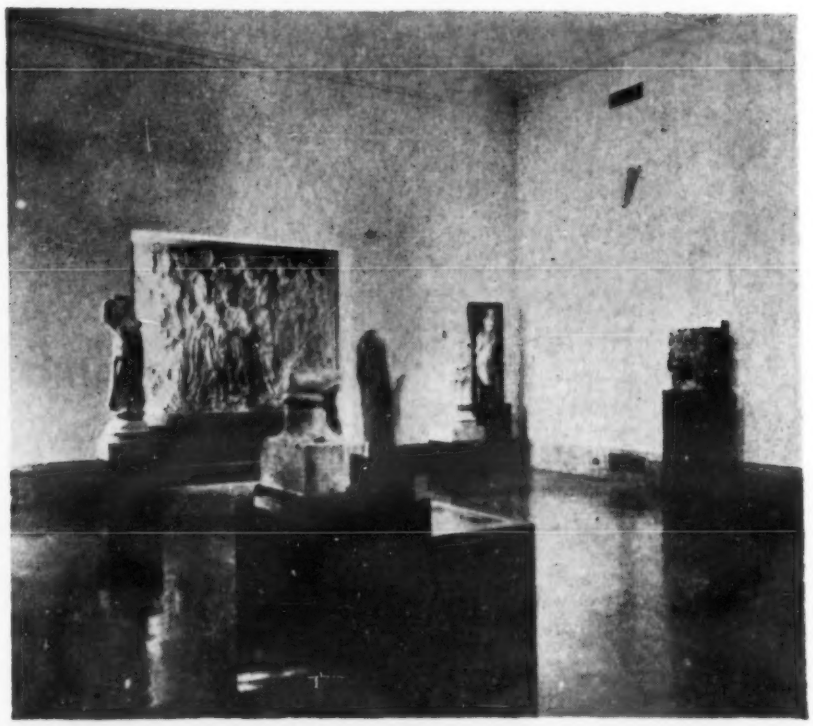
首都文化界著名人士举行集会，热烈拥护我文化部对美国政府阴謀劫夺我国在台湾珍貴文物所提出的严重警告和声明

美帝國主义盗刼我國文物的罪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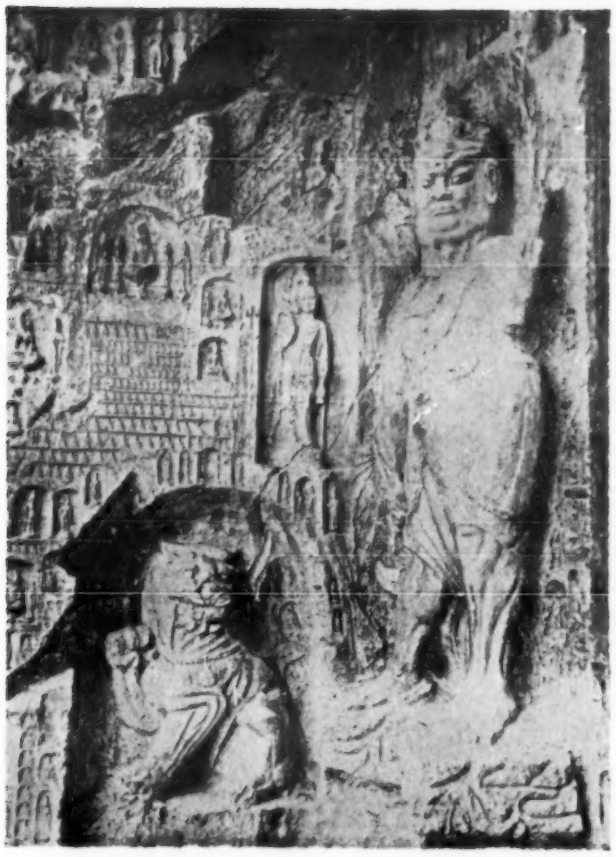
龍門賓陽洞北魏石刻浮雕皇后礼佛圖



皇后礼佛圖被盗走後的殘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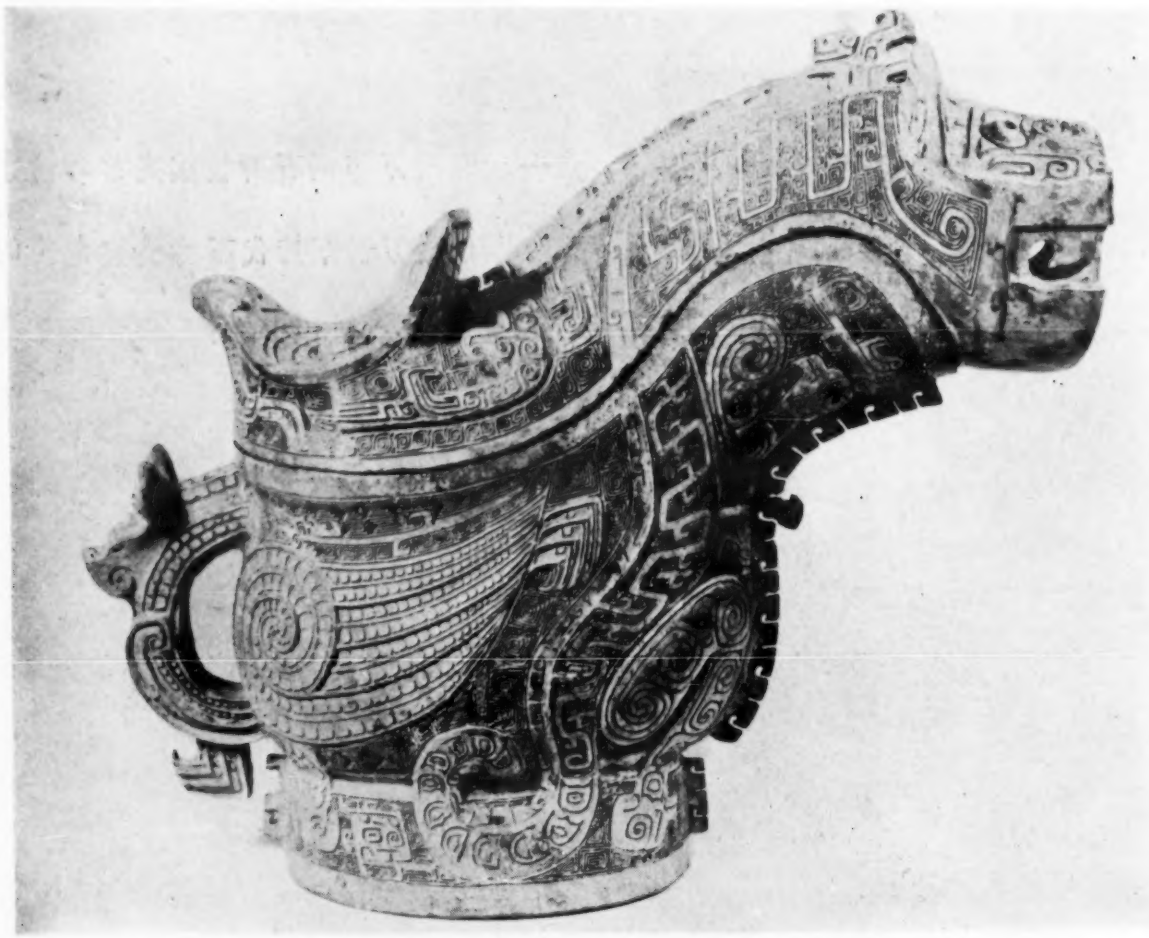
皇后礼佛圖被美帝盗走陈列在美國堪薩斯城納尔遜藝術博物館內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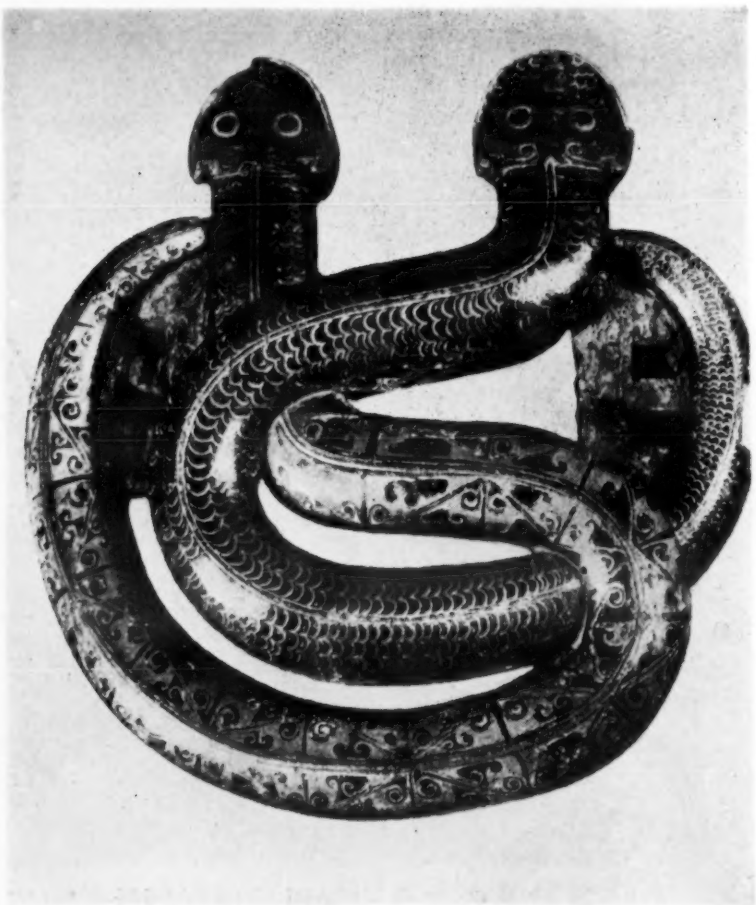
← 龍門万佛洞石獅被盜走前的情況

↓ 龍門万佛洞唐代石獅被盜走後的殘痕

被美帝盜走的龍門唐代石獅及其他石刻陳列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內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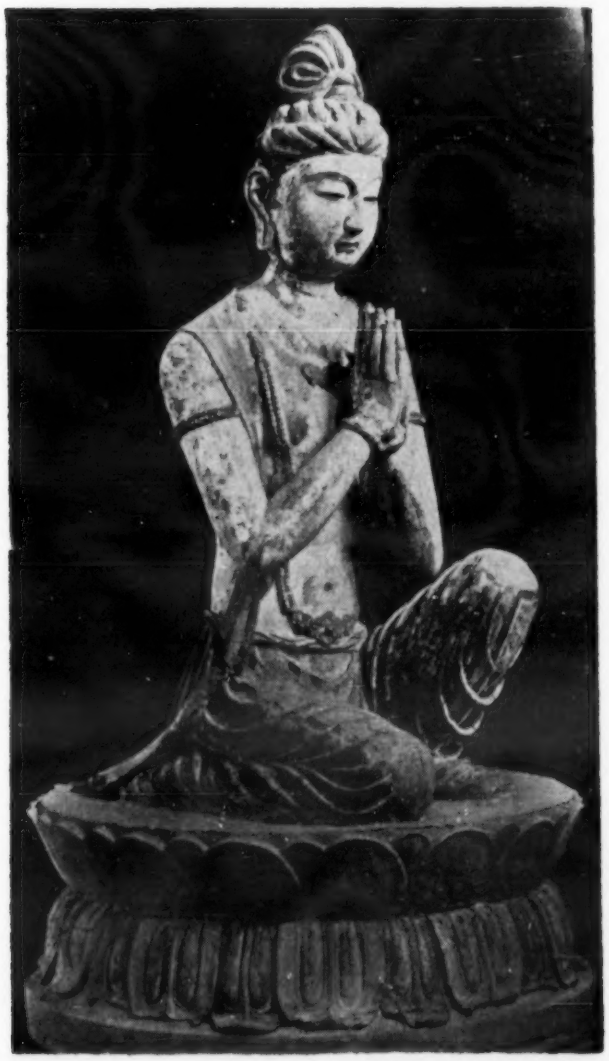


被美帝盗走陈列在美國哈佛大学福格藝術博物館內的商代銅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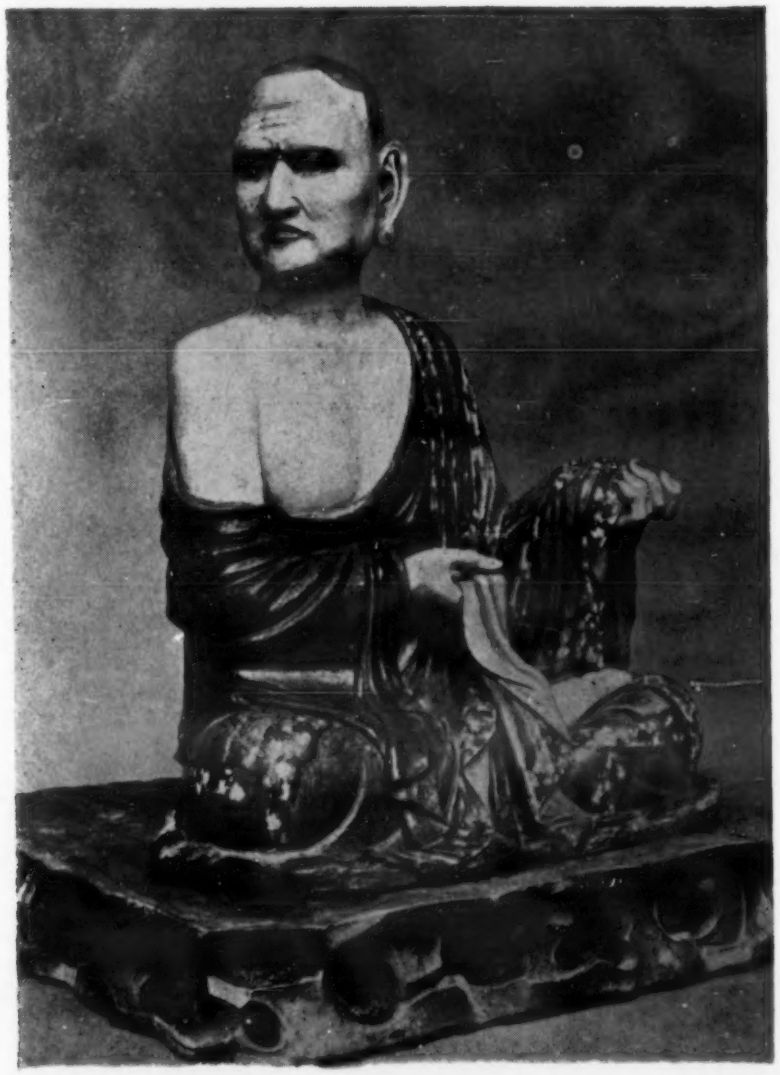


被美帝盗走陈列在美國克利夫蘭城克利夫蘭美術館內的長沙出土战國彩繪木雕双蛇座对鶴（右圖为双鶴下的蛇座）

被美帝盗走陈列在美國哈佛大学福格藝術博物館內的敦煌320号窟唐代壁画



被美帝盗走陈列在美國哈佛大学福格藝術博物館內的敦煌 328 号窟泥塑供养菩薩



被美帝盗走陈列在美國紐約市藝術博物館中的河北易縣宋代三彩釉陶罗漢像

被美帝盜走陈列在美國費城大学博物館內的南朝石辟邪

被美帝盜走陈列在美國費城大学博物館的河北南响堂山隋代石佛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发表声明

严重警告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我国在台湾文物的盗劫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美国政府阴謀劫夺我在台灣的大批珍貴文物提出严重警告，并且发表声明，声明全文如下：

2月12日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頓发表声明說，美国同蔣介石集团已經达成所謂“协議”，准备把蔣介石集团在解放前劫往台灣的大批珍貴文物运往美国，并且已經由蔣介石集团的所謂駐美“大使”叶公超同美国国立美术館秘书凱恩斯非法签訂了“合同”；蔣介石集团的“行政院新聞局发言人”也于同一天在台北发表卖国談話，証实了美国这一盗劫勾当，并且說这批文物即将由美国軍艦劫运去美。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特提出严重警告，并且发表声明如下：

解放前数十年中，美国統治集团一直不断地劫夺和破坏我国的文物，如敦煌、龙門等地的艺术雕刻和周口店猿人头骨的被劫夺，使我国历史文化遺产遭到严重損失，此外，还有抗日战爭期間中国政府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館的善本书籍一百零二箱（二千七百五十五种）和居延汉簡一万余片，至今尙未归还。这一次企图盗劫的是我国在全国解放前夕被蔣介石集团盗运到台灣的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等精华部分。据知这批文物主要包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即解放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南京图书館（即解放前中央图书館）和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即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組）等机构的重要收藏。这些文物都是我国历代相傳的繪画、墨迹、瓷器、銅器、玉器、陶器以及抗日战爭前安阳、浚县、輝县等地的考古发掘品（包括安阳出土的刻辞甲骨），还有宋、元、明善本书籍和文淵閣四庫全书等。这些珍貴的文化遺产，都是我国人民数千年来創造的文化財富，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宝貴財产，蔣介石集团絕对无权处理这批文物，美国劫运这批文物，更是对我国文物的公开掠夺。早在1954年、1955年、1959年，美国政府已經几次由美国博物館出面，图謀以“长期出借”的方式，将这批文物劫运美国，当时激起我全国人民的憤慨，并且一再提出严重警告和严正声明，这一次竟由美国国务院公开出面，进行盗劫。中国人民对美国帝国主义这种勾結蔣介石集团，盗劫我国文物的罪恶行为，表示十分憤慨。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現在严重警告美国政府：立即停止这一盗劫行为，同时警告蔣介石集团：不許盗卖祖国文物，不論用何种形式将祖国文物运送美国的行为必須停止，对于現在存放台灣的一切历史文物，必須妥当保护，准备将来归还祖国；并且声明，美国政府同蔣介石集团签定的一切劫夺我国历史文物的“合同”均屬无效。我全国人民，包括我台灣同胞在內，坚决反对美国政府这种无耻掠夺的阴謀。

* * *

美国慣匪，住手！

本刊評論員

美帝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这是中国人民在实际斗争中所获得的結論。远如1900年“八国联軍”之役美国軍队在中国的大擄掠，十几年前扶植了蔣介石王朝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十年来对我台灣領土的大霸占，千方百計企图卷土重来的大阴謀，——这是我中国人民时刻記住的血債，无論美帝国主义者挂上任何招牌，耍任何花招，是不能蒙蔽中国人民的眼睛的。我們已經是十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把美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大陆上驅逐出境，我們还一定要斗爭到把它送进坟墓为止。

美帝国主义者不仅是杀人越貨的强盗，也是盗窃我国文化財富的慣匪，几十年来盗案累累，現在它又企图进行最后一次的大盗窃了，这就是二月十二日公开以美国国务院出面，假借“展覽”为名，要把蔣介石集团运往台灣的我国珍貴文物劫运去美的勾当。——我們既然能在十年前把这个盘踞在我国的强盗的黑手斬断，也一定能粉碎这一次新的阴謀。我們坚决拥护文化部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严重警告和声明。美国强盗再不住手，它必須对一切后果負担全部責任。

美帝国主义者是盗窃我国文物的慣匪，这是有千千万万罪証的，例如：

在石刻、雕塑、壁画方面：我国龙門宾阳洞北魏时期所雕刻“帝后礼佛图”，是刻在石壁上的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浮雕，被帝国主义全部凿为碎块，然后經过粘对，运往美国，現存在紐約市艺术博物館和堪城的納尔逊艺术博物館，是当时紐約市艺术博物館东方部主任普爱倫于1933年至1934年盗窃去的。

我敦煌艺术宝庫中的壁画，于1924年被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館东方部主任华尔納以胶布粘去三十六方，其中包括具有重大历史、艺术价值的張騫使西域图，敦煌彩塑中最为精美的唐代彩塑菩薩象也被盗去。1925年华尔納又糾結普爱倫、霍雷斯·杰尼等来我国敦煌，带来大批胶布，打算把一整个洞窟的壁画粘去，激起我敦煌人民的憤怒，加以驅逐，才未能得逞。

我西安唐太宗昭陵六駿石刻被美国費城大学博物館盗去两匹，其余四匹打碎后已将启运，被我人民截回。

此外，我天龙山北齐和唐代石雕造象，几乎全

美帝国主义企图劫夺我国在台灣文物的新阴謀

〔新华社2月21日訊〕美国劫夺我国在台灣的古代珍貴文物的阴謀，最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美国国务院2月12日在华盛頓发表声明，竟說美国和蔣介石集团已經达成所謂“协議”，准备把我国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解放前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台灣的大批珍貴文物运往美国。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表明，有关这批古物由台灣运往美国“展覽”的所謂“合同”，已經在2月12日由蔣介石集团駐美“大使”叶公超和美国国立美术館秘书凱恩斯非法草签。

声明中說，“中国古艺术品将于1961年至1962年間，在美国举行一次包罗甚广的展覽，包括从中国国立故宫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精选的珍品。这項展覽品将由中华民国政府（指台灣蔣介石集团）运送来美”，从1961年6月1日起陆續在华盛頓、紐約、波士頓、芝加哥、旧金山等地“展覽”。声明中又說，“这項展覽将包括名画珍本約一百幅，名家书法，陶器，瓷器，銀器，玉器等，制作时間从史前时期到十九世紀不等。这将是中国古艺术品在美国展覽規模最大的一次。”

部被打碎，福格艺术博物館和华盛頓弗立尔艺术館等地就存有大批这种贓物。

在繪画方面：我长沙出的“繒书”，是我国发現最早的战国时代写繪在絲織物上的字和画，被美帝国主义以无耻的手段騙走。在美国波士頓美术館中就有我唐代偉大画家閻立本“历代帝王象”图卷，五代董源“平林秋霽”图卷、宋李成“雪山行旅”图軸，宋人“北齐校书”图卷，等等。弗立尔艺术館中就有唐人画“釋迦牟尼佛会”图卷，宋人摹顧愷之“洛神”图卷，宋郭熙“溪山秋霽”图卷，宋李嵩“画鬼”卷，宋龔开“中山出游”图卷等。在堪城納尔逊艺术博物館中就有我唐陈閎“八公象”卷，宋許道宁“高头漁父”图卷等。宾省大学博物館有我五代周文矩“宮中”图卷，南唐巨然“烟江叠嶂”图卷等。

在銅器方面：紐約市艺术博物館中有我陝西出土的西周成組的銅器——彝禁及礼器，战国齐侯四器等，波士頓美术館有我战国彩繪銅壶、金村出土的金人等。弗立尔艺术館、芝加哥艺术博物館等地也有我国大批花紋形制最为精美的銅器。

在陶瓷方面：如弗立尔艺术館中有我安阳出土的商代白陶尊，汉代釉陶，晋越窑，唐三彩及宋、元等代名窑瓷器，其他如紐約市艺术博物館，芝加哥艺术博物館，納尔逊艺术博物館等地都有我大批瓷器陈列。

此外，如漆器、繡絲、玉器等各种文物，还有在抗战时期美帝国主义乘机攫取的五千多部方志，几千部家譜，許多善本图书，都分别在美国国会图书館和其他图书館中。美国軍部并利用这批方志，制造軍用地图以备侵略之用。

有人說美国許多博物館就是它擄掠世界文化財富的“罪証館”、“贓物館”，这話是千眞万确的。尤其是其中擄掠去的中国文物，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現在我們到敦煌、龙門、云崗、天龙山等地去参观的时候，到处看到的是断肢殘体、斧凿遺痕，这种肆无忌憚的大破坏，假若沒有中国共产党領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我們头上的三座大山，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穷凶恶极的統治，我們祖国那里会有今天一日千里的发展，我祖国文化遺产也将被破坏擄掠得一干二凈毫无剩余了。

解放后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大陆上已經无計可施，于是就对被蔣介石集团运往台灣的文物，千方百計的企图劫夺，不管是同死心塌地的卖国賊胡适勾結也好，蔣介石集团訂“合同”也好；不管是用什么“学术团体”出面也好，美国国务院亲自出馬也好；不管是“展覽”为名也罢，“长期出借”也罢；不管是四月間来台灣“挑选”文物的是中国人民所熟知的慣匪也罢，換上慣匪的徒弟也罢，都无非是把美国强盗的野心，欺騙的手段，“和平”的面具，掠夺的本质，再一次的向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作彻底的暴露罢了。

我国这批在台灣的珍貴文物，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劳动創造的文化財富，是屬于我六亿五千万人民所共有，蔣介石集团不但无絲毫权利加以处理，而且在台灣解放的时候必須向我人民如数交賬，美帝国主义者更加无权劫夺，不但这一批不能劫夺，而且就連解放前几十年間搶、騙、偷、盗去的文物，我們也要追回。

美帝国主义者！縮回你这无耻的髒污的黑手吧！

1960年2月25日

与美国国务院发表这个声明的同一天，蔣介石集团“行政院新聞局发言人”也在台北发表卖国談話，証实美国即将勾結蔣介石集团把我国在台灣的大批珍貴文物盗运往美国，并且由美国海軍艦船負責劫运。蔣帮发言人說，过去几年来，蔣介石集团曾“屡接美国公私方面提議遴选中国故宮博物院古艺术品运美展覽”。去年秋天，蔣介石集团指派叶公超和王世杰在华盛頓与美国政府接洽，非法进行这一卖国勾当。据蔣帮发言人的談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和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組）在台灣的一部分安阳銅器、石器等珍貴古物，这次也将被盗运往美国。

我国北京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南京图书館等机构的珍貴文物，在解放前被蔣介石集团运了五千多箱去台灣。十多年来，对于这批屬于我国人民所有的珍貴瑰宝，美国帝国主义一直垂涎欲滴。1955年曾由美国費城艺术博物館副館长霍雷斯·杰尼出面，“建議”蔣介石集团以“长期出借”的方式，让美国把在台灣的我国重要文物和图书运走，并且无耻地說美国劫运我国这些珍藏“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消息傳出以后，激起了我国人民普遍的憤慨和抗議，美国侵略者才暫时縮回了貪婪的黑手。現在，美帝国主义假借“展覽”为名准备派軍艦把大批我国珍貴文物从台灣运走，显然是在推行它蓄謀已久的劫夺計划。但是，这批在台灣的我国珍貴文物，都是中国人民的財产，美国勾結蔣介石集团企图加以劫夺，完全是非法的。这种昭然若揭的卑鄙阴謀，只能加深我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的憤慨和仇恨。这批珍貴文物不論被劫到天涯海角，中国人民一定要全数把它追回来。

首都文化界著名人士集会拥护文化部声明

强烈抗議美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徑

首都文化界著名人士举行集会，热烈拥护文化部对美国政府阴謀劫夺我国在台灣的大批珍貴文物提出严重警告和声明，强烈抗議美帝国主义劫夺我国在台灣的珍貴文物的卑鄙阴謀。会議一致通过反对美帝国主义阴謀劫夺我国在台灣珍貴文物的抗議书。

出席会議的有黄炎培、陈叔通、張奚若、齐燕銘、陶孟和、陈垣、翦伯贊等一百多人。

会議由胡愈之主持。文化部負責人在会上宣讀了文化部对美国政府的严重警告和声明。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揭露美国历次阴謀劫夺我在台文物的罪行。到会的学者、专家和艺术家都憤怒地譴責和揭露美帝国主义在"和平"伪装的掩盖下，在全世界范圍內，不仅加紧进行軍事、政治、經济的侵略活动，而且还在瘋狂地推行它的文化侵略政策。他們指出，現在，美国在加紧推行制造"两个中国"阴謀和不断在台灣地区进行軍事挑衅活动的同时，竟然公开由美国国务院出面，假借"展覽"为名，并准备派遣軍艦劫夺我国在台文物，使在台灣的祖国文化瑰宝面临浩劫的厄运，这就再一次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他們严重警告美帝国主义，必須立刻停止劫夺我国在台文物的一切阴謀活动，台灣蔣介石集团必須立刻悬崖勒馬，停止非法盗卖国家文物的遺臭万年的罪行。

首都文化界著名人士并呼吁台灣同胞和爱国人士参加保护祖国文化遺产的爱国正义斗爭，坚决制止美国勾結蔣介石集团非法劫运我国文物，不准这些珍貴文物离台运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会委員許广平在会上說，在台灣的文物是我国几千年的珍貴文化遺产。美帝国主义不論以任何名义阴謀劫夺，都是中国人民所絕对不能容許的。我們对美帝国主义这种文化侵略提出严重抗議。

对外文化联絡委員会主任張奚若說，美帝国主义的擄掠詐騙連它的所謂"盟友"也不能幸免。他举例說，二次大战期間，法国曾經把一批卢夫宫的珍藏送到美国去保存，但是在大战結束后，美国竟然施展无賴手段，企图据为己有，美帝国主义的豺狼成性可見一斑。他强調指出，美国同蔣介石集团之間签訂的任何盗卖我国文物的契約在道义上和法律上都是沒有任何效力的。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者几十年来对我国文物进行肆无忌憚的掠夺破坏的情况。他說，"我們絕不能容許美帝国主义者把这批文物劫离我国領土。"

历史学家翦伯贊說，美帝国主义一向抱着打劫世界的野心。这次的劫夺行为再一次向全世界表明美帝国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强盗。我們要向全世界声明，台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領土，这批文物和台灣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屬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美帝国主义根本无权劫夺、蔣介石集团更无权出卖。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炳昶痛斥美国到处巧取豪夺，偷窃拐騙的强盗行为。他着重指出，"北京人"的头骨原本是由中国方面在抗战初期寄存在北京协和医院的，但是，在太平洋战爭爆发时，美国从协和医院将"北京人"头骨劫走，至今沒有归还我国。

曾經参加历次安阳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郭宝鈞說，在台文物不仅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結晶，也是我国考古工作人員辛勤劳动的成果，絕不能任美帝国主义者恣意掠夺。他呼吁台灣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人士都起而抵制，同全国人民一道挽救这批文物。

历史学家顾頡剛說，美帝国主义对我国文化遺产的掠夺是惊人的。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曾經通过解放前的燕京大学每月盗运我国文物珍品十多箱，前后連續达十多年之久。他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国，已經不是十九世紀的中国了。我們絕不容許

美帝国主义任意搶夺我国的文物。我們要在人民政府的領导下斗爭到底，把被劫夺的我国文化珍宝全部收回来。

雕刻家刘开渠指出，美国目前阴謀掠夺和过去已經劫走、破坏的我国艺术品，都是国家的无价之宝，对于我們继承、发揚祖国的优秀文化艺术遺产有极其重要价值。他說，“美国这次行劫完全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在和平的幌子下，加紧向我国进行軍事、政治、經济以至文化侵略的罪恶事实。我們美术工作者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的掠夺行为。”

故宫博物院研究員唐兰指責美帝国主义到处掠夺他人的文化遺产的骫髒行为。他說，我們要求被迫去台灣的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的人員和台灣其他文物工作者力爭不使这批文物淪落美国。

在京台灣人士、中国文字改革委員会副研究員陈文彬說，我們对于美国图謀劫夺我国在台古物的罪行，表示非常憤慨。我們九百万台灣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坚决反对美国侵占台灣、坚决反对美国盜劫我国在台古物的强盜勾当。

常书鴻、韓寿萱、沈从文、赵万里、邓以蟄、单士元等在会上紛紛发言，强烈譴責美帝国主义盜劫我国文物的滔天罪行。（新华社2月22日）

譴責美国图謀劫夺我国文物的罪行

首都文化界五百四十多人发表抗議书

首都文化界人士五百四十六人2月22日发表了对美国帝国主义阴謀劫夺我国在台灣珍貴文物的抗議书，全文如下：

我們以无比的忿怒严正譴責美帝国主义图謀劫夺我国珍貴文物的新罪行，我們坚决拥护文化部对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严重警告和声明。我們一致认为：美帝国主义不仅是侵略“能手”，也是盜窃“能手”，无論它是用何种名义，何种手段，无非是达到它的侵略和掠夺的罪恶目的。美帝国主义这一无耻的新活动，是它几年来一系列企图掠夺我国文物阴謀活动的继續和发展。自从蔣介石集团把这些文物盜运台灣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就千方百計企图把它劫夺到美国，1954年它們就与卖国贼胡适进行勾結活动，企图把两百件珍貴文物劫运美国；1955年更进一步用美国費城博物館副館长霍雷斯·杰尼的名义，阴謀以“长期出借”的方式，要把我存在台灣的文物，全部加以劫夺，杰尼并且无耻地声言，美国运走这批文物“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1958年又由美国史丹福大学出面，打算以所謂商借名义，运走一批珍貴文物，并說：“假如能做成”可以引起美国的“极大好感”。在此前后，美国的所謂“考古家”、“收藏家”和一些侵略强盜——文武官員，都紛紛到台灣“参观”古物，并暗中进行活动。继續这一系列的阴謀活动之后，現在美帝国主义者索性把这些所謂“学术团体”的鬼祟活动抛开，竟然公开由美国国务院出面，假借“展覽会”为名，并将以美国总統为“贊助人”，由美国派遣所謂“博物館专家”到台灣进行挑选，将这批珍貴文物用美国海軍軍艦运送去美。这种露骨的无耻的劫夺行为，就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面目和掠夺世界財富的野心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无遺了。这不仅是使我六亿五千万人民更加看清楚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也将使世界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强盜行徑。

我們坚决拥护政府的严正声明。蔣介石集团所运往台灣的这批珍貴文物，是我国数千年悠久历史中的文化艺术結晶，也是我国的宝貴的科学研究材料，其主权屬于我六亿五千万人民所共有，蔣介石集团作为中国人来說，只負有妥善保护将来随同台灣領土一同归回祖国的責任，而沒有私自“出借”給美国的权利，因之无論美国用任何手段与蔣介石集团签定的任何草約，当然无效。美国不仅无权处理这批屬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財富的文物，就是过去用各种卑鄙手段劫夺去美的文物，我們也一定要追回。我們警告美帝国主义者，立即停止这一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极端无耻的盜劫行为。

我台灣的爱国同胞也应該起来坚决制止这一阴謀的实現。

台灣是我国的領土，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我們在台灣的文物，一定要随着台灣的解放而归还祖国。

丁西林　丁声树　丁志刚　丁浩平　丁振海　丁浚　力群　于坚　于倬云　万斯年　天秀　毛勤　马子云
马同儼　马龙壁　马晋　马得志　马耀圻　马梅秀　邓广銘　邓以蟄　邓拓　牛兆勳　方鄂华　仇鰲　尹达

尹伯休　尹潤生　尹潤瀚　尹德金　文士楨　王了一　王　力　王乃壮　王书庄　王文安　王文瑞　王友石　王云波
王去非　王　因　王式廓　王冶秋　王世民　王仲殊　王伯祥　王伯洪　王汝弼　王兴存　王守义　王以坤　王朴子
王　齐　王　琦　王　瑤　王振华　王振鐸　王朝聞　王朝鳳　王临乙　王　毅　王鏡如　王家琦　王檜林　王树兴
王鴻玲　王錫印　王毓銓　白万玉　左　恭　古一舟　古　元　叶圣陶　叶企孙　叶至善　叶淺予　叶恭綽　叶蒼岭
白　浪　田育仁　田昌武　史树青　史敬茹　汉佛語　冯友兰　冯仲云　冯兴璋　冯先銘　冯孝唐　冯宝琳　冯效南
华君武　华宜玉　关松房　卢少忱　卢兆蔭　江　明　祁英濤　向　达　艾中信　阴法魯　安志敏　安翰华　齐思和
齐　速　齐　鉉　齐燕銘　朱　丹　朱光潜　朱希元　朱欣陶　朱启鈐　朱家源　朱家溍　朱家濂　朱暢中　朱德熙
任行健　任乾星　閻山农　閻文儒　刘九庵　刘开渠　刘少白　刘巨成　刘兆丰　刘汝霖　刘观民　刘芳华　刘启益
刘　津　刘　謨　刘鴻宾　刘慧达　米　谷　曲則成　孙澐洲　孙貫文　孙承佩　孙誦昭　杜　平　杜慧民　庄　敏
納国昌　陆元烈　陆式薰　陆志华　陆宗达　陆俊岭　陈万里　陈文彬　陈公柔　陈公培　陈半丁　陈玉生　陈　达
陈仲笹　陈仲夫　陈存洗　陈明达　陈　沛　陈　乔　陈　垣　陈　炳　陈　述　陈宗器　陈庆华　陈芳芝　陈叔通
陈叔亮　陈恩惠　陈紹兴　陈冠賢　陈婉仪　陈滋德　陈桂英　陈緣督　陈鵬程　余　逊　余鳴謙　許广平　許　振
許景元　許維樞　許令仪　佟柱臣　岑麟祥　苏秉琦　邵友誠　邵　宇　邵望平　邵循正　張广立　張士祺　張　仃
張文淳　張圣訓　張安民　張玉潤　張芝联　張永緒　張安治　張光宇　張长寿　張长源　張秀民　張孝先　張国柱
張金銘　張昌龄　張　荣　張若达　張政烺　張忠培　張思信　張　珩　張奚若　張景祜　張景华　張　寅　張彦煌
張潤英　張鉄弦　張德鈞　張蓉初　汪　坦　汪国瑜　杜仙洲　杜玉生　何乃英　何兆武　何澐洲　何国基　何兹全
吕叔湘　吕俊华　吕遵諤　沈从文　沈庆林　沈洪江　沈雁冰　沈藻翔　沈錦慵　严文明　严仲平　严济慈　严敦杰
肖淑芳　肖順华　肖　璋　李四光　李开务　李方嵐　李可染　李正貴　李石英　李文保　李吉人　李光增　李兆汉
李仰松　李宗文　李　炎　李　昭　李保光　李俊龙　李　浩　李　儼　李苦禪　李　樺　李晋奎　李遇寅　李道之
李道增　李雅珍　李德金　李德启　李鍾履　李善邦　李麟玉　宋华杰　宋惕冰　吳永福　吳安民　吳仲超　吳汝康
吳汝祚　吳光宇　吳光祖　吳有訓　吳作人　吳良鏞　吳　晗　吳研因　吳祖緗　吳煥加　吳曉鈴　吳綿吉　吳肇鄴
吳鏡汀　金仲林　金克木　金学山　金岳霖　金昊喆　金裕洲　林　干　林仲易　林甘泉　林　庚　林　燾　林賢光
林澤敏　周一良　周元亮　周永珍　周庆南　周叔迦　周炳琳　周培源　周祖謨　周欽祐　单士元　单　煜　車世光
和　平　罗工柳　罗任一　罗征启　罗福頤　罗　歌　秉　志　竺可楨　郑乃武　郑广法　郑求眞　郑珉中　郑振香
郑笑梅　季羨林　季鎭淮　侯外庐　姜佩文　律鳴年　胥筱汀　郝继兴　兪偉超　胡才倫　胡浩青　胡厚宣　胡庶华
胡佩蘅　胡清源　胡　蛮　胡愈之　赵九章　赵万里　赵风生　赵正之　赵幼文　赵永福　赵君迈　赵希敏　赵忠尧
赵思訓　赵楓川　赵学謙　赵炳时　赵学勤　赵指南　赵鉄华　赵鼎新　范文瀾　紀中銳　紀天霖　紀　思　欧阳南华
欧阳道达　姚家积　賀昌群　賀鴻琛　夏立萍　夏　衍　夏緯英　夏　鼐　賈兰坡　賈　芳　賈宝成　錢三强　錢宝琮
錢俊瑞　錢臨照　錢崇澍　高广仁　高鳳岐　高玉謹　高亦兰　高兴汉　高名凱　高　羽　高　嵐　高志辛　高保夫
高履方　徐光冀　徐旭生　徐邦达　徐迈进　徐亚英　徐伯昕　徐芳洲　徐苹芳　徐森源　秦仲文　袁良义　袁卿俊
袁家驊　陶正剛　陶孟和　浦熙修　柴天琳　翁独健　桂琼英　耿宗仁　容　媛　殷一和　殷璋璋　唐　兰　顾子剛
顾鉄符　顾頡剛　扈俊明　郭义孚　郭庆芳　郭沫若　郭宝鈞　郭　敬　郭預衡　郭淑华　郭德庵　启　功　龔书鐸
章士釗　章廷謙　游国恩　戚志芳　常书鴻　常任侠　常　惠　黄文弼　黄永玉　黄炎培　黄宗江　黄极青　黄祖勛
黄　烈　黄展岳　商志穆　商鴻逵　崔子范　崔玉棠　崔克捷　梁匡忠　梁思成　梁黄胄　曹联璞　康鴻祿　傅乐煥
傅忠謨　傅承义　傅　鷹　彭　城　鹿文波　童第周　景存玉　韓阴晟　韓寿萱　韓炳文　湯有恩　湯滿貞　曾圣敍
曾竹韶　曾維祺　曾毅公　舒翼翼　程国英　葛信益　惠孝同　楊士惠　楊心德　楊向奎　楊人楩　楊伯达　楊国忠
楊秋华　楊　烈　楊　釗　楊建芳　楊　晦　楊蔭浏　楊殿珣　楊钟健　楊敏如　董希文　董明秋　董渭川　蔣兆和
蔣相炎　詹庆旋　楼宇棟　溥雪斋　靳尙謙　雷圭元　戢亚兰　廖詠庠　钟子翔　熊德基　顏　地　顏　闇　顏秉礼
黎　暉　黎錦熙　潘其風　潘　嶧　蔡若虹　蔡　彻　翦伯贊　裴文中　樊　圃　稽春生　冀淑英　鮑振西　戴宁汝
戴申昌　謝元璐　謝国楨　謝辰生　謝炳志　謝端琚　薛玉尧　闞芝娟　魏建功　魏明經　魏善臣　饒惠元　鄺家駒

在以上抗議书发表以后，截至二月二十五日为止，又陆續收到各界寄来的很多抗議书和签名，这里只发表其中的一小部分签名：

丁西玲　王立言　王国明　王学慧　王　悅　王紹岳　王家瑤　王承勛　王乾生　王德樞　王德寬　王宪达　方攸翰
孔祥民　马国靖　马家駿　玉质瑛　石　弘　区　兴　左安民　邓魁英　史錫光　田玉洁　叶如协　卢文璞　刘　宁
刘民芝　刘庆福　刘英敏　刘怀琪　刘家和　刘宗緒　刘春林　江欢然　孙一珍　齐大卫　关坤英　朱金順　李万鈞
李元太　李兆祺　李秀春　李启华　李起民　李桐华　李　荣　李修生　李致远　李隆基　吳廷貴　吳柔曼　吳豪德
把鉄梅　庄建鋆　許崇武　汪宏玉　張之强　張兴荣　張鳳山　張德元　張　恕　張　瑤　張欽尧　張美妮　張恩和
張淑琦　尙恒勃　杭振华　罗秉彝　周正逵　周同春　周衍发　周祖亮　林琪英　陈子艾　陈　惇　范瑞祥　赵荣春
浦　素　錢子靜　高奉箴　唐其慈　徐　健　郭大鈞　郭　澎　郭祿容　龔兆吉　康白卿　黄时基　黄会林　黄智显
黄海舟　童家洲　彭琼熙　程正民　程景林　葛蕙林　楊子坤　楊庆惠　廖貴义　滕文藻　蔚宗龄　蔡同安　潘桂珍
譚倫杰　譚得伶　聶石樵

戴着“和平”面具的强盗

郭沫若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燦烂的文化。我国人民一向对祖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遺产感到自豪。

在解放前，由于外来的殖民主义和內在的封建势力苟合，使我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不仅在政治上、經济上、軍事上受到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而且在文化上也受到严重的侵害。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一貫使用卑鄙手段，劫夺和破坏我国文物，使我国的文化遺产受到极其严重的損害。帝国主义的这种罪行，我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忘記的。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領导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美国侵略者在祖国大陆上已无計可施，却千方百計地企图劫夺我国在解放前夕被蔣介石集团盗运到台灣的大批珍貴文物。

1955年美国統治集团曾由美国費城艺术博物館館长霍雷斯·杰尼出面，“建議”蔣介石集团以“长期出借”的方式，让美国把我国在台灣的重要文物和图书运走，并且无耻地說美国劫运我国这些珍藏“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消息傳来以后，激起了我国人民普遍的憤慨和抗議，美国侵略者才暫时縮回了貪婪的黑手。

現在，美帝国主义者竟公开由美国国务院出面，假借“展覽”为名，企图劫夺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在台灣的文化遺产，美帝国主义这种无耻阴謀，是我們所坚决反对的。

解放前夕，被蔣介石集团盗运到台灣的大批文物，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結晶。举其最重要者而言，有下列种种：

安阳殷墟出土的刻辞甲骨两万五千多片，是研究我国殷代历史的重要資料。

安阳侯家庄殷代陵墓和浚县辛村、汲县山彪鎮、輝县琉璃閣等地周代墓葬里发掘出来的銅器、玉器、陶器、石刻等，都是研究殷周文化的稀世之珍。

故宫博物院、前中央博物院和前中央图书館所藏的全部精华，計有銅器、玉器、瓷器、书画、緙絲、漆器、图书、档案等，其中包括鑄有銘文长达四百四十九个字的毛公鼎及其它大批重器，宋、元、明善本书籍和文淵閣四庫全书十三万多册，它們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和艺术的重要資料。

这許多文物是数千年来我国人民所創造的文化財富，决不允許任何人劫夺和破坏。

美国統治集团侵略成性，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近来在“和平”伪装的掩盖下，不仅在全世界范圍內加紧它的軍事、政治和經济上的侵略，而且还瘋狂地推行它的文化侵略政策。当前的事实正是証明。

十年来美帝国主义霸占我国領土台灣，不断地在台灣地区向我国进行軍事挑衅，而今天又公然企图用它的軍艦劫走我国在台灣的珍貴文物了。

美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罪行，不能不引起我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憤怒。我們相信全世界人民也是越来越清楚地认識了美帝国主义的强盗面貌。我們警告美国統治集团：台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領土，必須从台灣地区撤出所有的武装；在台灣的文物，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文化遺产，决不允許劫夺，即使被劫到天涯海角，中国人民也一定把它們追回。我們同时警告蔣介石集团：必須停止一切卖国行为，立即停止出卖祖国文化遺产的可耻勾当；盗运到台灣去的所有文物，必須在台灣解放时完整无缺地全部交还祖国人民。

我們希望在台灣的所有爱国的人民和文化工作者，負起自己的責任来，和全国人民一起，阻止美帝国主义盗劫我国文化財富和蔣介石集团出卖祖国文化遺产的罪恶行为！

我們希望具有正义感的、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为了美国人民的光荣和世界人类的幸福，对于美国統治集团的侵略活动和强盗行为，一律加以譴責和制止。

最后我們严正声明：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之間所訂立的任何盗劫、出卖我国文物的“协議”和“合同”全屬无效！

不許美国政府劫夺我国在台灣的文物

茅　盾

美国和蔣介石集团最近达成所謂的“协議”，准备把蔣介石集团在解放前劫往台灣的大批我国珍貴文物，假借“展覽”为名运往美国。美国政府这一无耻的强盗行为，引起了我国人民无比的憤怒。

美国統治集团，远在解放前数十年中，就一直不断地劫夺和偷盗我国的文物，这一次阴謀盗劫的大批文物，都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宝貴財产，都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劳动創造的文化財富，我們决不允許美帝国主义进行盗劫。蔣介石集团应負責妥善保护这些珍貴文物，将来随同台灣領土一同归回祖国，决沒有私自“出借”給美国的权利。誰都知道，这所謂“出借”，实际上就是“盗卖”，美国和蔣介石集团签訂的任何“合同”，都是无效的。我們严正的警告美帝国主义者，立即停止这一无耻的盗劫行为。在台灣的文物，一定要随着台灣的解放而归还祖国。

制止以“展覽”为名的掠夺行为

陈　垣

美帝国主义图謀劫夺我国珍貴文物的新罪行，是野蛮无耻的强盗行为，我們非常气憤！我們坚决拥护文化部对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严重警告和声明！

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侵略成性的，虽然最近打起“和平”的幌子，但仍掩盖不了本来的猙獰面目，現在正在全世界范圍內，加紧进行軍事、政治、經济的侵略活动，同时，也在瘋狂的进行各种文化侵略的阴謀。

解放前的几十年，美国侵略者就在我国用各种手段，进行文化侵略和破坏，掠夺盗窃我国大批文物。历次所盗窃的我国无数財宝，不但数量惊人，而且其中很多物品，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无价之宝，历史文化遺产遭到严重損失。

現在，美帝国主义又搞起新的阴謀，竟公然由美国国务院出面，进行劫夺我国在台灣的古代珍貴文物，恬不知耻的以“展覽”为名，来掠夺别国文物，据为己有，并拟以美国总統作为所謂“展覽”的贊助人，向蔣介石集团施加压力，以达到它搶劫这批文物的目的。这种卑鄙无耻的强盗行徑，是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面前，又一次用他自己的行动，暴露了他的侵略野心。

在台灣的这批历史文物，是我們大陆解放前夕，被蔣介石集团陆續运走的。其中包括我国历史上名貴的繪画、墨迹，历代的銅器、瓷器、玉器、陶器，大批考古发掘品和珍貴的档案材料，还有宋、元、明善本书籍，文淵閣四庫全书以及四庫薈要等等。这些珍品，都是我国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的精心創造，是我国极为宝貴的文化遺产，是对于科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可貴資料。

这些珍貴文物是我們的祖先遺留給全体劳动人民的遺产，主权是屬于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所共有，中国人民沒有同意，任何人也无权处理，沒有代表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政府签字，任何所謂“合同”和“协議”全屬无效。現在美国侵略者和蔣介石集团，一方面是劫夺，一方面是盗卖；一方面是侵略罪行，一方面是卖国求荣，都是卑鄙勾当，都是非法行为。我們坚决反对，坚决抗議。

台灣是我国神圣領土的一部分，在台灣的一切文物，都是我国全体人民的財产，不能容許侵略者的掠夺。因此，这些珍貴文物，不論被劫夺到哪里，不論落在任何侵略者之手，中国人民都一定坚决追回！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在台灣的文物，也一定要随着台灣的解放而归还祖国人民！

斬断美帝国主义伸向台灣的黑手

翦伯贊

看了新华社报道的美帝国主义公开劫夺我国在台灣的古代珍貴文物的消息以后，我感到无比的憤慨，我完全拥护我国文化部发表的警告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对我文物的盜劫行为的声明："美国政府同蔣介石集团签訂的一切劫夺我国历史文物的'合同'均屬无效。"

应該郑重地指出，这次帝国主义企图盜劫的我国文物，不是普通的文物，而是被蔣介石集团盜运到台灣的全部文物的精华，是全国解放以前，我国历代以来收藏的全部历史文物中的最精美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石器、陶器、玉器、青銅器、瓷器、甲骨、汉簡、名画、法书、宋元明善本书，以及历史档案等等。这些文物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这种价值是不能用金錢計算的，可以說都是无价之宝。現在美帝国主义却毫无廉耻地用美国国务院的名义宣布，要用美国的海軍軍艦把这些珍貴文物——中国人民的历史的文化遺产，公开地劫运到美国去。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强盜行徑，对于一再宣言"不希望从世界各国得到什么东西"的美国总統艾森豪威尔先生不啻一記响亮的耳光。

当然对于美国統治集团来說，也許认为这是他們的一个"胜利"，因为他們在过去只是披着学术的外衣来在中国文化宝庫中小偷小摸，而現在則索性用政治手段来公开地大肆劫掠。在过去还把劫掠别人的历史文物看作是不大体面的事情，而現在則敢于无耻地由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公然派遣軍艦进行劫掠。据說有一位美国什么費城博物館的副館长霍雷斯·杰尼先生曾經說过，打劫这批中国文物对美国来說"是一种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請問这是什么"国际义务"？一个国家竟把盜劫别人的文物当作自己的"国际义务"，这簡直是不知人間尚有羞耻事。

台灣是中国的台灣，在台灣土地上的一切，包括蔣介石集团偷运到台灣的历史文物，都是中国人民的財产，中国人民不許蔣介石集团以任何名义盜卖，不許美帝国主义以任何名义劫夺。警告美帝，縮回你的黑手吧！

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地文化界人士及历史、文物机关工作者紛紛集会反对美帝刼夺我国文物

美帝国主义准备劫夺我国在台灣的珍貴文物的消息傳出后，激起了首都和上海各个历史文物机关的工作人員极大的憤慨。

首都許多历史文物机关工作人員連日紛紛举行集会，热烈拥护文化部的声明，譴責美帝国主义企图大批劫夺我国在台文物的新罪行。許多历史文物机关工作人員紛紛張貼大字报和联名发表了抗議书。23日，故宫博物院全体工作人員举行了抗議大会。院长吳仲超在大会上严正宣告，他代表故宫博物院对美帝国主义阴謀把該院在台灣的文物非法盜劫往美国，提出强烈的抗議；并且声明，在解放前被蔣介石集团盜运往台灣的二千九百七十二箱故宫博物院文物，是全中国人民的宝貴財产，蔣介石集团絕对无权加以处理，它与美国签訂的任何"合同"均屬无效。蔣介石集团对这些文物必須妥善保护，准备将来归还祖国。

故宫博物院全体工作人員在群情激昂的抗議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議书。抗議书上說："台灣是我們的国土，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在台灣的文物是我国的珍貴財产，我們一定要收回。我們故宫博物院和各兄弟单位有保管这批文物的神圣职責。在台灣的文物，每一件都有賬目，如果被盜劫，我們坚决要追賊追贓。无論被劫到天涯海角，不追回来，决不罢休。只要有絲毫損伤和短少，美帝国主义和蔣介石集团必須負全部責任。"

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体人員的大会上，解放前参加历次安阳殷墟发掘的老研究員郭宝鈞非常激动地說："这批珍貴文物不仅是我国人民的財富，也是我們考古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現在美帝国主义蓄意掠夺，我們坚决反对。"曾在西北地区作考古工作多年的黃文弼說："解放前帝国主义在我国边疆地区就盜去了許多文物，我們每想到那些珍貴的考古資料，就感到十分憤慨。現在又企图盜劫我国在台灣的文物了。不管这批文物被劫往天涯海角，我們也要把它追回来。"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楊向奎、熊德基、顧頡剛、賀昌群、翁独健等一百六十七人联名发表的抗議书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我們最凶恶的敌人。它一直坚持与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为敌，霸占我国領土台灣，阴謀制造'两个中国'，不断在台灣海峽地区进行軍事挑衅活动。美帝国主义盜劫我国在台文物的强盜行徑，是它敌視中国人民的政策的一部分。但是，我們要警告美帝国主义者，中国人民任人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牛兆勳、郭宝鈞、黃文弼等二十四人发表的抗議书上指出："我們中有些参加过这批古物发掘的人，听到它們被人劫掠的消息，更是憤慨万分。美帝国主义者是侵略成性的慣盜。我們洛阳龙門的礼佛图，西安昭陵的六駿之二，早已被它掠夺了去。寄存美国图书館的善本书百余箱，居延汉簡万余片，至今仍久假不归。这个慣盜，今又思'竭我精华，負匱揭篋，担囊而趋'，我們怎能任其如此猖狂。我們警告美帝国主义：中华民族的文化遺产，是我全国人民的財富，决不允許任何人掠夺，即令运至天涯地角，我們誓必全数追回。"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全体人員也发表了抗議书，强烈抗議美帝国主义准备把安阳殷墟出土的文物和我国其他在台文物劫往美国的强盜行为。

国家档案局、北京图书館、中国画院、中国美术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考古专业等单位也都紛紛举行集会，发表了抗議书，严厉斥責美帝国主义准备大批盜劫我国在台文物的新罪行。

美帝国主义图謀劫夺我国在台灣珍貴文物的新罪行，也激起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市人民的极大憤慨。各地的許多文化界著名人士都举行了集会，热烈拥护文化部对美国政府阴謀劫夺我国在台灣的大批珍貴文物所发表的声明。到会的学者、专家和艺术家們，对美帝国主义这种极端卑鄙的文化侵略行为提出严重抗議，并且警告美帝国主义必須立刻停止这一盜劫勾当；蔣介石集团必須立刻悬崖勒馬，停止非法盜卖国家文物。

在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举行的集会上，金仲华揭露了美国历年来以各种方式图謀劫夺我国在台文物的罪恶活动。金仲华說，在台灣的珍貴文物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財产，美国勾結蔣介石集团企图加以劫夺，是中国人民絕对不能允許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会主任徐森玉說，在台文物都是我国人民数千年来劳动創造的文化財富，美国竟敢企图加以劫夺，这笔賬我們一定要算。上海市博物館副館长沈之瑜列举了美帝国主义在解放前不擇手段、破坏盜劫我国珍貴历史文物的大量事实，說明美帝国主义从来就是破坏人类文化历史的敌人。沈之瑜指出，早在1954年，美国即曾派紐約都城博物館远东艺术品征集人阿希文·李勃到台灣察看我国在台文物。这个美国野心家并把这批文物开列目录，策划所謂"运美展覽"的劫夺勾当。

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陈望道、周谷城、周予同、楊寬、郭紹虞、丰子愷、李青崖、譚其驤、吳澤、賀天健、李平心、陈守安、金兆梓、沈迈士等在发言中严正指出，我国在台文物要是有絲毫損伤短少，必須由美国政府和蔣介石集团負全部責任。

在南京文化界人士举行的集会上，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对于美帝国主义准备把南京博物院在解放前被蔣介石集团盜运去台灣的文物劫到美国去，提出最强烈的抗議，并且声明一定要追贓到底。

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韓儒林在会上說：美帝国主义长期以来采用各种形式，劫夺我国大批珍貴文物，这次又用"展覽"名义把我国在台灣的文物劫往美国，这是对于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宝貴文化財富的劫夺，我們坚决反对。

出席这次会議并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南京图书館、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員会、中国科学院江苏分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筹委会、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会、太平天国紀念館、南京地质博物館等单位的代表汪长炳、計雨

亭、周村、王可凤、陈之佛、傅抱石、李雪楓等。他們一致譴責了美帝国主义劫夺我在台文物的罪行。

在广州市文化界举行的集会上，广东省文史館副館长冼玉清說，美帝国主义想从台灣盜劫我国大批瑰宝，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許的。这批文物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結晶，决不能让美国盜运出去。曾在美国居留二十多年的文物专家梅斌林說：我曾經参观过美国大城市的十五个博物館，这些博物館都有美帝国主义劫夺、盜窃的我国文物。現在，美帝国主义以"展覽"为名，企图重复过去的盜窃勾当，中国人民决不允許。

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考古学家商承祚发表談話說，近百年来，美帝国主义不断地以极端卑鄙无耻的手段掠夺我国的珍貴文物。最近，又勾結蔣介石集团企图大批劫夺在台文物，中国人民严正警告美帝国主义必須立即停止盜劫行为。

香港、澳門爱国报紙在22日紛紛发表評論，热烈拥护文化部对美国政府阴謀劫夺我国在台灣的大批珍貴文物提出严重警告和声明，各报都严厉譴責美帝国主义劫夺我国在台文物的卑鄙阴謀。

香港"文汇报"社論說，我国文化部向美国政府提出的严重警告和声明，充分表达了我国人民卫护珍貴文物、保存文化遺产的决心。对于美国的盜窃行徑，海內外的中国人民都感到极大的憤怒。社論指出，美国盜劫我国文物已不自今日始，过去陆續被美国收买、盜走的我国古代文物不計其数。这次美国公然准备把我国在台灣的珍貴古代文物大批劫夺，这証明美帝国主义是何等貪婪无耻。社論說，"美国强盜如果不縮回其貪婪的手，蔣介石集团如果不停止其卖国勾当，只有加深我国人民的憤怒和仇恨。而这些珍貴文物不論被劫到天涯海角，中国人民是一定要把它全数追回的"。

香港"大公报"說，我国大批的在台文物，是我国历代文化艺术的代表作，是我国的瑰宝。現在美帝国主义公然勾結蔣介石集团企图盜劫到美国，对这种强盜行为，中国人民絕不能緘默。

香港"新晚报"評論說，"过去几十年当中，美国人已經从我們中国拿去了許多瑰宝，其中之一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北京人'的头骨。此外，我国一些珍貴的古建筑物竟有整座被美国人搬去的"。評論說，現在美国阴謀把我国在台文物据为己有，这是中国人民絕不能容許的。

"澳門日报"評論說，我国五千年来所遺留下来的文物，是世界罕有的，是特别值得珍視的。現在美国竟借"展覽"为名阴謀劫走我国在台文物，这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香港文化界爱国人士也紛紛在报紙上发表談話，热烈拥护文化部的声明，斥責美帝国主义准备劫夺我国在台文物的强盜勾当。(据新华社2月23、24日訊)

鼓足干勁，配合水利建設工程，开展长江流域的文物工作

在长办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議的講話

中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委員会第二书記　李廷序

这是长江流域的第二次文物考古工作会議。第一次会議主要是解决长江流域文物考古工作的統一組織領导以及如何开展流域內文物考古工作的問題。自第一次会議到現在已有一年左右时間，在这段时間內，我們做了許多工作，主要表現在：

一、健全与充实了考古工作队伍：共配备了干部一百五十三人，除基本队伍外，还在工作中培养了一批群众考古积极分子。这就为我們今后开展文物考古工作打下了一定的組織基础。

二、发現与收集了許多有价值的遺址与資料：据不完全統計，各队一年来在調查中，共发現遺址332处，古墓葬1254座，复查了遺址330处，試掘与正式发掘了29处，清理了古墓葬742座，出土文物14949件，收集文物10716件。这对研究我国历史的发展有重大作用。此外，各队在革命文物的征集与保管方面，也作出了許多成績。

三、密切了文物考古部門与工程、設計部門的联系，基本上統一了部署。

其他方面我們还做了許多工作，这不过是几項主要工作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中国科学院、中央文化部和各級地方党委的正确領导、各省文化部門的直接領导和沿江群众与基建单位的大力支持，以及我們考古工作同志努力的結果。当然，我們不能滿足于現有成績，还应继續努力才能适合工作的要求，根据这次全国水利电力会議所确定的任务来看，应該說我們文物考古工作是很繁重的，为了說明这个問題，不妨把全国水利电力会議所規定三年与十年的任务談一談。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李葆华同志的报告中指出今后水利工作的总任务是：奋战十年，在全国范圍的多数地区基本实現水利化。为了向水利化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为了当前农业发展的需要，我們应当首先要求在三年內，組織三个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高潮，力求多数地区在抗御水旱災害方面达到一定的目标，力求解决历史上缺粮地区的粮食問題，力求提前实現农业发展綱要中对水利的要求，在长江干流的中下游地区，抗御五十年到一百年一遇的洪水。在为害严重的中小河流地区，能抗御二十年到五十年一遇的洪水。十年內在多数地区基本实現水利化：大雨不成災，无雨保丰收；坡地梯田化，平原河网化，沟壑川台化，工程系統化，提水机械化，荒山荒坡綠化。具体的要求是：在各大江河流域的主要地区，都能抗御超过三百年一遇的洪水，特殊重要地区抗御千年一遇除涝标准。各地水利工程，除了做到上述抗御水旱災害的标准外，还要都做到綜合利用，使能发电的工程都能发电，能通航的河段都能通航，并发展多样化的水产，做到水尽其用。随着三峽等巨型水利樞紐的完成，将完全控制长江等水流；并使长江的水源北調，以彻底改造北方的沙漠和干旱高原；以巨型水电站为中心的巨大电网，使大、中、小水电站配合火、風、气等各种能源的电站，实現农村高度的电气化。

从上述情况看，水利水电的任务是繁重的，也是光荣的，只要完成了上述任务，我国的面貌就可以得到根本的改观，而水利水电任务又紧密的关系着我們的文物考古工作。黃河与长江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最早的地区，大型水利工程多数在这两大流域。因为要做水庫就有淹沒区，而历史的文物古迹和許多革命文物又散布在广大的农村和城市，地面或地下，地面的还好办，可以搬迁保护，而地下的重要遺址不积极发掘就要被淹沒，“海底撈月”就困难了。为了使文物考古工作适应国家建設发展的要求，提出如下几点意見，供大家工作中参考：

一、继續貫彻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傾、鼓干勁的精神。这在我們文物考古工作中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已經被无数事实所証明，那一次工作如果存在右傾，干勁不足，就不能完成任务，工作就不能跃进。只要把右傾反透，干勁鼓足就可胜利的完成和提前完成

任务。沒有革命干勁的人想要在工作中、在科学上取得显著成績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科学家、政治家、經济学家等如果沒有革命干勁和一股热爱事业的热情，就不会有什么发明創造。为什么我們1958年和1959年能在各方面取得偉大的成就呢？就是由于有全党全体人民冲天的革命干勁。当然，革命的干勁还要与科学分析的精神相結合。

二、专业机关必須与有关方面和群众紧密結合才能把这个工作搞好。所謂专业机关就是文物考古工作队、文教机关、文物考古管理研究单位和学校等，所指的有关方面是水利水电部門，工程施工单位等。只有专业机关和有关方面的結合还是不行的，必須依靠各地党政領导，依靠群众，只有各地党政領导与群众都重視了，才能更好更快的完成文物考古工作，使文物考古工作适应国家建設发展的要求。为此：

（1）要多宣傳，多向地方党政領导汇报工作情况，爭取地方的領导和帮助。

（2）开展淹沒区群众对文物的报信与保护运动，从而发現問題，及时处理問題。

三、要注意培养干部，尤其是文物古迹的重点地区，請各地党政領导指定专人管理这个工作，公社也需如此。

四、要注意及时总結与交流經驗，使我們的工作能够不断跃进，业务水平不断提高。

这是我的几点意見，供同志們参考。

1959.12.21于汉口

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議通訊

1959年12月21日至27日，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在汉口召开了队长会議。出席会議的有云南、四川、貴州、湖北、河南、陝西、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上海分队和直屬队代表共三十人。会議是在长办党委直接領导下进行的。文化部文物局王书庄副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副所长，及湖北省文化局韓副局长都参加了大会的領导工作。

会議首先听取了中共长办委員会第二书記李廷序的政治报告，报告概述了一年来考古队的成績，全国水利建設形势，并对今后应該如何开展工作，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接着王副局长作了发言，他从十年来文物考古工作的回顧，指出长办文物考古队的成立是九年来工作經驗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进一步闡明了建队的作用和意义，接着对一年来队的工作情况作了簡括說明并提出了几点认識。长办李鎮南总工程师作了“长江流域規划要点”的报告，这个报告生动地描述了长江流域綜合开发利用的美好前景及近期重点工程。夏鼐副所长作了“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的目的和要求”的报告，他首先从考古学的学术路綫談起，指出：今后考古工作者的任务是要为建立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而奋斗，其次他詳尽地闡述了关于长江流域方面考古学上的一些問題及对一些問題的看法，最后指出今后解决問題的途徑。

与会代表对以上报告进行了討論。通过討論进一步明确了长办文物考古队成立的作用和意义，明确了把水利、文化行政及学术研究部門擰成一股绳进行协作的作用和意义，明确了要在长江綜合开发利用所涉及的范圍內完成文物考古工作的任务，必須坚决貫彻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及八屆八中全会精神，反右傾，鼓干勁，必須政治挂帅，依靠党的領导，大搞群众运动。

会議进行了具体工作經驗的交流。驗經涉及的面是較广泛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江西分队大力展开了革命文物的調查工作，基本上掌握了中央苏区、閩浙贛、湘贛和湘鄂贛四大革命根据地革命文物情况；通过調查、訪問及一系列宣傳工作，对群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革命傳統教育。湖北分队克服了种种困难，千方百計地进行了武当山地面文物的迁移，并且注意收集了淹沒区內有关民族学的資料。四川分队到了工地以后，爭取当地的党政領导作为工作組的負責人，把发掘工作更直接地置于当地党的領导下。湖北分队在工地及时抓紧了政治思想教育，在比較困难的条件下，順利完成了工作任务。河南分队提出了“三边”（边发掘、边整理、边研究）的工作方法。江苏分队报告的大运河展覽，直接地为水利工程服务，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評。安徽分队在史滸杭工程中，在工程政治部的指示下，訓练了自政治部至各县指揮部、各水利团营連的人員，作为文物骨干，在水利工程各单位中，普遍地設立了文物保护組織，把文物保护工作深入到了水利各部門。

代表們向大会汇报了一年来的发現和重要收获。长办文物考古队的成立只有一年，但已取得了显著成績，根据不完全統計，一年来經过調查登記了革命遺址、遺迹2 012处，古文化遺址332处，古墓

葬1254座，古建筑33处，石刻266处，古生物化石产地5处，发掘了古文化遺址29处，古墓葬742座，出土文物14949件，收集文物10716件，省专县各級举办了訓练班，訓练了专县以下干部4124人。

一年来的收获也是很多的。江西分队对1928年毛主席与朱总司令在井崗山会师地点作出了新的考証，按照过去的說法，会师是在原来宁岡县的大隴，經过这次反复調查核对，証明是在原来宁岡县的礱市大桥上。直屬分队继續探索和研究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文化”；調查了三峽湖北地区，发現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既不同于黃河流域，与汉水流域的也有区别。河南分队发掘仰韶期晚期的房子，这些房子建筑在当时地面上，表明当时人类已經脫离了半穴居的居住状态；他們还钻探了汉代宛县遺址，这个遺址正压在現代南阳城的下面，面积比現在的南阳城还大，发掘了当时的冶銅、冶鉄及燒陶的手工业作坊区。四川分队发掘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居住遺址及氏族集中埋葬的墓地，遺址中魚骨出現很多，葬法中除了仰身伸直葬外，还有屈肢葬等。安徽分队发掘了汉代閘壩工程遺址，这个閘壩是在生土沟槽間下木桩，筑以草土混合层，对了解汉代水利工程添了新的資料。

代表們在进行了充分酝酿和討論之后，提出了今后工作的保証书。保証书中指出：今后要继續貫彻总路綫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在各級党委的領导下，坚持政治挂帅，坚决貫彻“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經济建設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針，大力宣傳文物政策，普及文物知識，层层举办訓练班，与水利及其他建設部門擰成一股绳，进行共产主义大协作。最后，王副局长对会議及有关問題，作了总結性的发言。会議于12月27日結束。

（启益）

北京市文化局举办文物、博物館等单位技术革新展覽

自去年十一月間北京市委文化部号召所屬各单位开展先进工作者运动以来，在文物、博物館等单位中掀起了大鬧技术革新的高潮。市文化局为了介紹交流这些单位在技术革新上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在二月間特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技术革新展覽。参加展覽的有中国革命博物館、中国历史博物館、故宫博物院、自然博物館、首都历史与建設博物館，古代建筑修整所、北京图书館、首都图书館、幻灯制片厂等九个单位。展出地点在中国革命博物館，展品約一百五十件。

展覽的內容，文物复制方面，有中国革命博物館用石膏翻制、噴漆着色、逼肖原物的紅軍长征时使用的飯鍋，第二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的手溜彈，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时用的軍刀等，和过去用与原物相同的原料来复制的方法比較，省錢又省工，不但质量好，而且可以較大量的复制供各博物館陈列。中国革命博物館用胶板来印刷复制革命文献、手稿的办法，解决了大量复制文件手稿的技术問題。中国历史博物館研究出用蜡来复制古代玉器并使之不变形和色彩柔潤的方法。故宫博物院用石膏复制成了“虢季子白盘”，解决了用石膏复制大件銅器的技术問題。关于美工制作方面，自然博物館加工組創制了画格計算盘，工作效率提高三倍。首都历史与建設博物館展出利用旧材料創制的电动搜字机，使搜字工从一天搜三十来个字提高到搜二三百字。自然博物館加工組还創制了电动磨字机、玻璃钻眼机，古代建筑修整所創制了电动磨顏料机。关于清洁卫生工作方面，自然博物館創制了电动三用打蜡机，过去四个人两小时才能打完一个陈列室（約750平方米），現在两人两小时就可以打完，而且比用人力打的光滑，节省蜡40%。此外，他們还創制了高空擦玻璃器机，过去擦一个大窗子（二十块玻璃，每块七十厘米）四个人要用五十分钟，現在两个人三十分钟就可以擦完，不但干凈，还保証安全。此外，各館都針对該館条件和需要創制了扫地用具，推雪用具，擦墙壁、柱子、陈列柜的用具。自然博物館还制造了清洁檢查鏡。故宫博物院保管部的同志利用照明电筒制造一个用于陈列柜內的吸尘器，簡便实用，节省人力。此外，古代建筑修整所用藍图和照片介紹了他們揭取永乐宫壁画的方法和各項揭取壁画的用具。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創制了电动梳麻机、砍油灰机、鏇椽机、臥式平鉋等。

这次展覽充分显示了：只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就会不断跃进；过去办不到的，現在都可以办到。参观展覽后，很多人反映，它不仅交流了經驗，对解放思想上也有很大启发。为了扩大展覽作用，将就几个专业問題，如文物修复、美术工作等举办現場座談会。（守中）

对于配合国家經济建設的文物考古工作的几点意見

王 书 庄

一

从1953年以来，随着国家有計划經济建設的开展，文物考古工作密切地配合建設工程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并根据工作需要先后提出了“既对經济建設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和“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針，在工作中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1958年在总路綫和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鼓舞和推动下，文物考古工作进一步貫彻了群众路綫，在群众中培养了数以千計的积极分子。1959年經过了反右傾、鼓干勁的整風运动，每一个文物考古工作者都是精神焕发，斗志昂揚，准备着投入新的战斗。这是目前的大好形势。

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国家經济建設进行文物的調查、保护、迁移和清理发掘工作。在各項建設中动土量最大的是水利建設工程，因此文物考古工作应該把一定的力量放在配合水利工程方面。建設工程的規模日益宏偉，在很多地区要深翻土地或将土地淹沒在水庫里。在一个省的范圍里去冬今春要建設的水庫受益面积在万亩以上的几百个，万亩以下的几十万个。在这些地区的地上、地下往往遺存有历史、革命文物。經济建設的速度要求要快。但是，文物考古工作方面的情况和工作要求还不相适应。文物考古队伍的力量非常薄弱，全国文物考古工作人員，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內，才八百多人。对文物遺存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够清楚。因此，在文物考古工作和建設工程中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如果解决得不好可能影响建設工程的进行或者使重要文物遭到不应有的損失。文物考古工作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既要保証建設工程的順利进行又要使重要文物得到保护。

在前几年的工作中已經摸索了一些經驗，很多問題解决得比較好。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遺址上有好几个村落，住着上千戶的人家，在党号召大修水利的时候，他們提出了开渠的要求，这是完全合理的。当时我們組織了文物考古力量，在不长的时期里摸清了地下遺存情况，确保了重点遺址，同时水渠开通了，使几万亩土地得到了灌溉。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鎮（原屬永济县）的永乐宫保存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元代壁画，由于三門峽水庫的兴建这座艺术宝庫正处在淹沒区里。經各有关方面商議后，决定把它迁移到芮城县五龙庙。文物工作的同志們为了要把壁画、建筑物拆好、迁好，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工作，保証在三門峽水庫蓄水前全部迁完。地方領导和工程部門对解决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給予了大力的支持。不久以后，我們将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装有壁画的古建筑群在五龙庙出現。这都是解决文物保护和工程建設之間的矛盾的很好范例。其他各省也都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因此，我們有根据說，只要我們工作作得好，是可以保証建設工程的順利进行的。

同时，經济建設的飞速发展对文物考古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解放十年来出土的七十多万件历史文物，絕大部分是建設工程中出土的。沒有大規模的經济建設，也就不会有文物考古工作今天的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作得好，可以保証經济建設的順利进行，經济建設的飞速发展促进了文物考古工作的跃进。这就說明了，原来矛盾着的方面統一起来了。

二

怎样才能作好配合經济建設的文物考古工作呢？首先在思想上要明确文物考古工作必須积极而主动地配合經济建設工程。文物考古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設服务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經济建設工程需要文物考古工作的配合以保証經济建設的順利进行，这不是最直接最具体的为生产建設服务嗎？因此，我們应該肯定配合經济建設进行文物考古工作是文物考古工作的首要任务。

只是肯定了为首要任务，还不等于作好了工作，还需要有具体的办法跟上去。根据目前的情况，提出几点个人意見供大家参考：

（1）文物考古部門必須进一步加强与工程建設部門的协作。各項建設工程的規划設計是文物考古工作的主要依据之一，不能及时地取得这些資料，就无法安排工作。文物考古工作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財力，也只有依靠地方党政領导和工程部門才能解决。光靠文物考古部門单干是不行的。在与工

程建設部門的协作中，文物考古部門应該更主动一些。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重要意义，虽然有些工程部門是理解的也重視文物考古工作，但是也还有些部門的同志不是很了解，当然也就不容易重視这項工作。文物考古人員在进行工作时，要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地向有关方面进行文物的宣傳工作，使工程建設部門的同志和当地群众更热爱文物从而更加关心和支持文物考古工作。如果能够爭取把文物考古工作納入工程部門的工作中作为它的一个組成部分，在工程部門的領导下进行工作，那将更有利于及时地取得有关資料和解决人力和物力的問題。

（2）充分发动群众。文物考古工作的任务这样重，文物考古队伍的力量又这样薄弱，如果单靠专业队伍来完成工作任务，这是不可能的。必須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向群众普及文物知識，傳授技术，使广大群众在生产建設中注意、关心文物工作，并进一步能解决一般性的保护和清理問題。这样就可以使很多文物得到保护，同时使重要文物被发現。群众路綫是文物考古工作中的路綫問題，也是解决文物考古与工程建設中矛盾的一个主要办法。

（3）适当扩大专业队伍。专业队伍和群众队伍，在文物考古工作中是"两条腿"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还要把位置和分量摆对。专业队伍的作用是掌握重点、发动群众、向群众普及、組織群众并不断提高群众的文物考古知識和技术水平。現在全国文物考古人員只有几百人，对今后的任务說来是小了一些，在現有的基础上作适当的充实和扩大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除現有高等院、校协助解决一部分外，主要的要靠文物考古部門自己設法培养。

（4）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继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敢想、敢說、敢作的共产主义風格。在工作中注意总結經驗和推广經驗。大力培养和提高专业队伍的思想、业务水平，改进工作方法，革新发掘技术，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三

1958年12月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会同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組織成立了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在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直接領导下进行工作。1959年12月在武汉市召开了第一次队长会議，初步总結了一年来的工作，交流了工作經驗并針对目前形势对1960年的工作交換了意見。大家认为，从一年来的工作已經初步看出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的組織是保証文物考古工作与水利建設紧密結合的具体措施，通过这一組織把文化行政、科学研究和水利規划三方面擰成一条绳，使这三方面的协作在組織上得到了保証。

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是在几年来文物考古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文物考古工作大跃进的产物。文物考古队的总队部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指派人員組成，在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直接領导下进行工作。在沿江各省、市由原有文物考古人員組成省、市分队，在省、市文化局領导下进行工作，在业务上接受总队的指导。另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抽調人員組成直屬分队，在总队直接領导下进行一部分重点工作并对各省、市分队在业务上进行协助和輔导。这样組織具有下列几項优点：

（1）通过这个組織，水利設計部門可以及时地取得有关文物資料供工程設計的参考，文物考古部門可以及时地取得有关工程設計資料作为安排工作的依据。文物考古工作在工地上可以得到工程部門的关心和在人力物力上的支持。在丹江水庫工程地区已經充分說明了这个問題。

（2）通过这个組織，在沿江各省、市間更便于交流工作經驗和根据工作需要組織学术上、工作上的协作。去年12月召开的队长会議比較广泛地交流了各省的工作經驗，使代表們更有信心把今后的工作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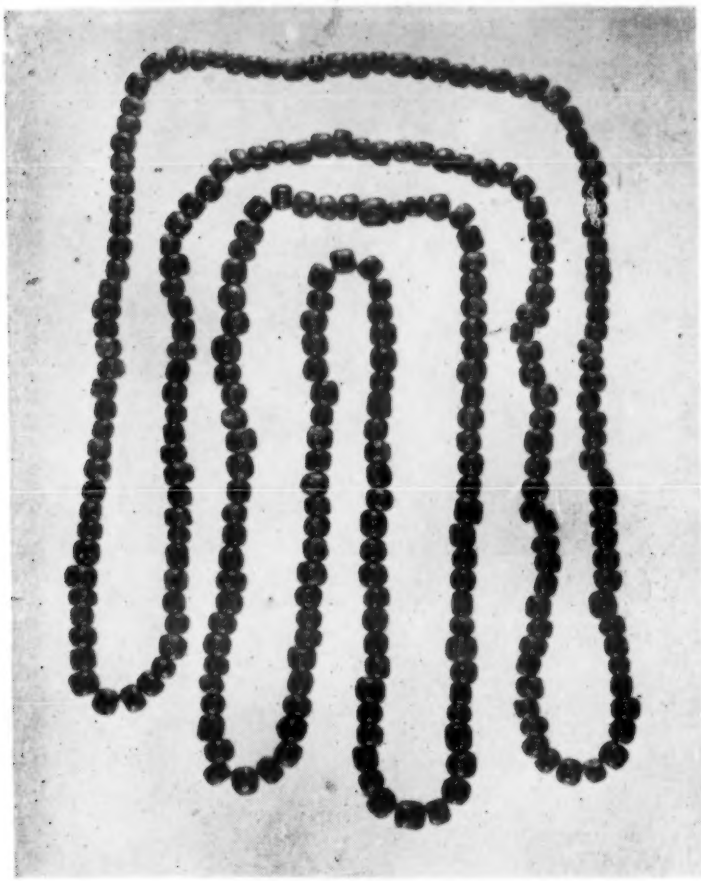
（3）通过这个組織，使原来工作基础比較弱的省、市，在培养干部和发掘技术方面，及时地得到直屬队的帮助。湖北省文物考古队在最近一年中的壮大和迅速的提高，就可以說明这一点。

长江流域規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虽然已經初步发揮了作用，但是今后配合三峽水庫工程以及长江各干、支流水利工程的文物考古任务将越来越大，因此要求这一机构要进一步发揮更大的作用。在队长会議上一致要求举办长江流域的考古訓练班、举办配合水利建設的文物展覽和經常組織經驗交流会以及組織省际协作等，这是非常需要的也是必須要作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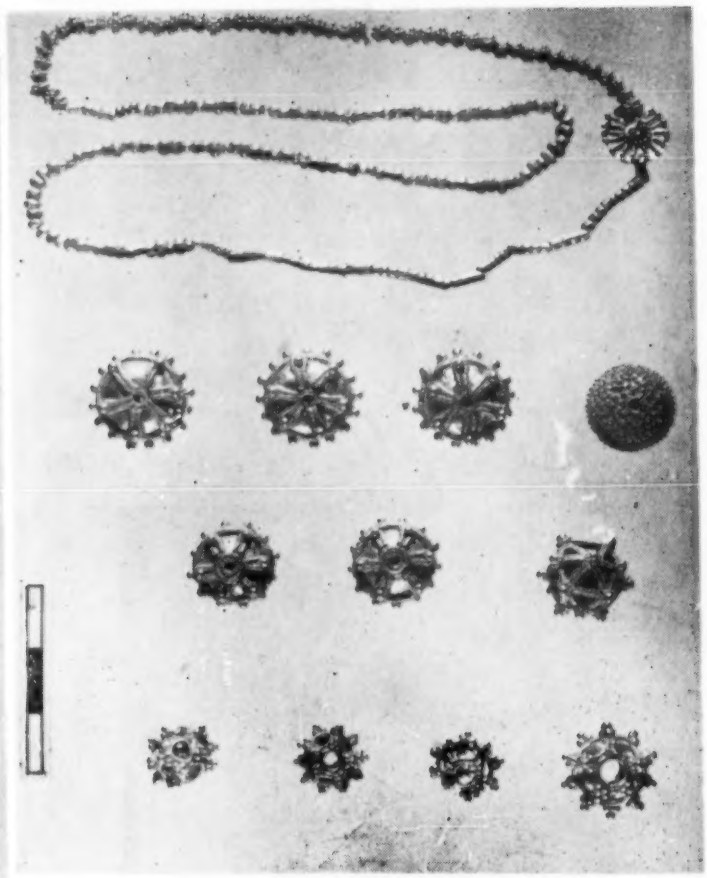
四

黃河流域的水利工程开始得比較早，配合黃河流域水利工程的文物考古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績。长江流域的文物考古工作，特别在組織协作上，吸取了黃河流域的工作經驗。黃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正在大規模的进行，文物考古工作必須适应工程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在长江、黃河流域取得的工作經驗有很多可以应用到其他水系和其他建設工程地区。配合經济建設的文物考古工作必将在經济建設的飞速发展中实現更大更好的跃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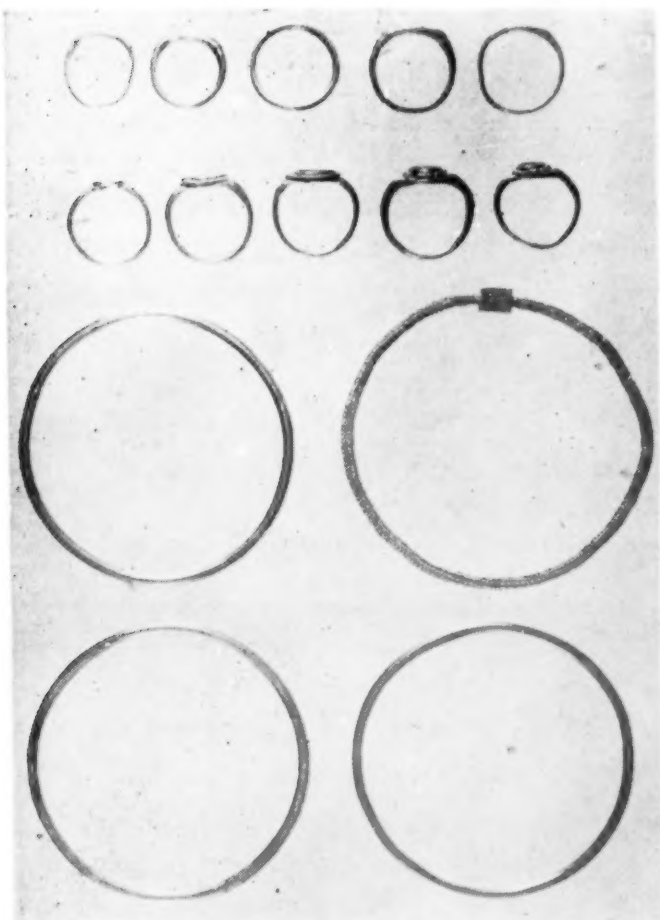
湖南古代墓葬出土文物 (文見33頁——6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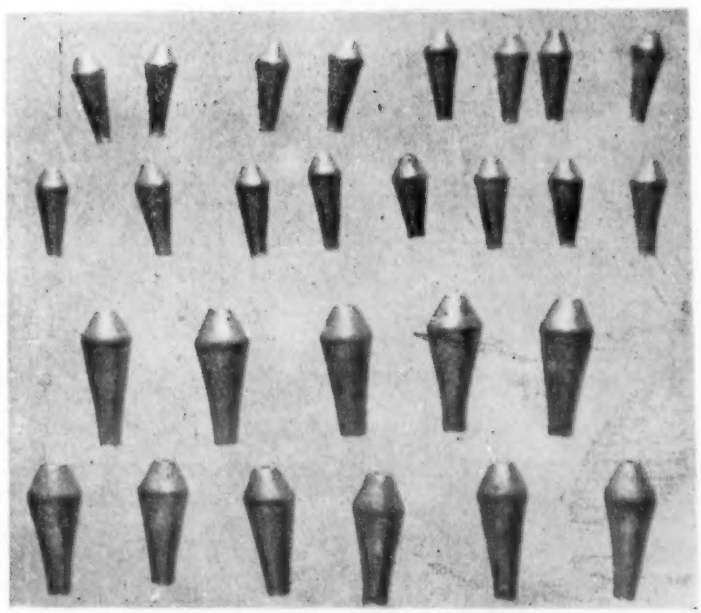
1. 料珠　新莽　长沙五里牌(M 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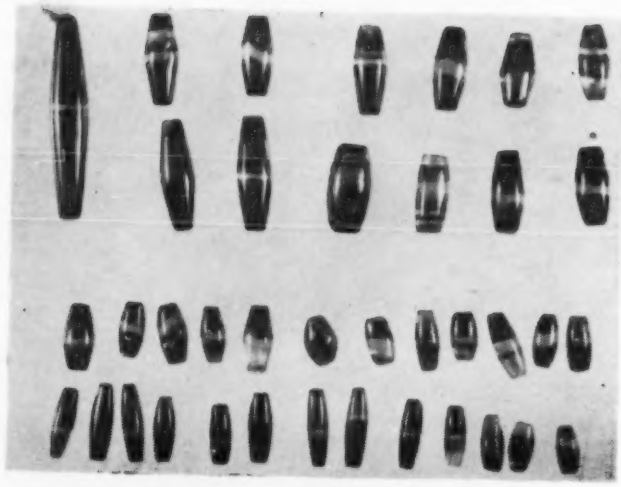
2. 小珠飾(上)、球形飾(下)　东汉　长沙五里牌(M 009)



3. 金手鐲、戒指　东汉　长沙五里牌(M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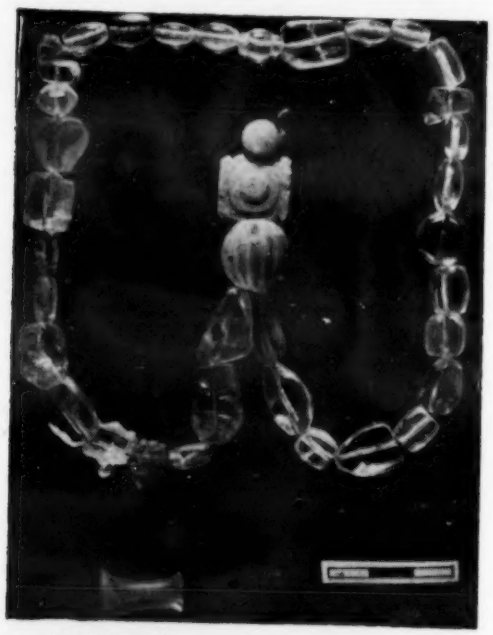


4. 茉莉花苞形飾　东汉　长沙五里牌(M 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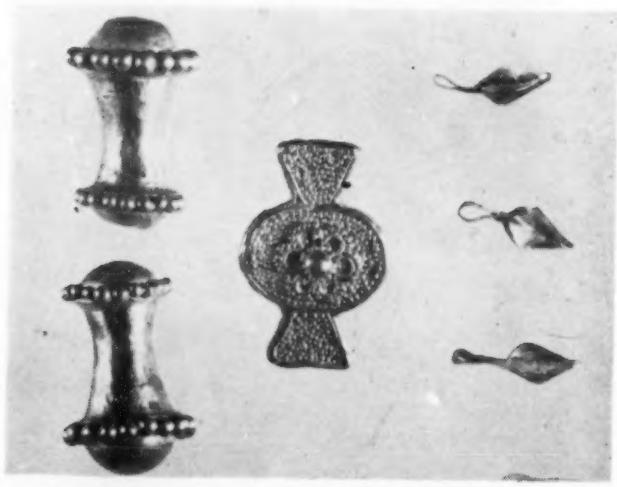


5. 瑪瑙腰鼓形珠 东汉 长沙五里牌(M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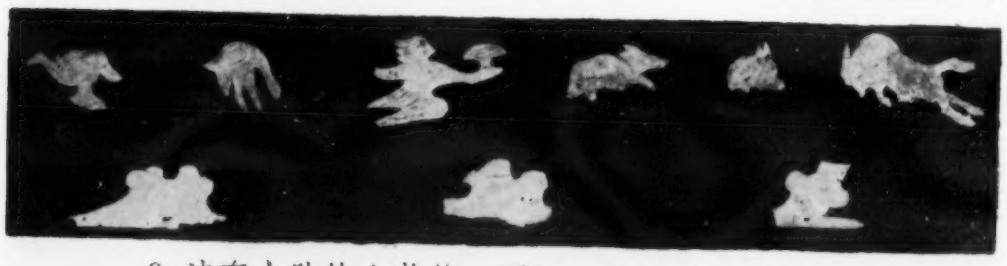
6. 水晶珠　东汉　长沙五里牌(M 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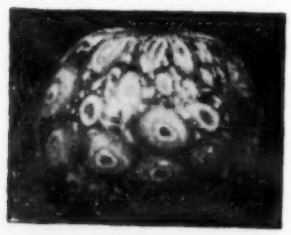
7. 瑪瑙圓珠 东汉 长沙五里牌(M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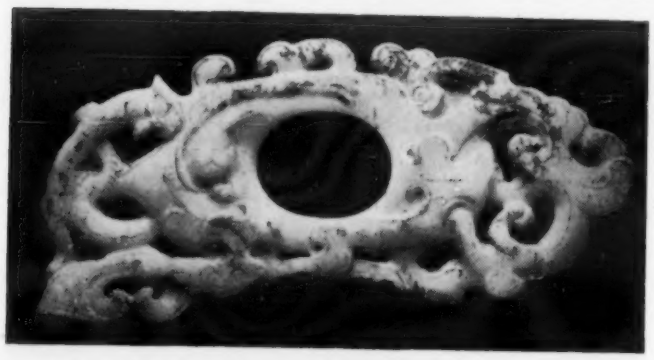
8. 蕎麦形金飾(右)亚形飾(中)細腰形佩管形金飾(左) 东汉 长沙五里牌(M 009)



9. 漆奩上貼的金花飾　西汉　长沙五里牌(M 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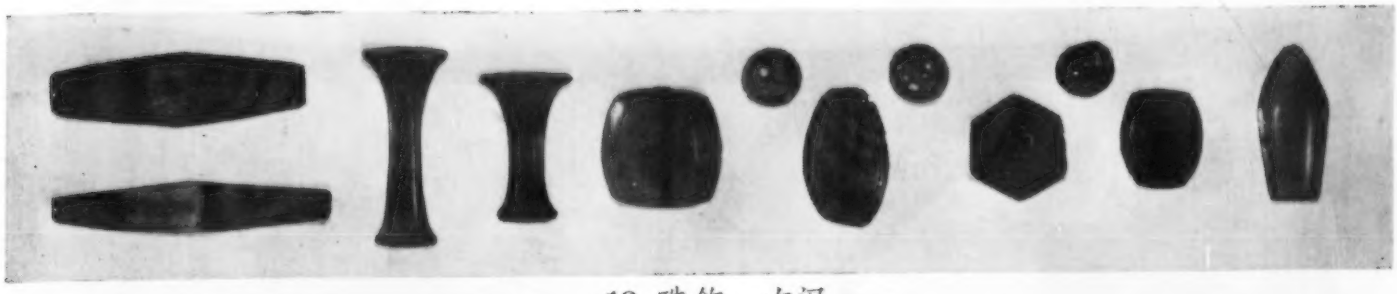


10. 料珠　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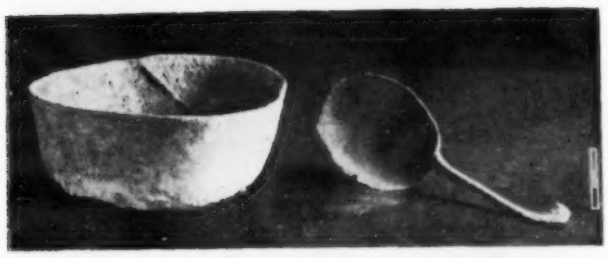


11. 玉佩　新莽　长沙五里牌(M 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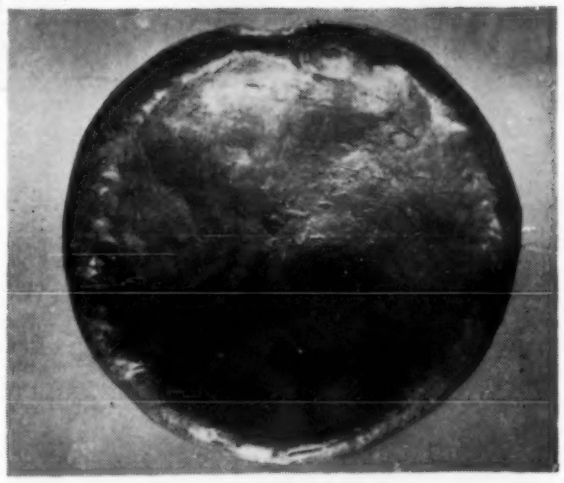
12. 玉剑珥　新莽　长沙五里牌(M 007)



13. 珠飾　东汉



14. 銀碗、銀調羹 东汉 长沙五里牌(M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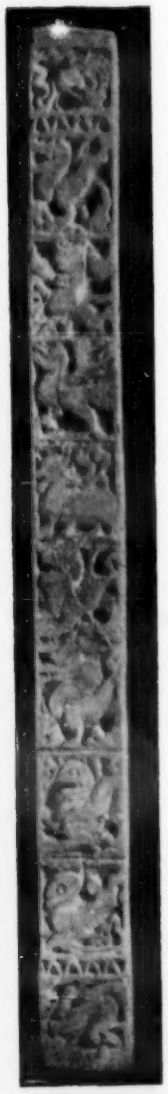


15. 金餅 东汉 长沙五里牌(M009)

16. 鉄鼎　战国　长沙柳家大山 (M035)

17. 刘氏七娘鏡　五代　53 长子 M30

18. 笭床　战国
长沙五里牌
M013:11



19. 銅尺
东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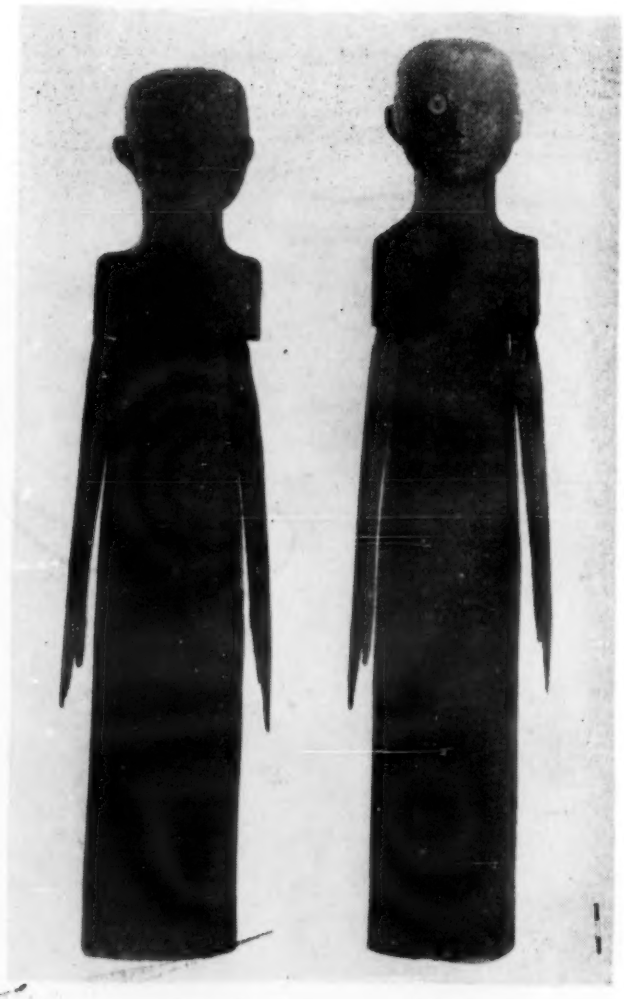
20. 漆几　战国

21. 骨印　战国　长沙柳家大山
(M033)

22. 漆几(侧面)　战国

23. 陶子母俑　东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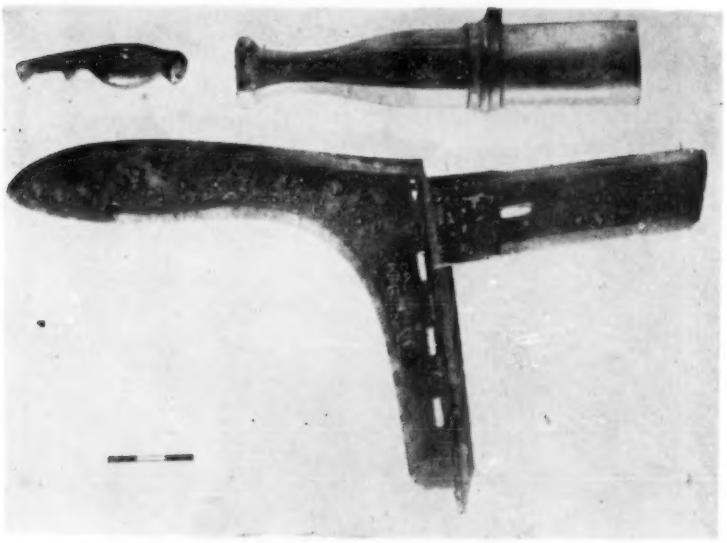
24. 竹席　战国　长沙柳家大山(M033)



25. 木俑　战国

26. 銅香斗兽柄的細部
长沙赤峰山2号唐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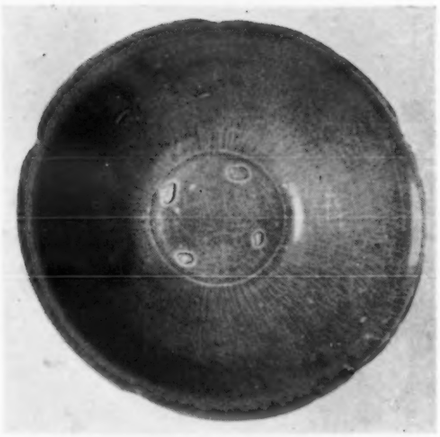
27. 銅香斗　长沙赤峰山2号唐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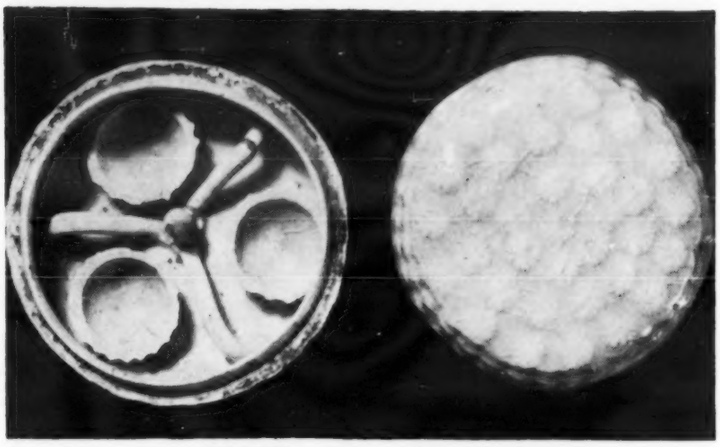
28. 銅戈、钥、鐓　战国　长沙柳家大山(M011)

29. 銅奩　东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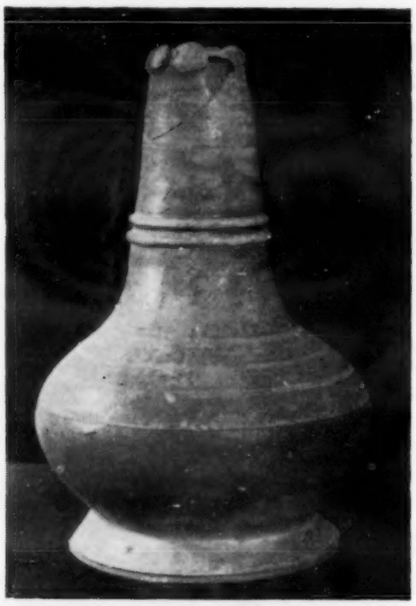
30. 銅提梁壶　战国
通高38、腹徑18厘米



31. 葵花形陶碗　北宋　(81:1)



32. 粉青印花瓷盒　南宋　(240:3)



33. 陶瓶　西汉　长沙柳家大山(M054)

34. 鸞凤啣花鏡　北宋

35. 銅鏡　长沙赤峰山2号唐墓

36. 蓮花鏡　五代　(196:4)

湖南省从廢銅中檢选出的文物

(文見75頁)

1. 画象銅鍾的花紋(局部)　东汉

2. 梟卣(盖与提梁后配)　商

3. 梟卣(盖后配)　商

4. 虎錞　战国

5. 楊子贛銅鋬　西汉

6. 銅鋬盖部銘文

7. 刻有特殊图案的錞于正面及側面　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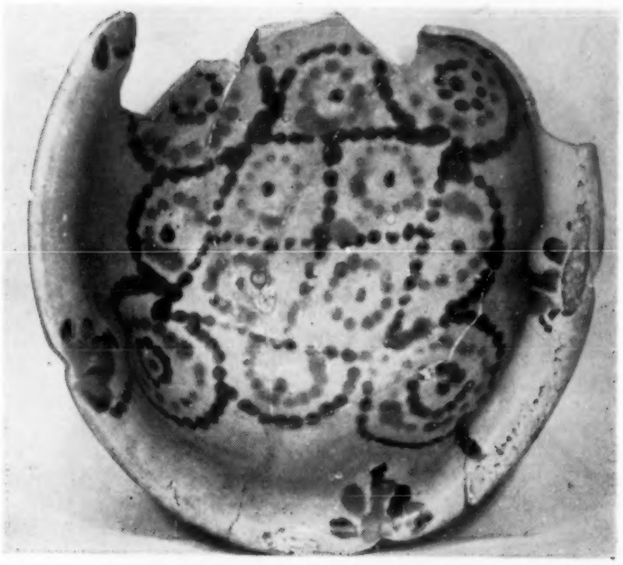
8. 十二生肖銅鼓(鼓面部分)

9. 十二生肖銅鼓

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出土遺物

(文見67頁)

1. 青黃釉綠褐彩繪花鳥壺



2. 黃釉褐綠彩繪花形大碗

3. 褐釉印花瓷片

4. 青釉褐彩碗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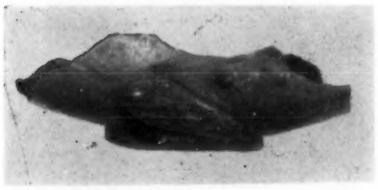
5. 青黃釉褐彩貼花壺

6. 青釉两系綠彩壺

7. 白釉綠彩瓜形壺

8. 黃釉褐彩碗(正視)

9. 黃釉褐彩碗(側)



10. 黃釉羽觴

11. 黃釉褐綠彩
繪盘片

12. 青釉印花高足杯片

13. 白釉綠彩殘壺

14. 黃釉褐綠彩鷄形壺

湖南古代墓葬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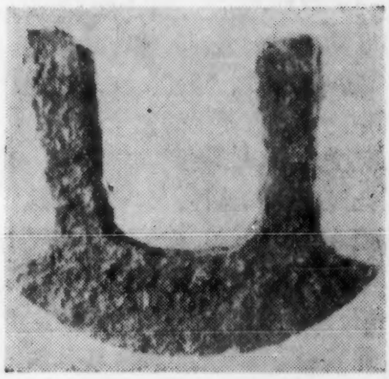
高至喜

在党的正确領导下，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在飞跃地向前发展，文物考古工作也随着蓬勃地发展起来。我省历年来配合省內各县、市基本建設工地清理发掘的古代墓葬达五千余座，出土文物四万三千余件。特别是其中的一千余座楚墓，更是丰富多采，提供了大量的新資料。兹将各时代墓葬的主要特点，簡述于下：

一、楚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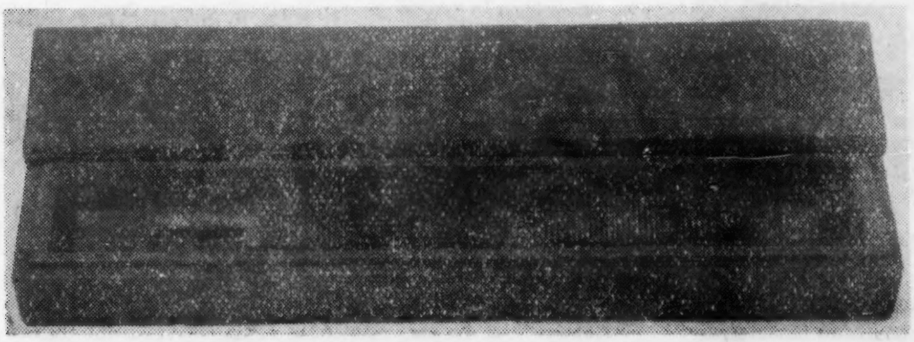
湖南屬于楚以前的墓葬，至今尙未发現。楚墓在长沙、常德、衡阳、郴县、湘潭、湘乡、耒阳、株洲、醴陵等县市均有发現。其中以长沙最多最好，共达一千二百座以上。木槨墓中保存了大批纖維质地的极珍貴的文物，是研究历史的难得的資料。常德、衡阳次之，各有一百座左右，常德也出有很好的木槨墓。其余地区仅数十座或数座。

长沙的楚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墓时代相当于春秋，最晚至战国初。共一百座左右。分布地区紧靠长沙城近郊。墓葬形制一般很小，都是土坑竪穴墓。大多带有"头龕"或"吊龕"，个别的有边龕和"腰坑"，"腰坑"內埋一陶罐。少数墓还带有"台阶"，个别的墓开始有斜坡墓道，塡土为鮮紅色"朱夹子"土，难見夯土痕迹。随葬物常見的为輭陶器，多飾绳紋、弦紋，也有少数硬陶和带褐色薄釉的陶罐，多飾方格紋、米字紋。陶器常見"鬲、鉢、壶、豆、罐"，"罍形器、鉢、豆"，"壶、鉢、豆、罐"三組成套出現。每組中又多缺少其中的一件或两件乃至三件的，但前两組必出鬲或罍形器。組合形式复杂而不統一，可見这时的丧葬風俗尙无統一制度。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性器物是陶鬲、罍形器和绳紋圜底壶，豆也較多見。此外还有素鏡，或带一道凸弦紋的素鏡和簡单的羽状紋地四山字鏡。劍有匕首式的黃銅短劍、空莖劍、带两道凸箍的实莖劍及两色分鑄和嵌鑲綠松石的劍等。銅矛、銅斧、带鈎等也有发現。鉄器有鑿、鋤、削等，都出于墓底，应是有意随葬。鉄削与陶鬲同出，鉄口鋤（图1）与罍形器共存。鬲与罍形器有共存的情形，一般陶鬲早于罍形器。



1. 鉄鋤　春秋至战国初期

中期楚墓大致相当于战国前期。共有六百余座。这时墓葬形制以小型土坑墓为主，但較前寬大的和带墓道的墓加多。边龕也相对地加多起来。陶鼎、敦、壶成套出現，少則一墓一套，多則四套。陶鬲絕迹，为鼎所代替。还出勺、豆、鉢、罐、瓿、盂、紡輪等。銅鏡除常見的素鏡和山字紋鏡外，还有純地紋鏡、四叶紋鏡、方連紋（菱形紋）鏡及变化复杂的山字紋鏡等。鉄器出土的种类和数量都增加了，生产工具有鋤、鑿、夯錘、鏟、刀等，兵器常見的是戈、矛、劍、矢鏃等銅兵器。此外还有銅砝碼、印、鈴、奩、鑒、环等銅器及盒、奩、耳杯等漆器和其他一些石、玉、瑪瑙、琉璃等装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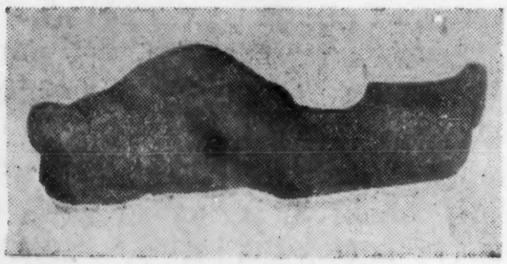


2. 带漆鞘劍和木劍盒　战国

晚期楚墓共約四百余座，时代約当于战国后期。长方形窄坑墓进一步減少，寬坑墓加多。前者約占四分之一，后者約占四分之三。特别是由于使用大量"白膏泥"（即陶土，粘性甚强，密度大）封閉木槨，尙有四十余座保存有木棺槨。头龕相应地減

少，边龛相应增多，也出現个别的洞室墓和合葬墓。木棺槨都是用巨大的楠木或柏木做成，应用了挂榫、子母榫、边搭榫及細腰等套榫結构。有的边箱內还有可旋轉的門板(見"考古通訊"1957年5期37頁)，有的棺外纏以絲带，有的槨外罩有篾篚。(見"文物"1959年10期6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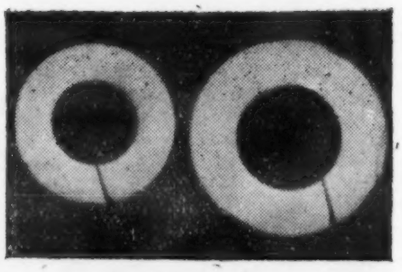
随葬物中的陶器，除了"鼎、敦、壶"继續盛行外，又出現"鼎、盒、壶"的組合形式。同时还增加了鈁、熏炉、盘、匜、鐎壶等新器形。銅鏡紋飾更趋繁褥，連弧紋、兽紋、龙凤紋鏡，相继出現。銅兵器中的戈、劍、矛上的艺术装飾，更为讲究，鏤鑄鳥篆、銘文的很多。长胡四穿的戈、銅戟、銅弩机等都在此时出現和盛行。銅容器有鼎、壶、奩、盘、匜等，壶（頁27图30)、奩上有的花紋十分精美。此外，还有天平、砝碼、印璽、带鈎等。鉄制生产工具有鋤、鋸、削、鑿、夯錘等。鉄劍、戟、鏃也开始盛行。日常生活用具的鉄鼎、杯及鉄足銅鼎也都有出土，可見这时鉄器的使用已很广泛。漆器有盾、弓、耳杯、盘、盒、奩、笭床、鼓、劍鞘等，髹漆工艺和装飾艺术都具有很高的成就。木器有俑、鎮墓兽、梳、篦、斧、劍、劍盒、矢箙等，雕刻技术已相当成熟。絲織品的品种很多，且有龙凤树枝紋的刺綉（見文物1959年10期65頁）和几何紋印花絲被



4.銅戈钥　　战国

5.綠釉陶狗　　东汉

等出土。皮制物有皮带、馬鞍形物及殘皮革等。此外，还有毛笔、竹簡、琉璃、玉雕器。这些难得的楚文物，充分反映了楚文化的光輝燦烂的面貌。



3.玉　玦　　战国

常德的楚墓与长沙的楚墓，大致相同（見考古1959年12期)，但也有其地方特点。如常德早期楚墓中的陶鬲口小、腿粗矮，襠寬大，陶豆出土較多，壶多呈瓶状，敦有奇形的小平底；漆器在1958年德山10号墓中首次发現了夹紵胎的漆奩和一个精致的漆几（頁26图20、22)。还有大型圓耳、方耳的漆耳杯，也为长沙所少見。木弓一件，弓身呈六棱形，一端有两个小圓孔，另一端有两个小缺口，可推知其装弦的方法。带漆鞘的銅劍和木劍盒，也有出土（图2）木俑較高大，手为附加的是其特点。（頁26图25）蟻鼻錢曾有大量出土。58年德山5号墓中一次出了189个，都很完好。大五山銅鏡，也十分精美，屬少見之物。

此外，在衡阳、株州、湘沅、湘乡、耒阳、郴县等地的楚墓，与长沙地区大同小異，但出土物比較簡朴粗糙。唯衡阳出土的兵器較多，有鉄矛出土。并常出一种有黃褐色釉的双耳陶瓿。株州的战国墓中陶豆普遍出土，璜形飾、鈴出土較多。(考古，1959年12期686頁）郴乡、湘乡也有出陶鬲的早期楚墓。郴县出土的銅飾、戈钥和羽状地方連紋鏡、玉玦及銅飾物的花紋，都有一些地方特点。（图3、4）

二、汉墓

汉墓出土地区比較广，长沙、衡阳有大量出土，常德、益阳、耒阳、零陵、郴县、湘乡、邵阳、宁乡、湘阴等地也都有发現。共一千余座，长沙占八百余座，其中西汉墓六百余座、东汉墓約二百座。衡阳一百余座。其他地区数座或十数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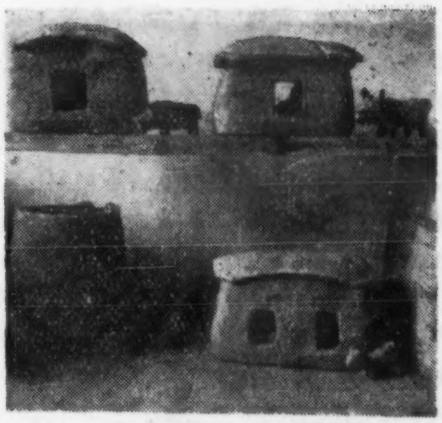
长沙的西汉前期墓有四百余座，仅一座保存有棺槨，其余都是土坑竪穴，少数带有斜坡墓道，墓底有横式枕木沟，与战国晚期墓的形制大体相似。随葬物以胎质松軟火候极低的軟陶为主，也有少数硬陶和釉陶。陶器組合主要为鼎（矮蹄足)、盒、壶（多为假圈足)，或外加罐、鈁、甑、鍑、熏炉、鐎壶、勺、杯等。陶盒大量出現，敦已絕迹。这时泥质冥币大量出現，有"郢称"、"郢爰"、"郢寽"

"賜上金称𨱗郢"、"吳国訾郢"及"鄩"、"称"、"金"、"两"等字的泥块，还有无字泥版和泥"半两"等。"郢爰"本是楚国的貨币，独不見楚墓中出土，而常見于西汉墓中。兵器这时显著减少。銅鏡除保留一些战国鏡外，新兴带銘文的蟠螭紋、蟠云紋、四乳四龙鏡等。滑石器开始盛行，有石璧、鏡、耳杯、盘、石劍具、带鉤等。此外还有琉璃璧和印章。

西汉后期墓共三百余座。墓葬形制变化不大，不过墓室继續加寬加大，墓道多为阶梯式，枕木沟多纵貫两端，設台阶的很少。木槨墓常有发現，墓底水沟常用卵石鋪塞。木槨四周有用木炭填塞的。随葬物除了前期常見的鼎、盒、壶、鈁、罐、罐、熏炉、方形火炉、鍑、甑、盘之外、又增添了灶井等模型器。带釉陶器增多，有一种形体很大的褐釉陶壶上刻划有生动的走兽紋，是陶器中的精品。方格紋陶罐，大量出土，肩上往往刻有文字数字。銅鏡多見銘文带、草叶、連弧百乳、四虺及"日光"、"昭明"等鏡。銅器还有壶、盉、灯、盘、鋬、甑、熏炉、火炉、碗、印章等。滑石器大增，器形有鼎、壶、鈁、杯、熏炉、猪。其中較特殊的文物有58年长沙楊家山1号墓中出土的玉衣及58年长沙五里牌1号墓中出土的銅药杵臼（見考古1959年12期图版壹）兵器有增加的趋向，常見长鉄劍、环首鉄刀等，貨币常見五銖錢，泥字块极少見。而泥"五朱"、泥金餅、泥"半两"則大量出土，最多的一墓可出数百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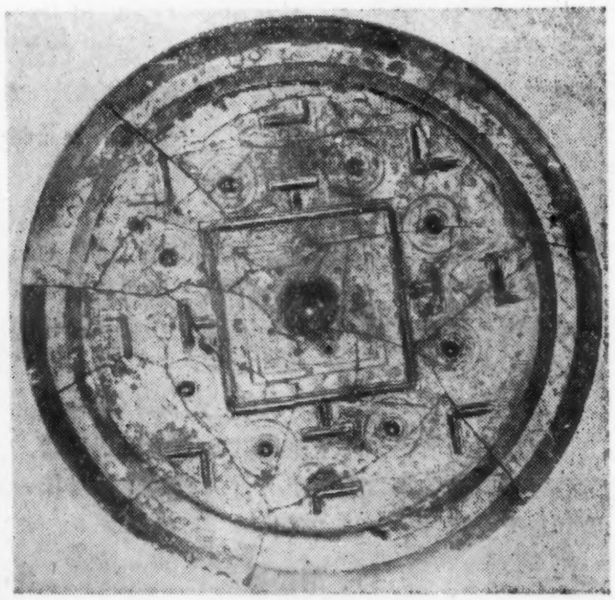
衡阳的西汉墓中出土了不少鉄"半两"錢和大量印紋釉陶罐，无釉硬陶罐，器形瘦长。低火候的軟陶极少，是其特点。其余与长沙的西汉墓基本相同。

新莽墓仅在长沙发現了二十余座。墓葬形制除继續保持西汉土坑墓的形制外，磚室墓开始兴起。共发現四座。土坑墓中有带墓道和无墓道两种。无墓道的形制略小，枕木沟仍是纵貫两端。磚室墓为券頂单室或前后两室，墓底并有高出一层磚而形成的"棺床"。墓壁是单墙平磚直砌。随葬物基本上沿襲了西汉晚期的遺制，但模型器灶、井、狗、猪之类增多起来，鼎、盒、壶少見或变形。硬胎釉陶大量出現。鈁还个别地存在于磚室墓中，但形体已甚小，到东汉时便完全絕迹。銅器中有一种鎏金的环首短銅刀，十分精巧特出。尙方規矩鏡及四神銅鏡开始出現。59年长沙五一路7号墓中还出有一件銅七枝灯和虎子，这是全国少見的文物。同时出土的有壶、甑、鍑、奩、盘、碗、勺等大批銅器及銀碗、玉璏、劍飾等。內容很丰富。貨币常見有"大泉五十"、"貨泉"、"貨布"及鉄"大泉五十"等，此外泥金餅、泥"五朱"还有出土。金餅在56年长沙桐阴里也出土一件，重138.3克，直徑4.2，厚1.1厘米。



6. 陶猪圈　陶牛圈
陶水井　陶碓坊　　东汉

东汉墓的分布地区較广。长沙、衡阳、郴县、耒阳、零陵、益阳、常德、宁云、邵阳、湘阴等都曾发現过。长沙最多，共二百座左右。磚室墓特别風行，土坑墓只有极少的几座，而且不是純粹的土坑墓，往往用了一些磚，或在墓道口放二口磚，或墓底腰中鋪一列磚，或墓底鋪滿磚。磚室墓有券頂长方形单室，狹长形前后两室，前后两室带龕或带耳室，带甬道的"凸"字形、"亚"字形以及两个长方形墓室并排中以甬道相連的合葬墓。此外，还有一些少見的"十"字形、"廿"字形、带耳室的亚字形、带耳室的两亚字形并排的合葬墓、三室并排的多室磚墓、多耳室的磚室墓和无券頂的"亚"字形磚壙墓等。其中以长方形单室、狹长形前后两室和"亚"字形墓为最常見。土坑墓、长方形单室磚墓和狹长形前后两室磚墓都是較早期的，并一直延續到晚期。长方形单室磚墓小而簡单，可能是屬于一般貧民的墓葬，因而数量最多。磚为青色，磚側多印几何紋、錢紋、动物等，后期的开始印有"长宜子孙"、"长乐未央"、"大吉"和年号。



7. 鎏金規矩禽兽紋鏡　　东汉

随葬物一般較丰富。早期的基本上沿襲着西汉、新莽的遺制，多硬陶和褐釉陶。中期出現一种紅胎綠釉陶器。器形常見有鼎、壶、盉、博山炉、盘、碗、灶、井、仓、廪、屋、猪圈、鸡塒、狗(图5)、俑（頁26图23）等。末期出現了黃綠色釉开冰裂紋的青瓷器，和用高岭土燒成的质地洁白而坚硬的有兰色釉的瓷珠。还有一种粉白胎的高圈足碗，恐屬于低火候的瓷器，証明东汉是瓷器的創始时期。陶器的特点是模型器大量出現，有屋、灶、井、仓、猪圈、鸡塒、廪、猪、狗、鸡等，是研究当时建筑技术和人們生活情形的可靠資料。鉄器大量出土，有斧、鏟、鋸、刀、鉄軸紡輪、劍、棍、釜、三脚架、火鉗、灯、夹子、鏡、錢等。鉄劍最长的达1.14米，鉄刀最长达1.285米，能鍛打出这样細长而鋒利的兵器，可見其炼鉄技术已达高度水平。这时鉄器虽盛行，但銅器仍占一定比例，有鏡、鼎、壶、盉、瓶、簋、盘、碗、耳杯、奩、（頁27图29）刀、矛、弩机、尺（頁25图19）等。特别以銅鏡为最多，不論是冶鑄技术、艺术技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其中如規矩四神鏡、禽兽紋鏡、龙虎鏡、神兽鏡及貼金鏡、鎏金鏡（图7）等非常精美。还有一种陶鏡，上面繪紅色紋飾，是极少見过的。用琉璃、琥珀、瑪瑙、水晶等作为装飾之風极盛（頁25图13），有的还雕成羊、獅等生动的形象。59年长沙五一路墓9出有大批金器，計有手鐲、戒指及各种形状的珠飾，十分精巧。特别是一金餅重达234.5克，直徑7.1厘米。底部阴刻有一"張"字(頁25图15)。这些金飾和金餅的发現反映了当时冶金技术水平，并为研究当时的金融貨币增添了新資料。

衡阳蔣家公山的大型东汉磚室墓中出有一商代銅爵和一西周銅觶及一金餅。金餅上刻有"冲土王"字样，重約312.5克（見"文参"1954年6期53頁）。这些都是少見的文物。

9.空心磚　东汉

耒阳的东汉墓，除了有和长沙一带相同的磚券之外，有一种土洞磚壙墓和磚壙墓，只用磚砌墙鋪底，而无券頂，又有一种用青石块鋪底砌墙的石壙墓，亦无券頂。(見考古通訊1956年4期27頁)。随葬物有濃厚的地方特点，多系手制，模型器特别矮小，厚重粗糙，多印方格紋，不上釉。出有蒙古包式的鸡塒、方盒形卷檐式猪圈、壶形灯、瓿形器等。

零陵也发現有磚壙墓。益阳市三里桥还发現有东汉末期的两側带耳室、后端带吊龕的土洞磚底墓，出酱色釉的四耳罐和"君宜高官"、怪兽紋銅鏡。

常德的东汉墓中出有两层、三层的陶楼（見考古1959年11期624頁）。宁乡大屯营的东汉磚墓中用三块空心磚砌成墓門框。磚长56.8、寬26.4、厚16厘米，印有叶紋。墓中还出牛圈、碓屋，碓屋內設有臼、篩、杵等物。屋頂无瓦瓴，似为茅屋，这些都是湖南首次見到的文物。(图6、9)

8.陶俑　宋

三、晋　墓

在长沙、常德、郴县、浏阳等地都发現有晋墓，安仁南坪公社等地也发現晋墓群。长沙的晋墓共三十余座，全是磚室墓，墓壁两壁或四壁作弧形，砌法是"三平一竪"。出有永宁二年（公元302年)、宁康三年（公元375年）及升平五年(公元361年）的石衣物券等有年号的墓三座，是断代的可靠依据。出土物主要是带釉陶器，即所謂半陶半瓷的青釉器。器形有鸡首壶、四系壶、罐、盘、碗、杯、熏炉、多足炉、果盒等。特别是永宁二年墓中出土的各种陶俑十分引人注意，計有立俑、坐俑、騎俑、跪俑等約四十件（見考古学报1959年第三期)。其中有持刀的、持盾的、捧物的、背杂物的；着长裙的、着尖帽的、圍头巾的；还有作书写状的、(图見本期封面）作彈瑟歌唱状的、对坐若有所言的、作祭祀状的、吹奏的等等，形象非常生动。这些是研究当时的服装、馬具、人們的活动和豪强割据情形的可靠資料。此外还有成对的石猪、石硯、鉄鏡和各种珠飾等物。

浏阳发現有大康八年（公元287年）的磚墓。出土口沿有菱形和細小方格紋的釉陶碗及四系壶、四系罐等。郴县的晋墓中出有青綠釉的碗、壶和一顆十分美丽的料珠。(頁24图10)

四、南朝墓

南朝墓仅在长沙地区发現了十三座。形制有磚

室墓和土坑墓两种，以磚室墓为多。形制和随葬物均大体与晋墓相同。釉陶器的釉水更为匀潤美观，出現青瓷瓶、蓮花形盂、多足硯等造型别致的器皿。銅鏡有的小如紐扣。

五、隋　墓

隋墓只在长沙发現約十座，磚室墓和土坑墓都有。磚墓两壁仍带弧度，砌法也是"三平一竪"。陶器中有一种酱釉，十分美观，釉下划团花、草叶、花瓣等，盛行下部露胎，碗只在口沿处塗一层厚厚的釉。器形有高足盘、六系壶、粉盒等。隋代的五銖錢出土不少。

六、唐　墓

唐墓仍以长沙地区为主，衡阳、常德等地也有一些。长沙共出土五百余座。狹长形的土坑墓最流行，磚室墓較少見。有的土坑墓墓底有对称的方形或圓形柱穴，有的头部有台阶或龕坑。磚室墓有单室、前后两室、前后室带耳室及双室合葬墓等四种形制。砌法多"三平一竪"，更有"四平一竪"、"五平一竪"的。随葬物多为陶瓷器，施黃褐色、淡綠色和黑褐色釉，器形以壶、盘、洗、瓶、罐、罈最常見，还有陶胡俑、彈琵琶俑、文官俑、武士俑、馬夫俑及十二生肖俑、馬俑、駝俑等。銅鏡多圓形、菱花形两种，也有方形。紋飾多禽兽葡萄、五獅十二生肖、宝相花及各种花鳥等。銀器、石猪、石硯等也有所发現。

七、五代墓

五代墓只在长沙地区发現二百余座，全是土坑墓。出土的鉄器工具有犁、鐮刀、小削刀、交股剪、釘錘等。陶瓷器有瓶、洗、盒、杯、碗、碟、壶、多角罐等。白瓷多碗、碟，青瓷甚少。陶多角罐，具有显明的时代特征。銅鏡中出"都省銅坊"鏡，鑄有李成、謝昭等匠人名字。貨币最多的是楚王馬殷鑄造的"乾封泉宝"鉄錢。

八、宋　墓

宋墓只发現有小型的土坑墓，长沙最多，达五百余座。其他地区較少。随葬物盛行一种壶形的陶瓶，几乎每墓必出一件，腹部的紋飾十分复杂，有直欞式的，鏤空新月形的，卷草形的，荷叶形的，蓮花划紋的，多层波状紋的等。此外瓷碗、碟、粉盒等十分精巧。銅鏡有鴛鴦蓮花鏡、鸞凤啣花鏡、云紋团花鏡、盾形八卦鏡、圓形花瓣鏡、湖州鏡及阴刻的"刘氏七娘"鏡等，一般制作都較粗糙。

10. 瓷烛台　　宋

岳阳一宋墓中出有龙泉窑的瓷壶瓶、瓶、烛台、花瓶及陶俑。(图8、10)

九、元明墓

元明时代的墓葬发掘較少，大部分都是土坑竪穴墓。随葬物很簡单，只有陶罐、瓶之类。常德西郊的明墓中发現有两件泥塑人物瓶。长沙絲茅冲发現过一座火葬墓，墓室长仅1米左右、一端有一龕，龕內置两个带盖黑褐釉陶罐，墓底有經燒过的碎骨片。这是仅有的一例，可能是元代的墓葬。常德德山还曾发現了一座巨型的明代磚室墓。墓寬达17米，进深13米，高6米。墓虽被盜，但还有不少石制用具如椅、案、桌及石壙志八块。壙志上刻有龙凤紋，記載着荣定王、李妃、楊妃的傳記。

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簡报

湖南省博物館

1959年8月24日至11月6日，湖南省博物館考古部曾派罗張、王作霖等同志，在市东区自老中心点附近的祗园庵、李家老屋至蔭塘灣一带，配合兴修五一路延长綫工地，清理了古墓葬十五座。其中有战国墓三座，西汉墓五座，新莽墓一座，东汉墓二座，宋墓一座，現簡介于下。

战国墓

共三座（編号为59.长五M013、59.长.五Mo14、59.长·五M015），均在祗园庵已平的山脊上，因这里原来是个旧村落，也有新的建筑物，有的墓就在这些建筑物之下。

一、墓葬形制：都是长方形土坑竪穴，有两座墓有斜坡式墓道，其填土为棕紅色的粗粘土，俗称"朱甲子泥"。一般墓口都大于墓底，墓壁平整，同时还有殘存的木槨板。

有墓道的墓底长3.14—3.75、寬2.08—2.95、現深2.90—4.80米，墓道平长（殘）2.28—2.24，寬1.36—1.56米，墓道口离墓底高1.20—1.40米。无墓道的墓底长2.60、寬2.40、現深1.70米。

发掘时在M 013的填土中，还发現有徑4.5、深1.5厘米的夯窩，土层显明紧結，每层厚10—15厘米。可惜的是两墓（另一座为M015）均已被盜，据說墓中有很多珍貴文物，但不知其詳。

二、出土器物：均系战国晚期一般性的，故不詳加介紹，个别特殊的，予以重点描述。

（一）陶器：有鼎二、敦二、壶二、勺一，共七件。

（二）銅器：

（1）鏡：弦鈕方鈕座，羽状紋地八叶四山紋，窄凸边，青黝如新，犹可映出清晰的影像。徑13.2、边厚0.5厘米。（M014：2，图28）

（2）劍：二件。以M015出土的最完整，出土时紧套在漆木劍鞘內，位于棺內之中部右側。喇叭形劍首，徑3.4厘米，圓柱形柄，有二部合成的护柄木。劍身有脊，刃鋒利，呈淡黃色。（M015：1，图36）

另1件：M014出土形如上式。

（3）戈：援长13、內长7.7、胡长8.9厘米，栏三穿，內一穿，并飾有簡单的龙紋。（M014：1，图35）

該墓还有戈鐓一，长短鼎腿三，勺一，勺柄长95厘米，中空有殘木柄，与口沿殘寬12厘米。

（三）漆木器：

（1）笭床：长1.72、寬0.38、厚0.02米。两端为深雕几何紋，中配以透雕"十"字形"亚"字形的图案。床面漆黑，两端及两长边的空隙处，飾以彩繪凤紋和方連紋。赭、紅、黃、褐，色調和諧，鮮明夺目。（M013：11，頁25图18）

（2）耳杯：数只，均殘破。

三、小結：

这次发掘，战国墓葬虽为数不多，但出土器物中有紋飾新穎的凤紋方連紋漆木笭床，和有护柄木的、套在劍鞘內的銅劍等，都是新的发現。

西汉墓

計八座，位于祗园庵、李家老屋、蔭塘灣等地。

墓的填土均为鮮黃色的細粘土，俗称糯米泥。也就是經过人工捶练的土。有的夯筑較紧，有的較松。个别的为鮮紅色粗粘土。

一、墓葬形制：

（一）有墓道的墓，四座（編号为59.长五M003、M005、M011、M012）。最大的墓底长7.1、寬5.22、殘深1.2米，墓道平长（殘）2.3、寬2.8、墓道口离墓底高0.5米。最小的墓底长3.9、寬4.4、殘深0.55米，墓道平长（殘）0.20、寬1.74米，墓道口离墓底高0.20米，墓道均为阶梯式，墓壁比較平整。其中仅一座有縱貫枕木沟。

方向：正南二座，南偏西一座，东偏南一座。

（二）无墓道的墓：四座，最大的墓底长2.9、寬1.89、深0.94米。最小的墓底长2.25、寬0.91、深0.94—1.80米。此墓并于墓室北端，离墓底高0.14米处有一小龕，寬0.57、高0.36、深0.40米。在墓室內的两近端均有横式枕木沟痕两道。葬具已腐朽。該墓葬在一座新莽墓下面0.63米。

方向：北偏东二座，西偏北二座。

二、随葬器物：大都成了碎片，不能复原，多是西汉墓常見之物。

（一）陶器：

（1）鼎十一件，有二件系黑衣紅胎，并飾以交錯的尖角紋，这是由战国或西汉早期的尖角雷紋簡化而成的，据破片看来，知为方耳、蹄足、鼓腹，并測得其口徑为18厘米。

（2）盒：九件。

（3）壶：十三件。其一为敞口、鼓腹，并有兽面銜环，假圈足，胎质紋飾与上述之鼎相同。

（4）方壶：二件，除足之边沿上有菱形紋外，其余各部的紋飾与鼎、壶相同。

此外有鐎壶一件、方格紋罐二十三件、（M12图19）、鉢二件、鍑三件、灶一件、泥金餅泥錢各若干个，共六十七件。

（二）銅器：

（1）鏡：五面，可分二式：

Ⅰ式：連弧紋鏡，半球形鈕，四叶紋圓鈕座，內向八出連弧紋，銘为："凍冶鉛华清而明，以之为口口宜文章，长年益寿去不羊（祥），与天无亟如日月之光"。徑18、厚0.6厘米。（M012：5，图29）

Ⅱ式：鈕与鈕座和Ⅰ式同。并銘为："长乐未央"，飾四乳四神，呈青黝色。徑21、边厚0.6厘米。（M012：3，图30）

（2）鎏金博山炉：飞鳥式鈕鏤空山川紋盖，折边盘形座，內有透雕双龙，座徑22、炉徑13、通高31厘米。（M012：7，图2）

三足灯：口徑11.7、灯盘深1.8、边厚0.2、足长5.4、柄曲长13.5厘米。盘中凸出小鈕，蹄足、柳叶形柄、曲折上揚。（MO12：1，图10）

（4）鎏金屈戌：长14、寬3.3、厚2.6厘米。体空有殘木痕，呈长条状。由外表可以看出分两部构成，相接处凸出一半圓形套榫模样，可以折成"V"形，有一面还有一小半环鈕。出土时它的旁边有小鉄刀和銅鏡各一件，此物用途不詳。

（5）鎏金盒：侈口、折唇、腹壁有紋飾，圜底，外部有凸弦紋一周。口徑39、唇寬2、高9厘米（MO12：6）

此外还有奩二件、五銖錢若干枚。

（三）鉄器：刀一件，灯一盞。

（四）玉石器：玉璧一件，石璧七件，石鏡一面。

漆奩：一件已殘破，留有貼金花飾（MO12）（頁24图9）

三、小結：

（一）通过这几座墓的发掘，我們从MO10与MO07的关系来看，进一步証实了狹长形带龕并出鼎、盒、壶的土坑墓，确系西汉早期或战国末期的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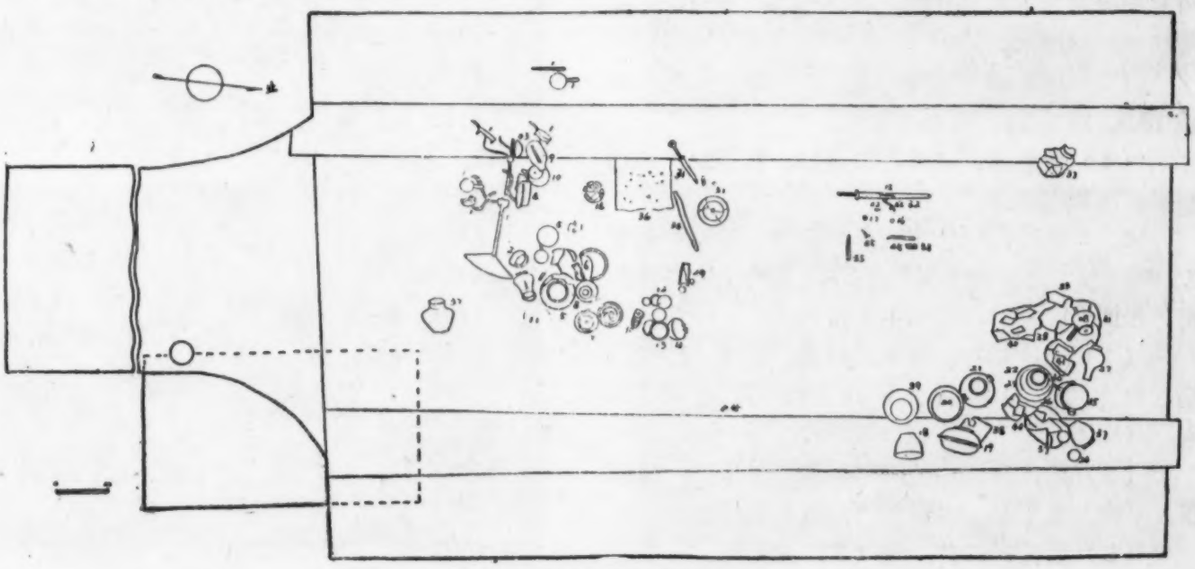
如M007是一新莽墓，而M010深葬在該墓的墓道口底下之右側，M010被M007所打破。

（二）长方形土坑竪穴无墓道的墓，如M004长3.16、寬2.40米，基本上是三与二之比。同时随葬物也由早期狹长形墓的仅有单一的鼎、盒、壶，逐漸增至有成对成双的，或不同类形的，此外更有麻布紋罐，玉或石璧，銅、石鏡等器物的出現。我們以为像这样的墓葬，定为西汉中期較为适宜。

（三）晚期的如M012为墓坑較大阶梯式墓道有纵貫坑木沟的土坑墓。器物有更多的陶质釜、甑、灶、水缸等模型或銅质实用器皿，如博山炉、鼎、鏡、三足灯等。

新莽墓（59.长五M007）

位于五一路延长綫东去之右側李家老屋，該墓



1."一"墓葬图（59长五M007）

正在李家老屋南側。

出土文物有：陶器、銅器、鉄器、料珠、玉器、石器等。其中較珍貴的有銅虎子及我省从未出土过的銅七枝灯。茲分别介紹如下：

一、墓葬形制及結构：斜坡式喇叭形的墓道，长方形土坑墓。墓底有纵貫枕木沟两道，在墓道底之左側，离墓道口0.68米处，有一长寬各0.24、深0.26米的方眼，右側离墓道口1米处有一圓形柱眼，徑0.17米。墓口較大于墓底。底长0.90、寬4.25、現深2米，墓道口离墓底高1.5米，墓道平长（殘）3.50、寬2.64米，斜度35°，枕木沟长7.20、寬0.40、深0.18米。（图1）

根据直入头足两端之枕木坑高出墓底0.40米来看，該墓原来是有棺有槨的，因填土沒有白膏泥作防腐层，因此即使是优质的棺槨也难保存。

方向坐南朝北。

墓的填土基本上是棕色細粘土，并带有黃沙泥，这种黃沙泥不是本土，而是从别处挑来的。

二、随葬器物：大部分都是放在內棺的两端，也有的是放在左或右側，如玉璧、銅鏡、兵器、金飾之类則放在棺內。

（一）陶器：一般火候很高，胎质坚硬。其中有褐釉或黃釉，但大部已脫落，还有无釉的及飾方格紋或凹凸弦紋的灰陶。胎质有灰砂泥胎、純細泥胎。夹砂泥胎硬度較强，純細泥胎硬度較弱。

（1）方格紋罐：八件，大的口徑13.5、腹徑23底、徑13.3、高24.9厘米。小的口徑12、腹徑15.5底、徑11、高13厘米。（图20）

（2）水井：侈唇、束頸，肩有弦紋三道，腹上鼓下縮，平底大于井身，并有徑1.6厘米的圓眼，可見原来是有木质井柱的，腹徑16.5、底边厚0.9、殘高9—10厘米。（图3）

（3）四耳罐：二件，斂口、鼓腹、平底，口徑13.5、腹徑24，高19.2厘米。

（4）黃釉罐：二件，口徑14、腹徑24、高19厘米。形如四耳罐。

（二）銅器：器物表面呈銅綠色，其厚度只有0.2—0.3厘米。紋飾不多，除部份器物上飾有兽面銜环和凹凸弦紋外，基本上是素的。

（1）鼎：二件，环耳，鈕盖、鼓腹、平底，扁三角形足，口徑16、耳高6.21、通高17.3厘米。（图4）

（2）奩：脊形凸弦紋环鈕盖，子母口，筒形腹、平底、乳丁足。口徑14.8、通高10.5厘米。

（3）盘奩：二件，与（2）奩相同。唯盖的子口沿后有三牙榫，三短蹄足，兽面环耳。口徑

2. 博山炉座　西汉

3. 陶水井　新莽

14.4、通高11.4厘米。出土时放在一徑25、边寬1.5、足高5.3厘米的三足盘內。（图9、11）

（4）提梁壶：二件，半圓形提梁，两端为張口龙首环，盖有环耳一对，子母口。鼓腹、平底、圈足。口徑10.3、腹徑17、通高22.5厘米。（图13）

（5）盉：侈口直唇，套榫子口盖，鼓腹，空心柄，平底、三角形扁足。口徑8.5、腹徑12、柄长8、通高16.5厘米。（图5）

（6）鍾：二件，斂口鼓腹，兽面环耳，身飾弦紋，平底、圈足。口徑11.5、腹徑21、高28.5厘米。

（7）盆：斂口，外折唇，沿下有兽面环耳一对，平底，三乳丁足。口徑27.3、高5.5厘米。（图12）

（8）盘：二件，形如盆而矮淺。口徑22.8、边寬1.5、底徑11.6厘米。

（9）盂：斂口，折唇、鼓腹、平底、圈足，口徑12.5、通高11厘米。（图8）

（10）甑：斂口、侈唇、直腹、兽面环耳，口徑25.5、腹徑23.8、高14.9厘米。

（11）釜：斂口、直唇、鼓腹，腹有寬1.8厘米的边，兽面环耳、圜底，底部表面有烟熏痕。口徑11.5、腹徑25、高20厘米。（图6）

（12）杯：直口筒形，腹壁上有鋬痕，口徑8、高20厘米。（图7）

（13）鍋：斂口、侈唇，綯形环耳，圜底，口徑20.3、通高9.5厘米。（图14）

（14）瓶：直口，細长頸，鼓腹、平底、圈足。口徑4.3、腹徑13.5、高24.2厘米。（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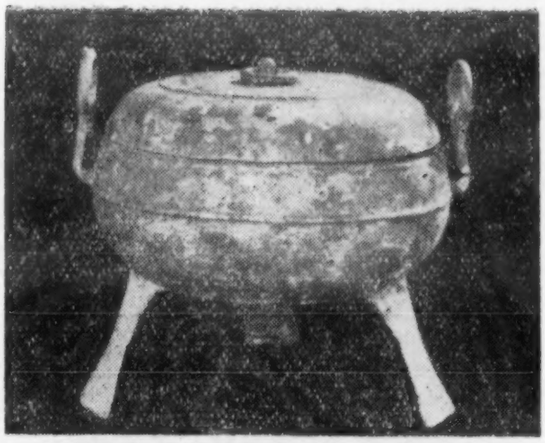
（15）貨币："貨泉"十五枚。

（16）印章：半圓形鈕，正方形印，无文字，也可能已腐蝕掉，长寬高各2.7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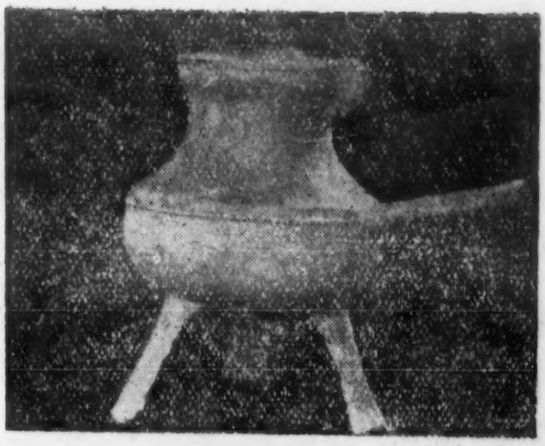
（17）勺：长瓢式，柄下有环，勺体圓深，长30.5厘米。（图25）

（18）碗：十四件，大碗二件，已破碎。小碗十二件，口徑11.2、高4厘米。

（19）鏡：半球形鈕，方鈕座，飾多乳規矩四神紋，齿紋和連枝紋边。徑16.5、边寬2、厚0.4厘



4. 銅鼎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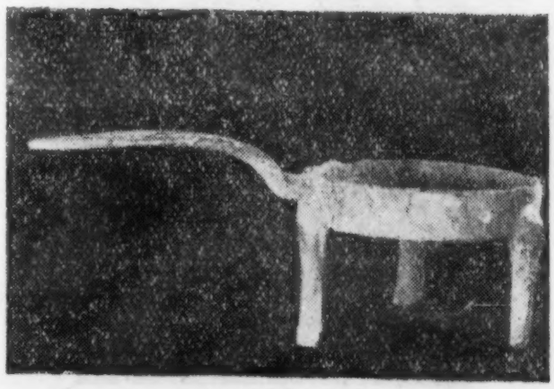
5. 銅盉　新莽

6. 銅釜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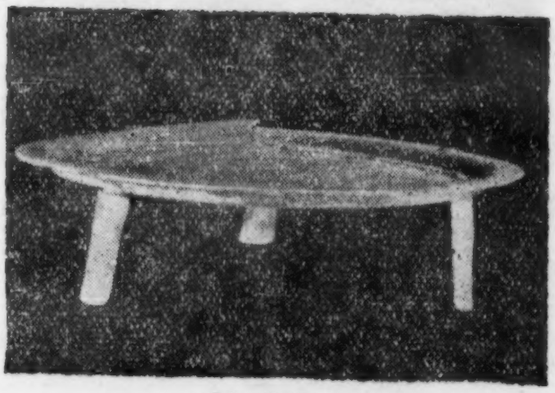
7. 銅杯　新莽

8. 銅盂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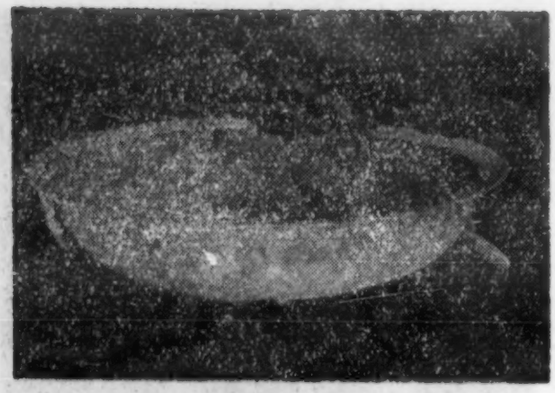
9. 銅奩　新莽



10. 三足灯　西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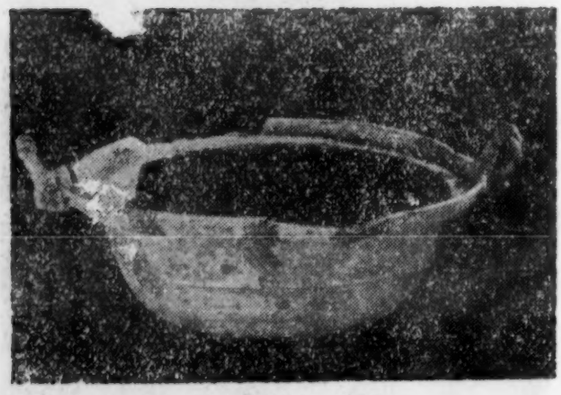


11. 盘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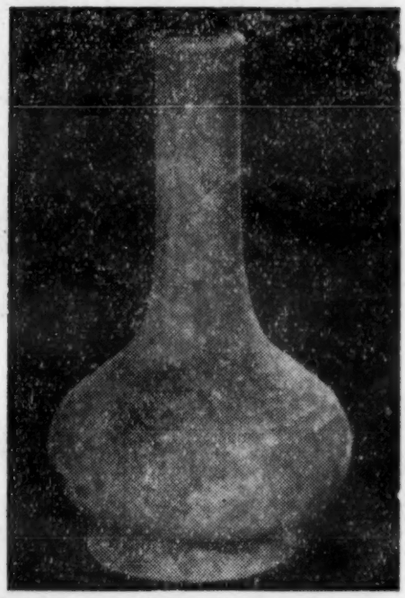


12. 銅盆　新莽

13. 銅提梁壺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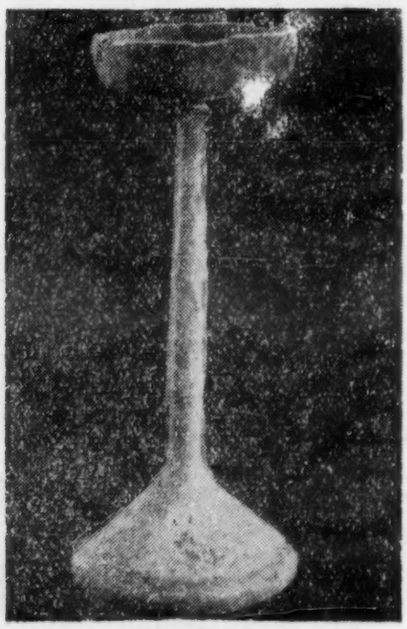


14. 銅鍋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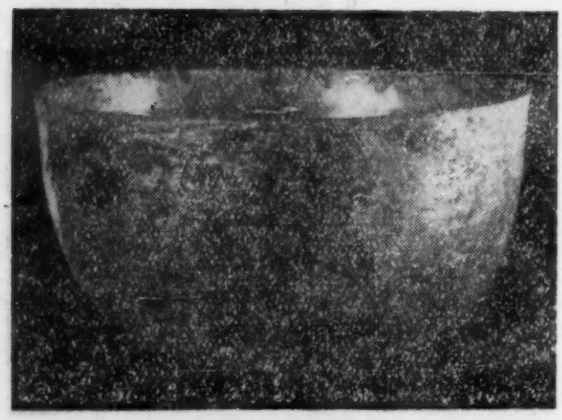


16. 銅瓶　新莽

15. 虎子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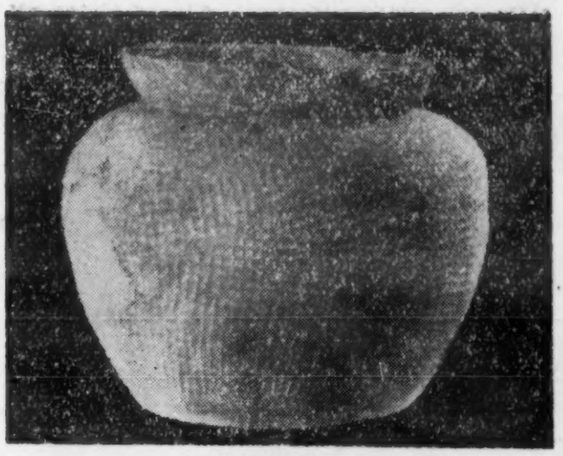


18. 銅灯东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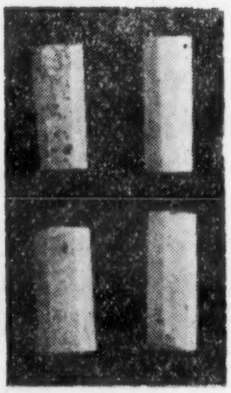


17. 銀碗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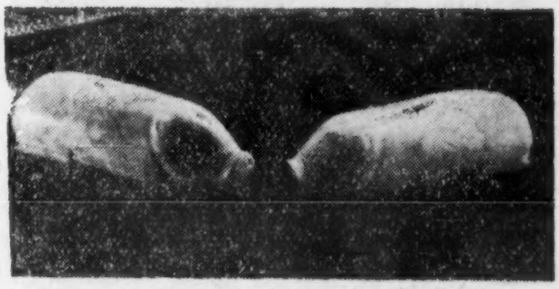
19. 陶罐　西汉



20. 方格紋陶罐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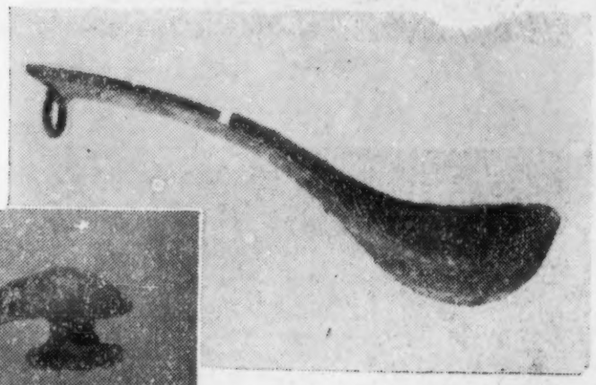


22. 八方形珠　东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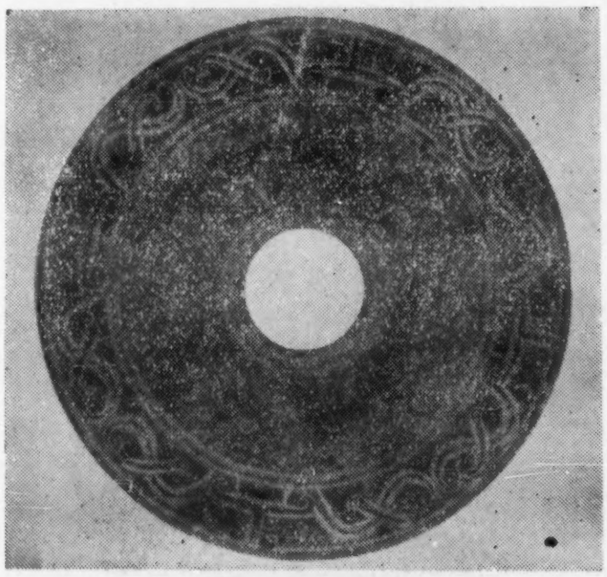
23. 玉猪　东汉

21. 陶水井　　东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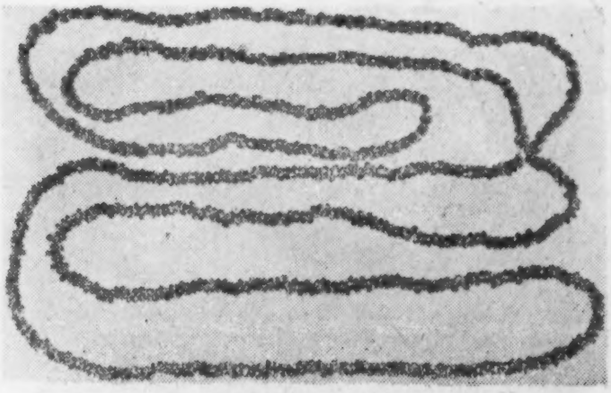


25. 銅勺　新莽

24. 銀带鈎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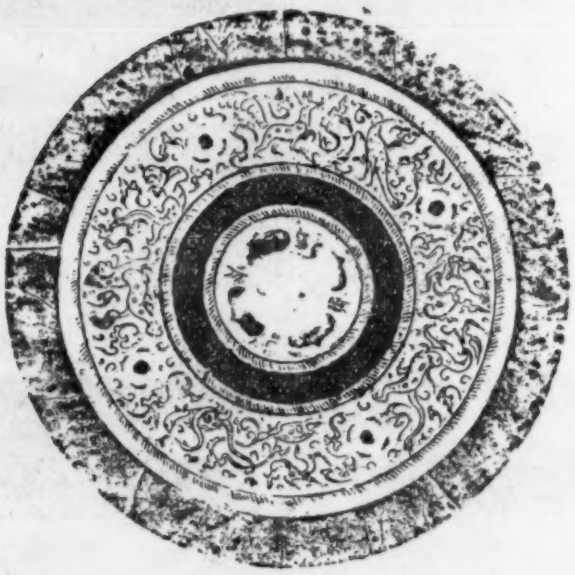
26. 玉璧　新莽



27. 料珠　东汉

28. 銅鏡拓本　战国(M014:2)

29. 銅鏡拓本　西汉(M012)



30. 銅鏡拓本　西汉(M012)

31. 銅鏡拓本　新莽(M007)

32. 銅鏡拓本　东汉

33. 銅七枝灯　新莽

34. 銅筒形器　新莽

米。(图31)

(20) 劍：长条形柄，玉劍珥，劍身稍带弧度棱脊，刃口鋒利，惜已殘断。柄长13.2、身长85、寬3厘米。(图37、40、41)

(21) 带勾：二件，龙首勾，遍刻纏枝紋，背面中間有圓鈕。长10.5厘米。另一件殘长 4.5厘米，无紋飾。

(22) 七枝灯：由灯座、灯柱、曲枝、灯四部构成。灯座呈复笠形，凸頂与灯柱成子母榫相接。灯柱又分三节，上两节各有曲枝三根，每一曲枝和柱的頂端各套一灯。灯为圓盘形，直口、平底，內有小錐，下有短筒，柳叶形柄，三蹄足。座徑40、柱长99、柱徑1.5—3.8、支柱曲长23—25.2、灯盘徑9.3、深2、柄长8.2、高5厘米。灯可以置上卸下，惜已断折，茲为复原(图33)。

(23) 虎子：圓頸直口，背有扁带形提梁，口徑5.9、身长30、寬12.5厘米。出土时位于墓主人之头部，其前有銅盘，后有銅灯，右有銀碗。(图15)

(24) 筒形器：长15、徑4.8厘米。筒口有子沿，口沿近处有耳或鋬痕。出土时，左有鉄刀，右与銅碗相邻，附近处还有一附件，徑3.5、高1.5厘米，直口，平底，壁部有一殘鋬鈕。(图34)

(三) 鉄器：

(1) 鉄刀：二把，小的一件殘断过甚。大的一件，环柄，厚脊单刃(附有玉飾一件)。环徑6.5、刃长2.44、寬3.6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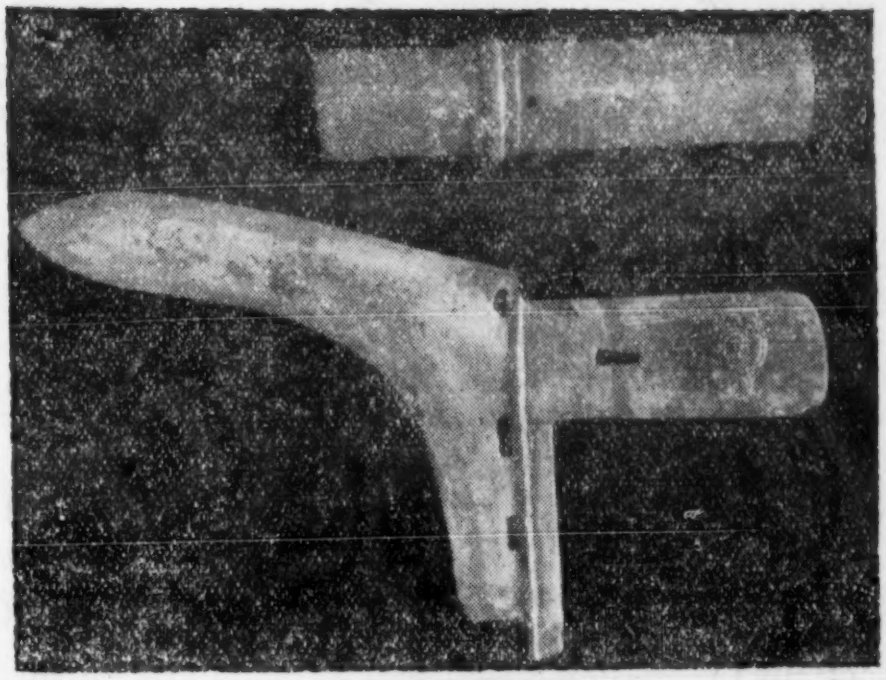
(2) 鉄釘：数枚，有徑4厘米的大釘头，长30厘米。

(四) 銀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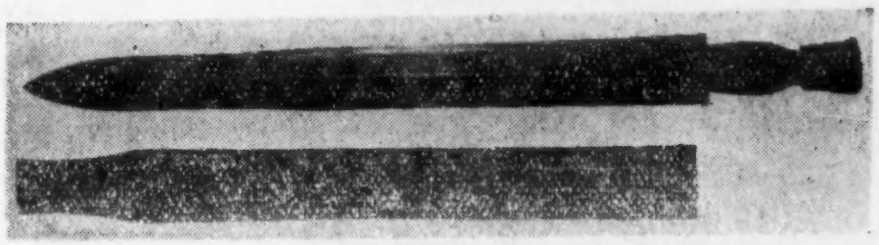
(1) 銀碗：直口內有弦紋一周，圜底稍向內凹入，完整无缺，銀白如新。口徑12、高6.4厘米。(图17)

(2) 銀带勾：一件(图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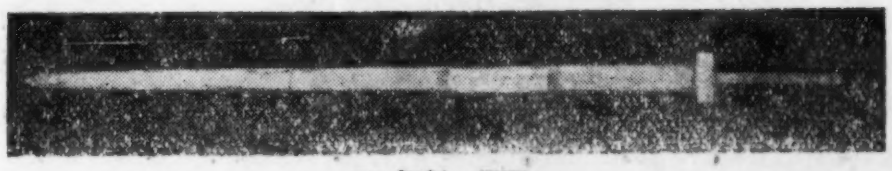
(五) 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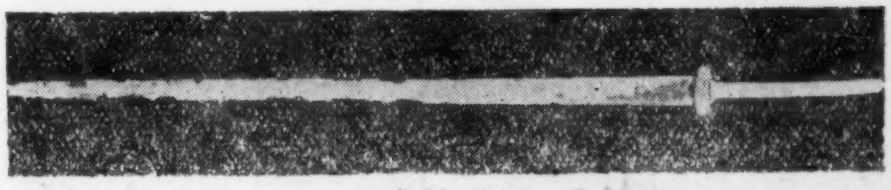
35. 銅戈附戈鐓　战国



36. 銅劍附鞘　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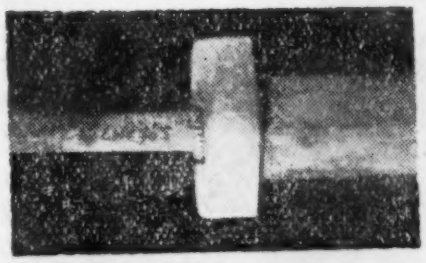


37. 銅劍　新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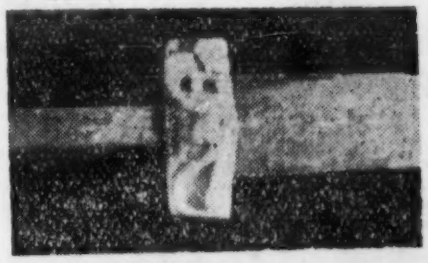


38. 銅劍　东汉

39. 鉄刀　东汉



40. 玉劍飾　新莽



41. 玉劍飾　新莽

（1）璧：一件，两面都飾有凤紋，渦紋，絢紋，呈青綠色。徑21.3、好徑4.8、厚0.4厘米。（图26）

（2）佩：中有橢圓孔，双龙环繞，雕刻很精，寬3.7、厚0.5厘米。（頁24图11）

（3）璏：长10.3、寬2.4、厚2.2厘米，正面浮雕以蟠兽紋，两端稍向背面弯曲，成小勾状，中有一长方形穿。（頁24图12）

（4）玉劍飾：长10.5、寬2.5厘米。正面雕兽紋，背面为饕餮紋。（图41）

（5）鉄刀玉飾：如劍璏，长6.8，寬2.1，淺浮雕五联饕餮紋。

（六）其他：

（1）石压板：长18.7、寬8.2、厚0.6厘米。

（2）料珠：若干粒，出土时位于死者头部。（封二图1）

三、小結：

（一）根据上述墓葬形制結构及其随葬物来看，多具有长沙新莽墓的特征。因此，該墓的时代，应屬新莽。

（二）談談这次出土的虎子：

（1）从历年来发表的报导来看，要数广州东山羊山路东汉磚室墓出土的一件虎子为最早，①但是这个虎子是发現于一座有喇叭式口、斜坡式墓道的，并出有"貨泉"以及其他具有新莽特征器物的土坑墓中。这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資料。

42. 鉄戟　东汉(M006)

（2）在目前的考古学界中，对虎子有以下两种不同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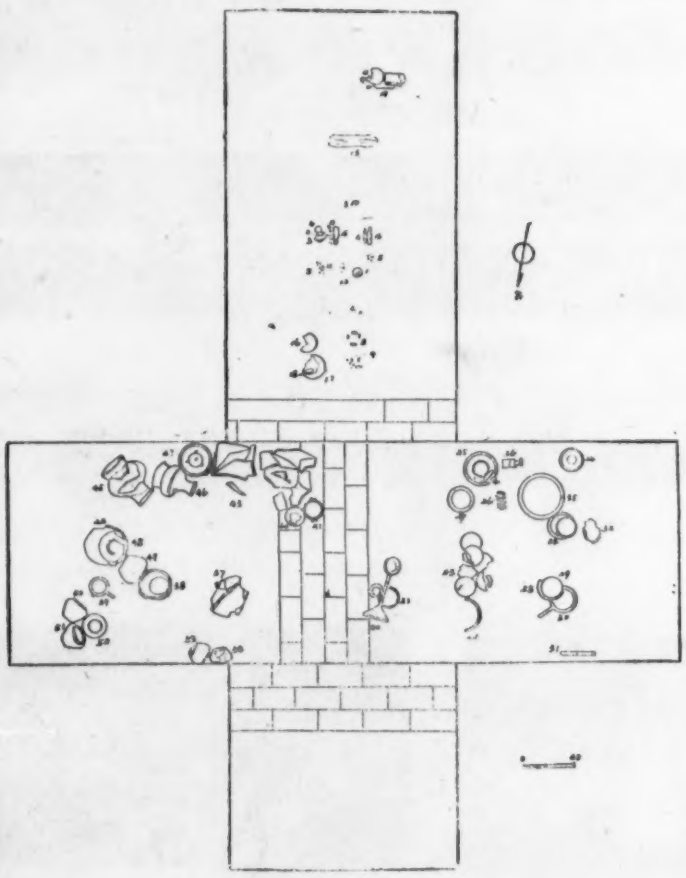
1. 兽体长形的青瓷虎子是盛水用器圓形的虎子是便溺器。①

2. 不管它是哪一种器形的虎子，似乎都不能說是盛水器或飲器。②

（3）根据这次虎子出土的位置来看，它是在墓主人之头部，同时它的前面，紧靠一銅盘，右有銀碗。因此，我們完全同意前一种看法。

（三）銅七枝灯的发現：

这不仅是在长沙地区或湖南境內第一次发現，就是从全国来看也为数不多，且是陶质模型，形制不一。如河南陝县出土的三支、九支灯，③山东章丘出土的三支灯④都是陶质的。而这次发現是銅质的，且其結构很完整。



43. "二"墓葬图(59. 长五M009)

东　汉　墓

計二座，編号为59长五M006和59长五M009，以下簡称为M006和M009。这两座墓都在李家老屋西約200米处。此地原是一座高达7.5、长寬各为30—25米，不甚規矩的土堆。堆上有一傾斜欲塌的破土地庙。M 006和M 009即分别葬在堆下之东北和西北角。

茲按M009、M006，分别报导于下：

壹・M 009：

① 1957年"考古通訊"第6期52頁"談談青瓷虎子的两种用途"

② 同期"考古通訊"第55頁"从广州出土的虎子談虎子的考証"

③ 1957年"考古通訊"第4期第9頁"1956年河南陝县刘家渠汉唐墓葬发掘簡报"

④ 1595年第6期"考古通訊"　頁"山东章邱县普集鎮汉墓清理簡报"

⑤ 1957年"文物参考資料"第5期第86頁"湖南省文管会在长沙清理了一批古墓"

一.墓葬形制：为无券"十"字形磚坑墓。也可分为甬道、前室（包括两側室）、后室三部分。后室比前室高出两层磚，墓壁都是二至三种不同的几何磚作一横一竪砌成的双墙，墓底全为横鋪平砌法，封門墙側砌成蓆紋形。甬道长1.64、寬1.80米、前室长1.80、寬（两側室在內）5.28米，后室长3.44、寬1.83米，墓深2.02至2.12米。（图43）

二.出土器物：

（一）陶器：有黑衣灰胎、褐釉无紋飾、无釉的方格或凸凹弦紋等。胎质以夹砂灰胎为最多，間或也有紅胎。

（1）方格紋罐：十件，口徑11.8、腹徑17、高14.2厘米。

（2）鼎：方耳，口稍斂，唇內折，平底，兽面蹄足，灰胎质薄。因破碎过甚，不能复原。

（3）井：直口，外折唇，束頸，折肩，腹上稍鼓下漸縮小，平底，稍凹入，黑衣灰胎。口徑13.5、高約10厘米。

（二）銅器：大部分已成碎片，不能复原。現在仅就出土时能辨认出器形的，加以說明。

（1）三足盘：敞口，外折唇，凸弦紋，平底，三角形扁足，稍外撇，口徑32、通高22厘米，有一断腿，用鉄片捆綁。

（2）鐎壺：环鈕四叶紋盖，有子母榫与壺相連，壺为斂口直唇，圓腹，鸡首形壺嘴，并有嘴盖。长方形空心柄，三扁足。

（3）小盘：五件，子口边，平底，无紋飾，徑13、深0.6厘米。

（4）勺：盘形口，折边平唇，圜底，长方形空心柄。柄长14.3、口內徑16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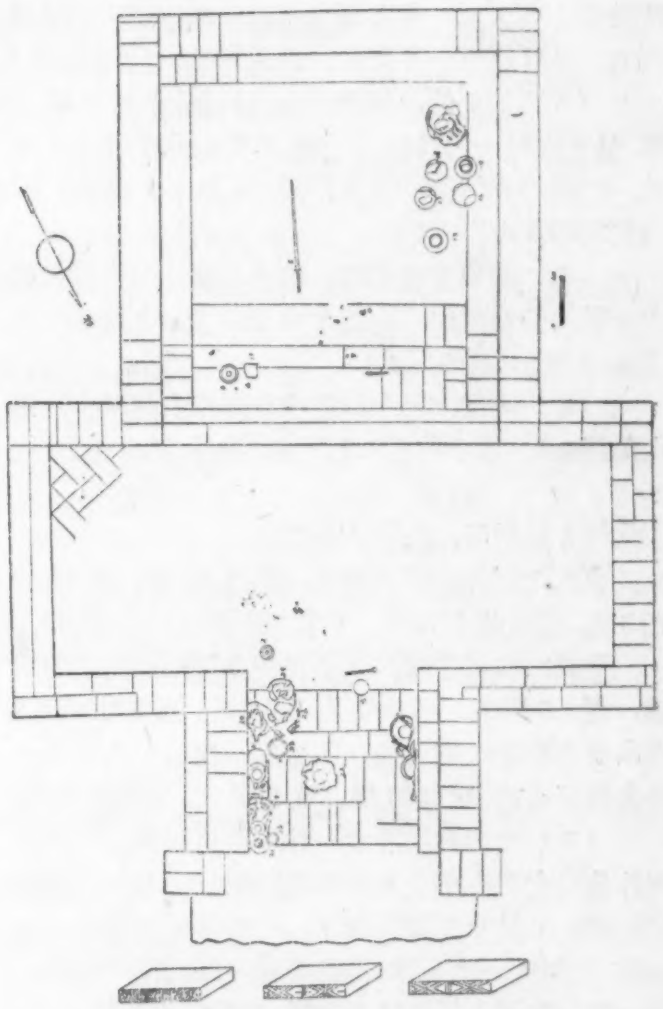
（5）鼎：环耳，直口，內折唇，三乳环鈕凸弦紋盖，平底稍带弧形，三扁足，微撇，底部有烟痕。盖徑22.5、足长15厘米。

（6）灯：复笠形座，柱高圓，灯盘內有錐形鈕，灯盘口徑12、通高36.5厘米。（图18）

（7）博山炉：山川紋立鳥形鈕盖，有圓孔六个，炉下有柱承托，出叶状紋，复笠形座，并浮雕三支有翼虎（？），座底稍大于炉，呈折边盘形。盖徑9、高11厘米。

（8）牌形飾：上为曲身龙，中为方筐有翼馬，下为粟粒紋，二面相同。长18、寬5厘米，据"古泉汇"說是"压胜錢"，但也有人說不是。究为何物，尙待考証。（图45）

45.牌形飾 东汉



44."三"墓葬图（59长五M006）

（9）鏡：二面。一面半球形鈕，四叶紋座，銘为："长宜子孙"，座外有內向八出連弧紋，寬素边，边厚0.4、徑20厘米。一面半球形鈕，四叶綯紋圓鈕座。座外飾四乳四神紋，水波紋寬厚边。徑16.5、边厚0.5厘米。（图32）

（10）鎏金耳杯：十件。

（三）鉄刀：环柄，色銹蝕断折，环徑7.5、殘长73厘米。

（四）金器：

（1）金餅：徑7.1厘米，重234.5克，正面是半凸半凹，背面全凹，但比正面平整，并有一笔划很細的阴刻"張"字。（頁25图15）

（2）蕎麦形飾：三件，各长1.4厘米，重0.7克，系以长3、寬0.7厘米的金片对折后，稍加修剪而成。（頁24图8右）

（3）細腰形佩管飾：一对，每件长2.8厘米，共重11.5克，两端成半球形，各飾珠粒紋。从外表看来，器身很可能是用一金管压縮而成的。（頁24图8左）

（4）小珠飾：一百九十三粒，其中有五十粒以莧菜子似的金砂，分三圈粘聚而成，中圈的珠粒較大；有二十三顆是以一小管压成一至五粒不等的

珠联管；有一百一十九顆是八方形珠，这可能是模制的。另外还有一花穗飾。共重16克。（頁23图2）

（5）亚形飾：周圍以金皮相包，中有六瓣花形，并有一較大的珠粒为花苞，空隙处則粘滿了小珠粒，二面均有紋飾。长5、厚0.4厘米，重6.7克。（頁24图8中）

（6）茉莉花苞形飾：二十七顆，其中較大的十一粒，长2厘米，小的十六粒，长1.2厘米。共重41.3克。（頁23图4）

（7）戒指：十个，（其中有綠松石的四个）。最大的徑2.1、最小的徑1.8厘米，共重33.5克。（頁23图3）

（8）手鐲：四个。分二式：

Ⅰ式：三件。徑7厘米，共重54克，最重的19.3克，最輕的17.2克。（頁23图3）

Ⅱ式：綯形手鐲，又像現在名"鱔魚骨"式的鎖鏈。徑7.5厘米，搭口处是以长0.8、寬0.7、厚0.7厘米的方框把两端套住，鐲是以八根或十六根小金絲交織而成的、质軟如棉。重12.8克。（頁23图3）

（9）球形飾：計十一件，共重40克。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个小金絲环相粘而成。环与环之間的空隙处，又粘有三顆小圓珠，以使其更加美观。又五件，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飾金絲弦紋，綴以珠飾；另一件，其制作虽与前者相同，但粘制更为精美，不管怎样看去，珠飾与珠飾之間，纵横成行，井然有序。还有一件，为鏤空多角形，极工整。（頁23图2）

（五）玉器：

猪：一对，长12.5、寬4、高3.7厘米，作臥眠状，耳目口鼻，刻划俱全，出土时与金手鐲、戒指紧紧相联。（图23）

（六）料珠：若干粒，呈天藍和火紅色，藍的透明易碎，紅的坚实不透明，徑約0.5至0.6厘米，大小不一。（图27）

（七）水晶珠：三十四顆，有不規則形的十三顆，枣核形的十三顆，此外还有六方形、龟形等。均有小孔，可以穿系。（頁24图6）

（八）瑪瑙珠：計七十九顆，分二式：

（1）长条形赭黑間有白色的三十七顆，其中最大的长5、徑9厘米，最小的长1.2、徑6厘米。（頁24图5）

（2）圓形珠，最大的徑1.3厘米，最小的徑1厘米，呈乳白色，均有孔。出土时分两組成长16、寬6厘米的两长条形，位于后室內距南端約1.04米处，根据料珠、琥珀、水晶珠（头部）、金飾器、玉猪（手部）的位置来看，这些瑪瑙珠无疑是在墓主人之足部。（頁24图7）

（九）琥珀：八顆，呈朱紅色，形状不一，有兽形、龟形、圓珠形、細腰佩管形。

（十）銀器：

（1）碗：直口，內沿有弦紋一道，环底稍凹入，口徑14、高5.5厘米。（頁25图14）

（2）匙：橢圓形瓢，勾状柄，柄长8、瓢深1.2厘米。（頁25图14）

貳.M006

一、墓葬形制及結构：此墓大致和M009相同，但是也有它一定的特点，如該墓后室寬于甬道0.84米。后室內的棺床两旁及足端还有寬26、深5厘米的水沟。在砌法上除四壁和M009一样（为一横一竪平砌法）外，墓底的砌法各不相同，如后室和甬道均为一横一竪，前室則为二磚相錯的人字形。該墓亦可分：甬道、前室（两側室在內）、后室三部份。甬道长1.86、寬1.44米，后室长2.98、寬2.80米，前室长1.86、寬4.70米。（图44）

方向：坐南朝北。

二、出土器物：

（一）陶器：一般都是褐陶紅胎，火候較低，胎质較松。也有无釉的方格紋紅胎硬陶。陶器都已破碎，茲就出土时可以看出器形的，分述于下：

（1）鼎：方耳、斂口，內折唇，平底。兽面蹄足，灰胎质薄，已不能复原。

（2）井：口徑15、高20厘米，直口，外折唇，筒腹，褐釉紅胎。（图21）

（3）鍑：斂口、外卷唇，鼓腹，小平底。口徑4、腹徑12厘米，高度不詳。

（4）猪圈：为圓形矮柵栏，上有屋盖。

（5）盘：二件，外折唇，平底，有凸弦紋，口徑24厘米。

（6）博山炉：蓮瓣形阴刻紋炉盖，炉內有黑炭，圓灯柱，折边盘形座，炉徑11、座徑20、通高45厘米。

此外还有长方灶、敞口甑、三足仑、鐎壶、方格紋罐等。

（二）銅器：

（1）鏡：三面，分三式：

Ⅰ"长宜子孙"鏡，半球形鈕，菱形座，間以四叶內向連弧紋。徑13.5、边厚0.5厘米。

Ⅱ式：規矩禽兽紋，銘为"尙方作鏡眞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徑14.3、边厚0.5厘米。

Ⅲ式：徑11、边厚0.4厘米。浮雕龙紋，齿紋和水波紋边。

（2）劍：柄长18、劍身长（殘）71、寬3.2厘米。劍莖与鐔相接处，二面均有珠联紋金飾。（图38）

（3）貨币：五銖。

（三）鉄器：

（1）刀：四把，均系环柄。其中最大的长36、寬26厘米。最小的殘长15.5厘米。（图39）

（2）戟：刺长23、援长17厘米，各寬2.5厘米。像这样的戟，在长沙东汉墓里还是很少出土的。（图42）

（四）玉器：

（1）蓮瓣形飾：二件。两端各有小圓孔一，可以穿系，呈乳白色，长4、寬2.3厘米。

（2）八方形珠：长1.8—2、徑0.8厘米。（图22）

叁. 小結：

（一）象这种无券頂的"十"字形磚墓，在长沙还是首次发現，根据其墓磚为几何紋，同时出土了井、灶、猪圈等陶质建筑模型等来看，我們初步的认为，該二墓的时代应該屬于东汉前期。

（二）关于金錠的发現，虽然湖南曾經出土过两件：一件为1953年在衡阳汉墓中出土的；另一件是1957年长沙市桐蔭里新莽墓中发現的。⑤但沒有这次的一件重，同时前两次均无銘文，而这次的有一笔划很細的阴刻"張"字，可能是鑄造者的姓氏。

（三）由这次出土的金飾来看，其紋飾之細、制作之精，可見当时金工艺的发展及其艺术成就。

（四）关于瑪瑙珠飾，据商承祚先生的长沙古物聞見記卷上"楚革屨三則"中記載："革屨，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三月，出北門外喻家冲楚墓。側高四公分五公厘，后高六公分一公厘，厚一公厘，首作扁方形，寬七公分八公厘，深十公分，口长十四公分，外底长二十六公分，前寬十一公分，后寬七公分，屨面前及右下旁合紐。两側近首处，各有大鍼孔十余，殆附帛面后，綴珠玉以为飾。这次发現的四十二顆瑪瑙珠飾，正位于墓主人的足部，証明以上推論是对的。

此外，还有鉄戟、銅牌飾都为长沙地区汉墓中所罕見。

（执笔人　罗　張）

南疆发現一对木乃伊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博物館南疆考古队，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部探掘民丰县尼雅河边一座古代遺址时，发掘出一对男女合葬的"木乃伊"。从死者衣着和殉葬物考察，这对"木乃伊"可能是距今近二千年、东汉时代（公元一至三世紀）的人物，它对研究塔里木南部地区古代人种学、中西交通历史、民族关系等問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从两具"木乃伊"并臥在一口棺木里的情况看，死者是一对夫妻。他們的面部、胸腹和四肢都很完整。两人都枕着紅色毛織元宝形枕头，全身和面部用細綢复盖。左边盖黃綢的妻子，辮发枕在头下，头旁放着一个我国南方常用的藤条編的奩盒，內有一面用篆体书写着"君宜高官"的銅鏡、綢制綉花粉袋、木梳、綫具等妇女用品；右边盖綠綢的丈夫，身上放着一張一米二十厘米长的木弓和木箭筒，筒內装着四支沒有鏃的箭杆，脚下摆着木碗、木杯和陶罐等殉葬物，都很完整。从"木乃伊"的鼻梁很高、顴骨大的特点，特别是女的多辮发型看来，死者是屬于当地民族的，而且从衣着的讲究、殉葬品的丰富看来，死者还是当地的統治阶級人物。

这两具"木乃伊"的发現，証明汉族与新疆各民族很早在祖国統一的历史中就結成了兄弟友誼。死者所穿的錦袍、錦袜和各色細綢以及很多用品都是內地的产物，特别是从男"木乃伊"身穿的那件紅底花錦袍上織着"万世如意"、"延年益寿宜子孙"等隶书看来，是由內地运到新疆的；女"木乃伊"殉葬品如藤奩、"君宜高官"銅鏡和汉族人用品无異。据考古工作者推測，东汉时代南絲道（即今若羌、民丰、和田一带）是中西交通要道，新疆各民族与內地交往頻繁，文化交流很盛。

"木乃伊"穿着各色絲綢衣服，甚至連袜子袜带都是花錦和刺綉的。汉代花錦和絲綢是我国特产，也是出口大宗。当时的絲綢和花錦能够保存到今天的已經非常稀少。而这两个"木乃伊"的衣服除在身下部分已經腐烂外，大部分都还完好，錦袍的花紋和色澤还很清晰、鮮艳。

"木乃伊"原来居住地尼雅古城，实际上沒有城墙，只是一丛一丛作星散状的房屋群，南北长十四公里，东西寬二公里，尼雅河从城南流过。考古工作者为了完成对这座古城遺址的考察，他們在去年10月間从民丰县紅旗公社出发，騎着駱駝在沙漠中跋涉了三天才到达目的地。經过十多天的艰苦工作，除发掘出两具"木乃伊"外，还发現了六十多个"佉卢文"木簡、未启封的木牘、汉代"五銖"錢以及陶器等文物。

現在，这对"木乃伊"連同棺木已运到烏魯木齐市，作进一步研究。（新华社烏魯木齐2月3日电）

墓葬登記表

（尺寸以厘米为計算单位）

整理号	原墓号	墓葬形制	方向	墓室		墓道		龕坑				台阶	填土及发現	葬具	枕木沟	随葬物分布情形	随葬物	备考
				墓口长寬深	墓底长寬深	位置	距底深长寬	位置	形状	高	寬 深	寬深						
战	59长五 M013		110°	深2.90-5米	长3.14—3.18米 寬2.03—2.08	东端	长2.38寬1.36 深1.20—1.40米			无		无	棕紅粗粘土	殘木			陶鼎、敦、壶、銅鼎腿、銅器物片、銅殘勺、銅环、木梳、漆羽觴、漆器片、答床。	
	M014		105°	深1.70米	长2.60寬1.40米		无			无		无	棕紅粗粘土	殘木			陶鼎片敦片、壶片、勺、銅戈、戈鐓、銅劍、鏡子、石器、漆羽觴。	
	M015		115°	深4.80—5米	长3.65—3.75米 寬2.95		长2.50寬1.55米 深1.40			无		无		殘木			銅劍、竹席。	
西汉	M011		190°	深1.20米	长7.16寬5.20米		寬3.70长已殘 深0.50米			无		无	淡黃粘土板夯	已朽			金皮、麻布紋罐、方壶、泥錢、銅鏡、鉄灯。	
	M012		105°	深1.53米	长6.00寬3.77米		长3.92深0.22米			无		无	黃泥沙泥	已朽	纵貫		陶壶、方壶、麻布紋罐$_5$、泥錢、陶錠、銅三足灯、屈戌、銅鏡$_2$鼎、盆、博山炉、五銖、石器片、鉄刀片、鎏金皮$_2$。	
	M005		190°	深1.55—3.05米	长5.70—5.74米 寬4.41—4.37		深0.20寬0.60 —0.93长1.58 —168米			无		无	黃粘土带黃沙泥	已朽		墓室內之中部	陶鼎片、罐片、銅鏡片、銅五銖、石璧片$_2$。	
	M003		200°	深0.55米	长3.90—4.82米 寬4.41—4.37		寬0.20—0.32米			无		无	黃細粘土	已朽		墓室內之右側	陶鼎片$_2$盒$_2$壶$_3$麻布紋罐$_5$水缸、銅小鏡、石璧片、泥錠、錢、灶	
	M004		20°	深105—280米	长3.10—3.16米 寬2.40—2.45		无			无		无	淡黃細粘土	已朽	横式	墓室內之左側	陶鼎$_4$盒$_4$壶$_4$罐$_3$銅鏡、玉璧。	
	M002		290°	深1.30—2.30米	长2.86—3.00米 寬2.36—2.45		无			无		无	淡黃粘土	已朽		墓室內之左側	陶盒$_2$壶$_2$罐$_2$銅鏡、石璧、陶釜$_2$	
	M001	长方形	310°	深0.94米	长2.80—2.90米 寬1.79—1.89		无			无		无	淡黃粘土	已朽		墓室內之左側	陶鼎$_2$盒$_2$鐎壶、罐$_7$釜、錠、銅鈕、鉄刀、石璧、石鏡。	
	M010		10°	深0.63—1.80米	长2.25 寬0.93—0.91米			头部	方形	高0.14寬0.58 深0.40米		无	棕紅粘土	已朽		龕坑內外	陶鼎、盒、壶	
新莽	M007		195°	深200米	长6.45寬4.25米		长3.50寬1.60 深0.18米			无		无	黃沙泥	已朽	纵貫	墓室头足两端	陶罐$_5$、井、四耳罐$_2$銅七枝灯、銅盂、提梁壶$_2$带盘奩$_2$奩$_2$鼎$_2$虎子、銅盘$_3$、小碗$_{12}$、大碗$_2$規矩紋鏡、劍、銅貨泉$_8$、$_9$、銅印章、甑$_2$鍑$_2$杯、鍋、瓶、盉、鉄刀$_3$、釘、玉珥、佩、銅勺、銅带勾$_2$藍料珠千多、方格紋陶罐、玉文带、玉璧、銀碗、銀带勾、黃釉陶罐$_2$銅鍾$_2$	
东汉	M009	十字形磚坑	北	深2.14米	长6.88寬1.80 —1.48米					无		无	淡黃田泥	已朽		墓的前后室	陶鼎、井、罐$_{10}$(麻布紋)銅鏡$_2$洗、灯、小盘$_6$博山炉、碗$_2$勺、盘、牌飾、釜、鐎壶、鼎、提梁壶、鍾、三足盆、金錠、金手鐲$_3$金絲鐲、戒指$_{10}$金圓花球$_{10}$定胜、蘑莉花苞$_{27}$金蕎麦形飾$_3$金細腰形佩管式珠$_2$黑間白黃瑪瑙长形珠$_{37}$料珠数千、水晶珠$_{34}$白圓瑪瑙珠$_{42}$琥珀$_8$玉猪$_2$銀碗、銀勺、鎏金羽觴边$_{10}$銀碗、銀勺(即調羹)鉄刀、小金珠$_{103}$	
	M006	十字形磚坑	20°	深1.66—2.32米	长6.70 寬4.73 米					无		无	淡黃田泥	已朽	无	后室和甬道	陶鼎、仓、壶、鐎壶、罐$_6$甑、灶、盘$_2$水井、猪圈、博山炉、銅鏡$_2$劍、銅五銖、鎏金苞、料珠$_4$水晶珠、玉六方形珠、$_4$玉蓮瓣形飾$_2$白云母片、鉄刀$_3$鉄戟。	
宋	M008		55°	深0.30—1.10米	长2.95寬0.90米			北端		高0.08寬0.58 深0.30米		无					陶罍罐、小罐、白瓷盒、銅宋元通宝。	

长沙柳家大山古墓葬清理簡报

湖南省博物館

1959年5—9月，湖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队，配合施工在长沙市东郊柳家大山清理发掘古墓葬五十八座，其中战国墓三十二座，西汉墓十九座，东汉墓一座，唐墓四座，五代、明墓各一座。

战国墓

一、墓葬形制及其結构（图1）

早期三座，晚期二十五座，保存棺椁的有一座。分长方寬形直穴土坑和狭长方形两类。一类以50号墓最寬大，长3.50、寬1.85米；一类以5号号墓最窄小，长2.1、寬0.50米。見梯穴的十二座，位于相对或相邻两壁。带龕墓十四座，分头龕和边龕，形状有长方拱形和圓拱形。方向南北，东西向也有。因施工紧急，往往墓的上层已鏟平，深度难測，一般为一米深上下，最深达五米，封土不显明。填土慣用棕紅色洗沙泥，外加黃色土的也不少。每一层加夯一层。呈現的夯窩通为圓形，直徑約5厘米。器物多置于龕坑內外及死者头部和两側，但左側者少。組合方法分四类：1.鼎敦壶，2.鼎壶 3.鼎盒壶，4.鼎盘壶或配豆或增勺、璧、鏡，兵器等。

二、出土器物：在各刊物上已发表过的器物不詳細介紹，这里只选擇重要的介紹如下：

1.陶器：鼎、敦、壶、盒、盘、勺、豆。分灰、黃胎，皆黑衣。

双耳壶，15号墓出土，侈口，短頸，双耳，腹上有三凸弦紋，細瘦高圈足，平底，灰胎黑衣，与鼎敦共存。是較早的器物。（图16）

2.銅器：

①銅鏡 一式：三弦小紐，圓座，云雷紋地，飾龙紋，直徑11厘米（M048）。二式：純地紋鏡，羽状紋，直徑10厘米。另有純云雷紋鏡、半边。（M036）三式：方連紋鏡，鼻紐、圓座、羽状紋地。直徑11.5、厚0.3厘米。（M049）四式：龙紋鏡，三弦小紐，圓座，云紋地，龙間鑄有长条形几何紋，直徑10、边厚0.5厘米。（M048）五式：兽紋鏡，三弦小紐，圓座，羽状紋地，厚0.4厘米。（M040）

②砝碼：一种六个，最大的直徑2厘米，最小的直徑0.2厘米；另一种九个，最大的直徑3厘米，最小的直徑0.7厘米。（图2）

③銅戈：一式"郑左軍"戈，曲援，內上揚，上下有刃，栏側三穿，內上穿一，通体翠綠斑花。胡上鑄"郑左軍"三字。援长14.2、內长9.5、胡长12.2厘米（M011，頁27图28）。二式援曲，中平凹，內尾上揚，內上下有刃。栏側四穿，內上一穿。援长16.8、胡长17、內长12.6厘米（M050，图3）。

3.鉄器：鼎、劍、削、軍、磨、鏟等。

①鉄鼎，侈唇、斂口、环耳、深腹、圓底、扁圓蹄足，口徑26、通高30厘米（M35，頁25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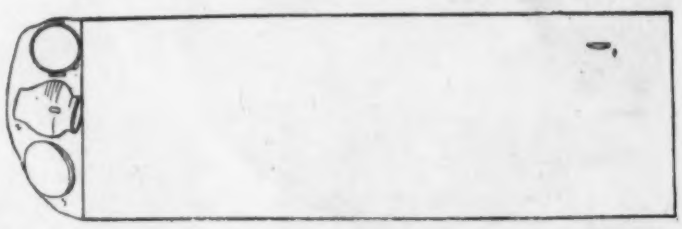
②鏟，长方銎，圓肩、弧刃。通长8、寬4厘米。（M015）

4.其余出土有石印、火石、料璧、木梳、木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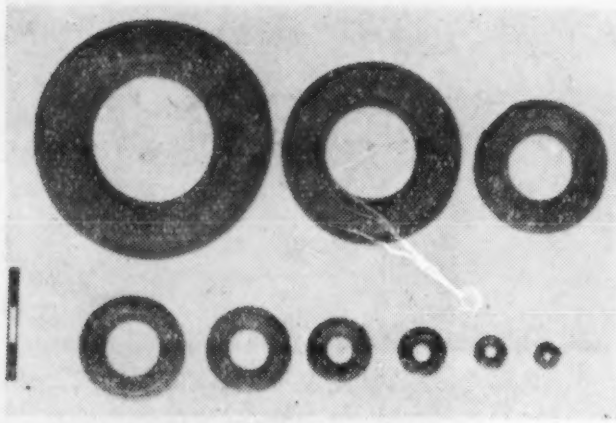
第33号墓，为长方形竪穴，棺椁基本完整。南北向。南端被一东汉墓打破。处于汉墓群中。往西200米左右有近代墓群。坑长左2.76、右2.7米，寬1.55、1.66米，殘深2米。东北邻壁殘存梯穴四个。每二穴間約距0.33米。填土自下至上用白膏泥、綠黃色泥，先后填塞。平夯层次明显，厚13厘米，越往下越紧。棺椁置于土坑正中。南北、东西距坑壁各为12厘米——13厘米。椁壁板长2.50米，档板长1.34米，椁盖为四块横板，用边刀榫相接。內盖由多块薄板构成，与壁板子口吻合，因腐蝕过甚，殘缺不全。厚約0.7厘米。椁室外框是四单块木板圍成。墙底用套榫銜接，四角以边刀榫合縫，底为二块合成，边箱在右側，单用一間板与两档板套銜为之。木棺长2、寬0.57米，盖、底、墙各为独板。用子母榫結合。"笭床"用竹席代之，其大小长短，与棺的內腔相等，紧塞于棺內。死者尸骨腐朽无存，仅遺头髮一撮、脑髓二团。

出土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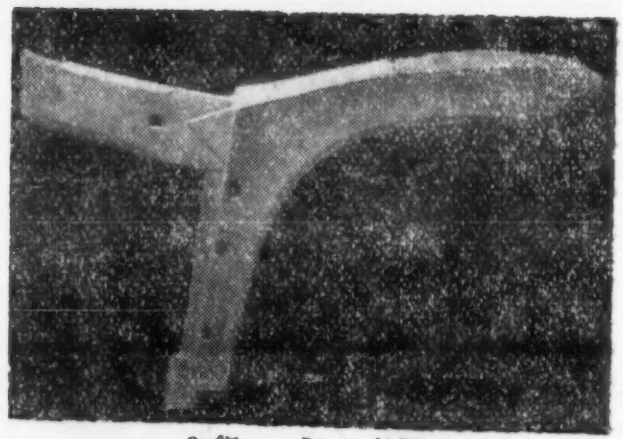
1.陶器均灰胎黑底，火候很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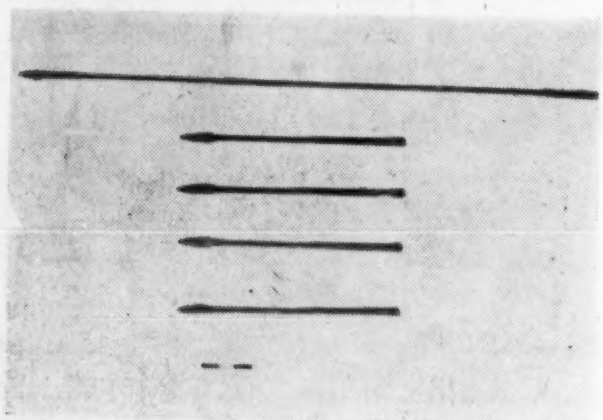
1.59.长柳Mo15号墓葬平面图



2. 銅砝碼　　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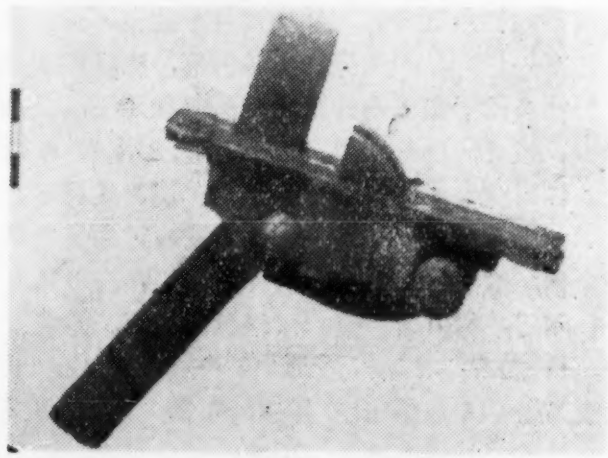
3. 銅　戈　　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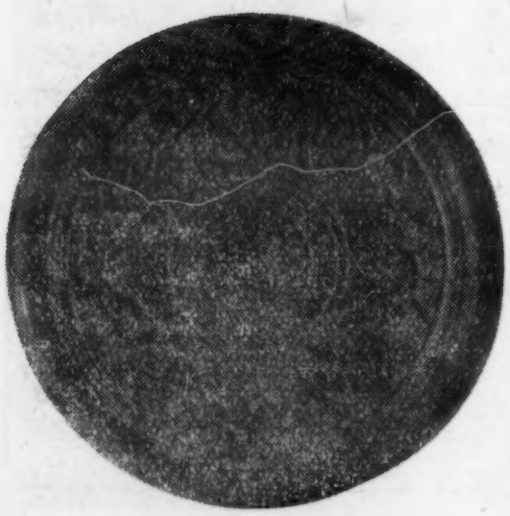
4. 銅　鏃　　战国

5. 銅　鍑　　西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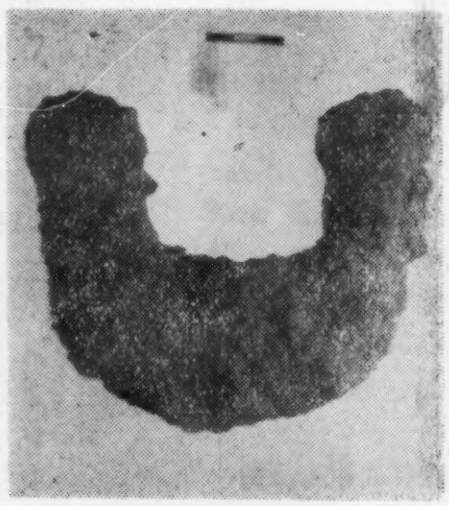
6. 鎏金博山炉　　西汉



7. 鎏金弩机　　西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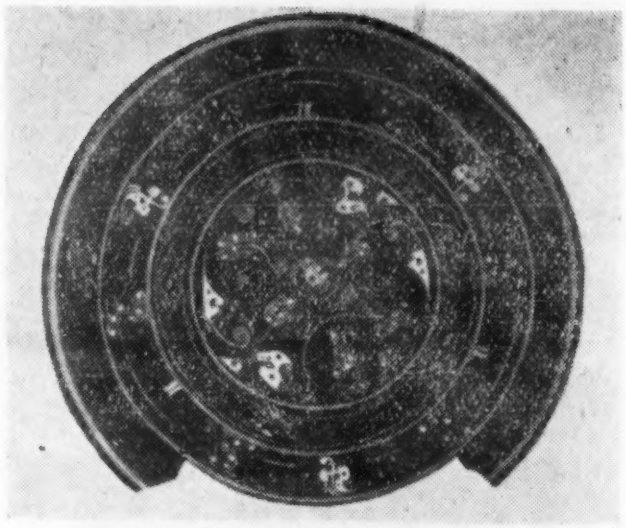


8. 龙紋鏡　　西汉



9. 鉄　鋤　　西汉

10. 鉄博山炉　　西汉



11. 漆盒盖　战国

12. 漆盘　西汉

13. 銅奩　西汉

14. 陶盂　唐

15. 銅带勾　战国

16. 陶双耳壶　战国

17. 陶壶　唐

18. 陶罐　西汉

①鼎二件：圓盖近平，上有二紐，长方耳，子母口，淺腹，大平底，多棱兽面蹄足。

②敦二件：上下各有三S形紐，繞鈕飾凹弦紋。

③壶二件：盖隆起，作三S形紐，侈口，頸細长，肩飾凹弦紋，高圈足。通高33厘米。

④盘一件：折唇平底，口徑17厘米。

2. 銅器：质地較硬，色烏黑。

①銅鏡一件：三弦小紐，圓座，羽状紋地，飾变形兽紋。卷寬边，直徑14.4、边厚0.46厘米。

②銅劍一件：圓平脊，方莖中空，喇叭形首，套入漆鞘，其鞘光亮表皮布紋清晰，通长58厘米。

③銅矛一件：側有一鼻，銎內存殘木柲，尖鋒。

④銅带鉤一件：蛇头、条身扁圓，上有鼓釘紋，圓扣短柱，通长4.6厘米。（图15）

⑤銅鏃五件：鏃如三角，上呈三棱，棱鋌中空。通长13.2厘米。（图4）

⑥銅片：內有兽面銜环、鋬。

3. 漆器：皆为木胎髹漆。

①漆盒：內置銅鏡，腹底无存，仅留一盖內外髹黑漆，外为紅色繪画，繪几何紋及凤紋。直徑28厘米。（图11）

②漆耳杯八件：方耳、平底、繪凤、叶、几何紋等。

4. 木器。

①木俑共七件：一为平头圓臉，高身細腰，长衫落地袖張手露，通高48厘米。

另一身穿短衫，足露手举，通高40厘米。

②木珠：四棱、中空，长1厘米，黑色。

5. 竹器：

①竹席：大小洽如"雕花板"，篾片細膩，編織精細。（頁26图24）

②发簪一只：长8厘米。

6. 骨印：黑色，长方，上有穿孔，有銘文一字应为"敬"。（頁26图21）

这座墓从出土鼎、敦、壶来看，为战国墓无疑。盘細长頸，瘦腹橢圓，高圈足壶，喇叭首劍，兽紋鏡都是較晚的，但又沒有晚期墓中的淺腹、撇足鼎及盒等，因此断定此墓为較早的晚期墓。

19. 麻布紋陶罐上文字拓本

20. 銅奩銘文拓本

西汉墓

早期十三座，晚期六座。一般为长方形土坑竪穴，其中有三大形晚期墓为T形坑，殘存阶梯形墓道的三座，有枕木坑的七座，有横坑和直坑。小形墓与战国中型墓大小相近，而大者极大，长过14米，寬过六米，方向几乎全向东西。填土种类多。

1. 烏黃色土：色正烏黃，以不多的"朱夹子"土搗地面第二层泥及少量的面黃泥，夯后非常結实，顆粒粗細不匀。这种墓出土的器物不少，往往尽破陶片。

2. 黃色土和朱夹子土：这两种土很純凈，出土的器物每每有石器或加鉄器，与鼎、盒、壶同出。以上三种常見早期墓。

3. 黃色泥：色如蛋心，甚鮮艳。非本山所有，可能是取自卵石山中，这类墓多被盜，往往出銅器。这次所发掘之34号墓即是。不过不見于大型墓中。早晚期都采用。

4. 五色梅花土：有棕紅、淡黃、黑、綠、白五色。或一区一色，或一层一色，或先搗和，再填。西汉晚期常采用，大都于大型墓中出現。

出土器物：擇重点器物介紹如下。組合方法有五种1. 鼎、盒、壶、璧、鏡。2. 鼎、盒、壶、罐、罍、鍑、泥錢、字块。3. 熏炉、圓底壶、罐。4. 罐、鉢、火石。5. 鼎、盒、壶；麻布紋罐、馬蹄金、五銖泥錢、鈁、甑、鍑、井；分布情况，放于头部及前后室。

1. 陶器：鼎、盒、壶、罐、鐎壶、鍑、瓶、鈁鍾、井、灶、熏炉、錠、半两和五銖泥錢、字块等。早期多灰胎黑衣軟陶，晚期出現硬陶灰胎或敷釉。

①瓶：蒜头口，圓柱頸、上有二凸弦紋，腹上作波浪紋、矮圈足，通高36厘米。（M054，頁28图33）

②圓底壶：侈口、折唇、寬肩，腹底連成球体，通高21.4厘米，口徑16厘米（M07）

③罐：斂口、侈唇、唇上有圓孔一对，鼓腹、呈二道折棱，作弦紋数道。

④豆：盘口、短柱、喇叭座。

2. 銅器：鼎、鈁、鏡、車飾、漆扣飾、銅匙，鎏金博山炉、奩、鎏金弩机、鍑。(图5、6、7)

龙紋鏡：圓座，变形羽状紋地，龙紋为主，直徑18.5、厚0.7厘米。(M054，图8)

3. 鉄器：鉄环手刀、鋤、鉄博山炉等(图9、10)。

4. 石器：璧、鏡、小酒杯、耳杯、火石、印章。

5. 漆器：漆盘、盒、奩。

①盘：木胎，內外朱繪，殘留盖底，底直徑20.3厘米。用带紋圍成单独圓面，用朱色繪奔牛一只，繞牛繪云紋。(M054，图12)

②小盒：长方形。(M054)

③殘片：有針刻紋，朱繪云紋。(M054)

第32号墓：墓相当大，出有"閔翁主家"四字銘文的銅奩，当为貴族所有。

墓葬形制及其結构：

凸形直穴土坑。通长左13.30、右13.56米，分前后两室，前室略高，后室略低。前者长左5.22、右5.13米，寬7米，后室左长7.08米，右长7.43米，寬4.96米。阶梯墓道，一直伸入前室內，寬2.05米。台阶位于前室左右两側，高出墓底1.05米左右，用以放置器物，除一鉄刀外，多大形陶器。棺槨无存，唯后室有直枕木坑二道，并且有余地可置棺槨。盜洞三个，同时发現盜墓时用的小鋤一把。封堆很大，高至8米，周圍直徑30米左右，用土与塡土相同，分五色。經过細致的夯筑，每夯一层垫一层草木灰，分层显明。紅色层最厚，頂上面2米深內全用黃泥。塡土分棕紅色、綠、白、淡黃色、鮮黃色五类。因被盜，所以杂乱，但仍以棕色层最厚。底部塡了少量的白膏泥和黑色木炭灰。

出土器物：

1. 陶器：灰胎硬陶。

①壶一式：侈口、曲頸、寬肩、相对揑制二耳、鼓腹、圈足外斜，頸、腹、足各部都布多道凹凸弦紋，黃釉。

二式：器形不很明显，白衣、黑色鋸齿紋。

三式：侈口、束頸、圓肩，相对揑制双耳、鼓腹、圓足，酱綠色釉。

四式：侈口、束頸、肩上有凹凸弦紋二道，相对作二耳，鼓腹、圈足、无釉。

②麻布紋罐二十一个：一般都刻文字。(图19)

一式：侈唇、斂口、寬肩、身略长，腹橢圓无釉，滿布麻布紋。通高35.5厘米。

二式：基本与一式相同，通高26厘米。

③陶灯：斂口，半球盞，喇叭形座，灰胎黑衣。

④瓿：小口內斂，卷唇，寬肩，繞肩有三道凹凸弦紋，相对作人面耳，鼓腹、循腹飾六道凹弦紋，下身收小，平底。通高36.5厘米。

⑤鍾六个：子口，曲頸、寬肩、相对各揑制一对耳和一对兽面銜环。鼓腹，高圈足，頸、肩、腹、足、背有多道凹凸弦紋，分别敷黃赭、褐綠、酱綠色釉，通高49厘米，大小略異。(图18)

⑥泥錠：大，稍隆，另有陶五銖錢。

2. 銅器：

奩：胎薄质脆，綠色。圓柱体，有盖，腹上有三寬带紋，第一道带紋上部相对有紐耳銜环，并且套有提梁，器身有"閔翁主家"四字，通高17厘米。(图13、20)

3. 鉄器：仅見鉄劍，殘长56.5、中寬3.5厘米，已生銹。

以往长沙常見鼎、盒、壶、泥制馬蹄金(錠)，五銖錢与軟陶共存，但此墓又出硬胎釉陶鍾，封堆大，直枕木坑，均为西汉晚期的特征。

战国墓葬形制一般是长方形土竪穴和长方形木槨墓，塡土以棕紅色沙泥。殉葬器物几乎都有鼎、敦、壶。或附加鏡、兵器等。早期墓更狹长。双耳壶中晚期从未見过。鈁、鐎壶、子母口敦于晚期始見。

西汉多出陶盒。早期陶器主要为灰胎黑衣。晚期葬品漸漸增多。井、灶模型器、硬胎敷綠釉陶开始有。多大型墓，封堆比前后时期都大。

东汉墓

一座，左长8.5米，右长7.05米，被盜。殘存烂木，編号M041号，五花塡土，有枕木坑。唯見五銖銅錢及剪边五銖錢。

唐晚墓

四座，塡土疏松，不打夯。墓室狹长，或头寬足窄。一般长2.55、寬0.90米，器物置于头足两部，有瓶、壶、碗、盂、料璧、鉄刀、鉄釘。

M058号墓位于山坡，窄长方形土坑竪穴。淡黃色塡土，头部有台阶，离台阶底深約50厘米的塡土中，发現陶碗两只。足端底部下葬一小战国墓。陶器均为泥沙灰胎硬陶。

陶壶一件：有嘴、柄、綠釉，瓜瓣花。(图17)

碗五个：敞口，假圈足，綠釉。腹壁略直或稍撇。另有陶盂、洗、壶。(图14)

五代墓

一座，出銅鏡、陶瓶、鉄剪、鉄錢、陶洗各一件，长2.50、寬0.70米，編号(M016)。

明墓

一座，长2.65、寬1.15米。头足两部有二石板，无器物，編号(M031)。

长沙赤峯山2号唐墓簡介

湖南省博物館

1958年秋，湖南省博物館在长沙赤峰山清理了一座完整的磚室墓。該墓平面是一个凸字形券頂单室墓。墓室通长3.36、寬1.6米，其中羨道約占整个墓室长度的四分之一，墓底用灰色素条磚纵横錯列平鋪，主室中央砌有棺床，与主室的长度相等，寬83厘米，砌法与鋪地磚同。磚墙使用三横一竪的鋪砌法，竪磚在排列时有規律的留出許多空間作为小龕，用以放置小陶碟。左壁磚墙設龕两层，龕数下三上四，右壁亦設龕两层，下二上五，后壁正中設龕一个；羨道两側亦各設一龕，券頂已殘，起券处距墓底1.19米。随葬品計四十件，以銅制实用器最精。其中銅鏡与石枕位于头部，銅錢散于腹部，小碟多半放在小龕里面。此外除一只小頸瓶倒置于主室后壁右角外，其他陶、銅、鉄器随葬物均放在羨道里面(图1)，現分别介紹如下：

1. 銅鏡一面，(頁28图35) 顏色純青，直徑12.1厘米，半球形紐，高緣，边緣飾三角夹花紋及鋸齿紋各一圈，主紋浮雕形态不同的雄獅五只，主紋和外圈之間飾十二辰，制作精美。

2. 銅匕一件，銅质灰綠，光洁如碧玉，勺面扁平作橢圓形，长7、寬4、柄长17厘米，柄末微卷，出土时置于銅碗內。(图3上)

3. 銅勺一个，勺面橢圓，已殘。质薄如蛋壳，勺面长6、柄长19厘米，柄末較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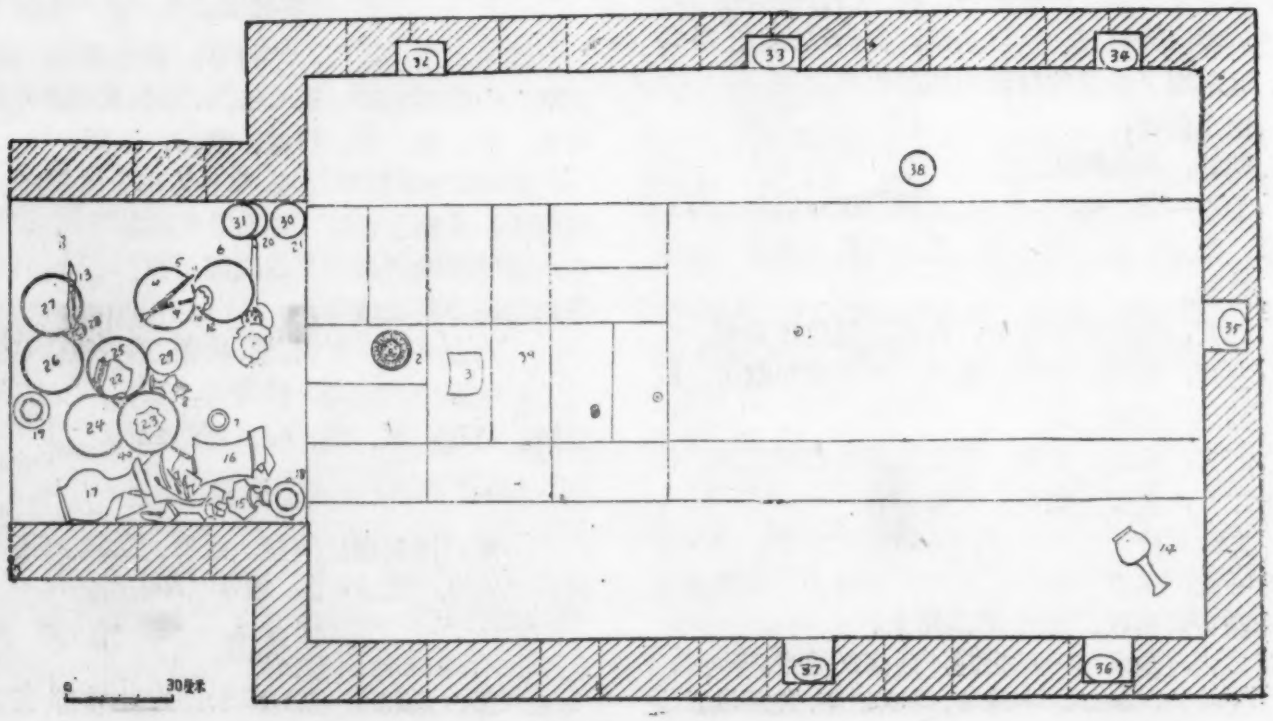
4. 銅筷一双，銅色墨綠，长18.6、徑0.4厘米，共重26.6克，筷端作螺形鏤刻，末端刻成蓮花状。(图3下)

5. 銅碗三个，銅质已氧化，色澤滋潤如玉。一件高7.5、口徑16.7厘米，圜底近平，底徑8厘米。另两件中一件通高8.5、口徑18.5厘米；一件为17.5厘米，出土时套叠在一起，胎壁很薄，口緣有凸輪，底部飾有精細的弦紋。(图7)

6. 鎏金錫杯一个，通高7.5、口徑6.1、底徑3.5厘米，并非純錫，断裂处作金色，似含有銅质，杯口外侈，深腹，柄座作喇叭形，外壁有鎏金殘迹多处。(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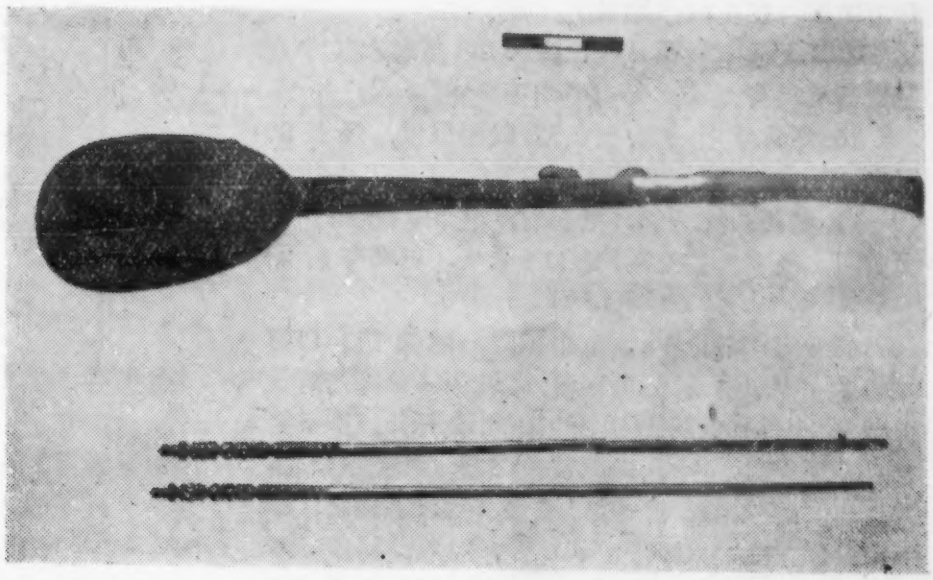
7. 銅香斗一件，已殘，通高6、长33厘米，深腹，折緣，底座作复蓮形，中有小柱与香斗相連，柱側接一折柄，柄末飾鎏金兽(頁27图26、27)，出土时香斗內滿貯香料余烬。此物系供佛用器，在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供养人像中常見到。

8. 銅熏炉一件，球形炉身，炉盖圓錐形，底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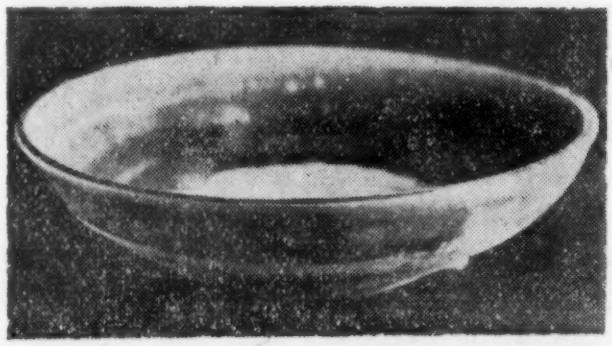


1.墓葬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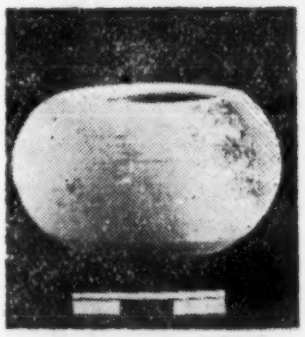
2. 鎏金錫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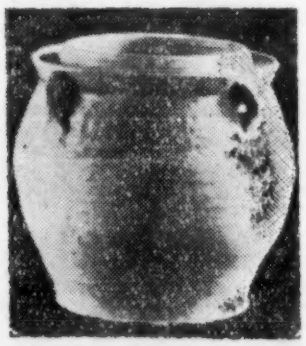
3. 銅匕（上）、銅筷（下）



4. 陶　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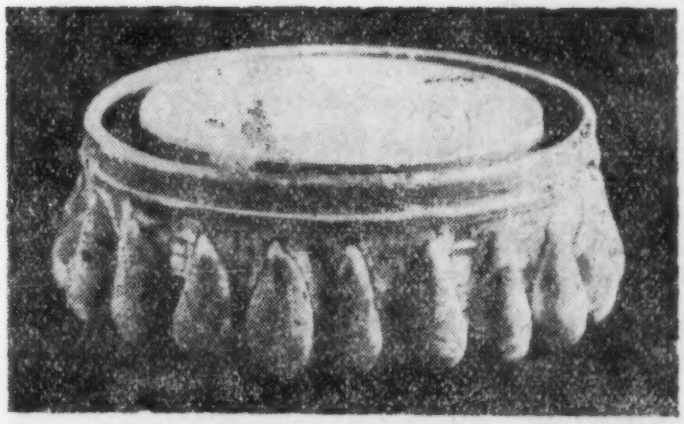
5. 小陶盂



6. 四耳陶罐

7. 銅　碗

8. 石　枕



9. 陶　硯

作喇叭形，出土时已殘破。

9. 开元通宝貨币八枚，直徑2.8厘米，其中有三枚銅质純青无銹，每枚平均重2克。

10. 环首鉄刀一把，长条形，鉄銹很重，殘长20厘米。

11. 刻花石枕一件，滑石质，色白，方形，一面微凹，高5、长9.7、寬11.5厘米，正面有針刻图案。(图8、10)

12. 四耳陶罐五个，大小相同，通高11、口徑9.6、底徑7.7厘米，胎色灰白，底坦平，口緣与肩敷青釉，釉汁凝聚成凹凸不平的綢紋，大开片。(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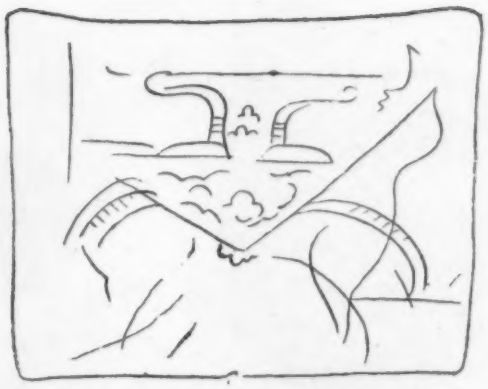
13. 小陶盂一个，胎色灰白微黃，外壁不敷釉。通高3、口徑3.4、底徑2.5厘米，弇口，扁腹，小平底。(图5)

14. 陶碟五个，胎色灰白，釉色酱綠开片，碟心与器底露胎，平底微凹，隐約有指痕。器身通高4—4.8、口徑17.5—18.4厘米。(图4)

15. 小陶碟九个，胎色灰白，釉色酱綠或酱黃，釉汁不匀，部份釉汁已腐蝕成沙质似的粉末，无光澤，剝落。碟形大小不一，小的通高4、口徑9.8、底徑4厘米，腹扁圓，唇緣外侈，平底似假圈足。較大的小陶碟通高4.5、口徑11、底徑4厘米，平底微凹，似假圈足。

16. 陶硯一件，胎色灰白，敷酱綠色釉汁，深处作黑色，不开片，硯面及硯底皆露胎，座徑14厘米。硯面微凹，边緣有凹槽一圈，座足共二十只，作垂珠状排成一圈。(图9)

17. 小頸陶瓶一对，橢圓形腹，喇叭形細頸，平底似假圈足，胎作灰色，外壁敷开片酱色釉，釉汁含粘着性不强，易剝落，器身通高21、口徑与底徑6.5、腹徑10厘米。



10. 石枕針刻图案花紋

18. 盘口陶壶两件，一件已破碎；另一件完整。但肩上系紐已殘破。腹圓，近底处微束，平底，盘口外侈，頸較粗短，胎色淺褐，外壁敷半釉，出土时几乎全部剝落。

这是一座比較完整的磚室墓葬，墓壁使用“三横一竪”式的砌法，而且多設小龕，墓壁直而不弧，这是我省长沙一带唐墓的主要特点。随葬物中出土浮雕式动物图案鏡（五兽十二辰），陶器中多施酱色釉，釉汁含玻璃质成份重，易剝落，施釉的方法皆为半釉露胎式。这种手法盛于南朝。这次出土的陶器可說明保持南朝的作風。随葬物中的香斗在湖南是第一次发現。該墓又出土了八枚开元通宝，制作頗精，从上面一些材料来看，說明該墓的时代相当于唐代前期。

执笔者：周世荣

內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組举办“1959年出土文物展覽”

在继續大跃进的1959年，內蒙古自治区和祖国各地一样，到处兴工动土，在生产建設中发現了大批的历史文物，內蒙古文物工作組配合生产建設，重点发掘了古墓葬二十座、古城遺址面积6568平方米，采集文物标本一百二十箱。为了进一步深入普遍宣傳党的保护文物政策，发动广大群众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将出土文物資料中的一部分，自1960年元旦起在呼和浩特市美术展覽館公开展覽。在預展期間，內蒙古自治区王逸倫副主席、內蒙古党委宣傳部部长等党政領导人均蒞临指导，此外并接待了內蒙古自治区及呼和浩特市、文化、教育界各方面人士。展出期間，各生产建設部門的职工、农牧民及各学校师生都踊跃参观。这次展出的文物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呼倫貝尔盟扎賚諾尔古墓出土文物，为汉代北方民族的鄂尔多斯式銅器文化。这批文物中，有紅褐色指点紋陶器、飞馬及鹿紋銅牌、樺木皮盒、骨箭头等物，都富有濃厚的地方色彩。第二部分是美岱水庫出土文物。呼和浩特市郊区廿家子西滩古城，位于正修筑的美岱水庫的淹沒区內，在配合水利工程进行发掘中，发現有汉、辽、金各代的遺迹和遺物。第三部分是昭烏达盟宁城县辽代中京故城內出土文物。文物組配合当地农业生产建設，共在該古城的所謂“紫禁城”內发掘了面积4247平方米，发現了辽、金、元、明各代的遺迹和遺物。第四部分是辽中京附近古墓出土文物。辽中京附近共清理发掘辽墓十六座，其中一部分为辽代契丹人墓，随葬物有銅假臉和三彩釉陶器；另一部分是辽代汉人墓，墓內有墓志，四壁繪有人物、花木、供物等。随葬器物多日用瓷器及陶制明器，陶制明器中有鍋、盆、剪、勺等。(內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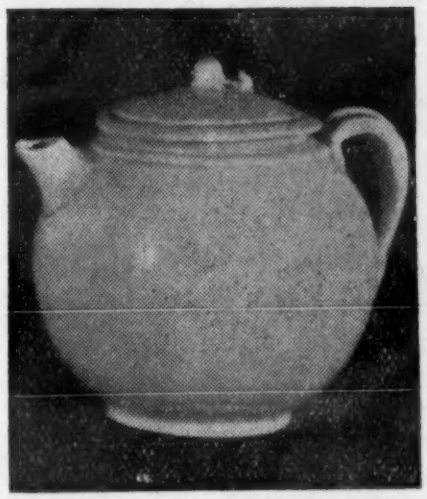
略談长沙的五代两宋墓

周世荣

解放后，在长沙近郊发掘了五代十国时候的楚墓共三百余座、两宋墓五百余座。1959年对这些材料已进行了系統的整理，在正式发掘报告沒有出版之前，这里仅作一个概括的介紹。

五代墓

五代墓大部分布在长沙南郊一带。就目前材料所知，仅有土坑墓无磚室墓。土坑墓呈长条形，一般寬約1米左右，长3米左右。平面呈长条梯形，个别的呈凸字形。台阶与头龕随着时代的早晚逐漸增多。随葬物絕大部分是陶瓷器，此外有鉄工具、銅、鉄、鉛貨币及銅制手工艺品等。按照用途可分为生产工具、貨币、陶瓷飲食用器、文具用品及其他金屬实用工艺品等。鉄质工具有鉄犁、鐮刀、刮刀、单刃鉄刀、双刃鉄刀、平头单刃刀、小削刀、交股鉄剪及鉄釘錘等。貨币主要的是馬殷时候鑄造的乾封泉宝大鉄錢、鉛錢及早年留傳下来的"大泉五十、剪边五銖錢。晚唐的会昌开元錢也时有出土。此外南唐的唐国通宝間或出土，但数量不多。陶瓷飲食器具有陶质的碗、碟、壶、杯及白瓷碗、白瓷碟、青瓷碟、白瓷壶等。此外还出土数量較多的陶罐；个别的墓葬出土陶唾盂、陶盞和陶瓶等。金屬手工艺有銅鏡、刻花銅粉盒、鉛质胆瓶、鋲簪、銅带飾、銅鑷子等。文具用品有烟墨、石硯、陶硯和陶水盂。



1. 短嘴白瓷壶　五代

1. 鉄器工具：多殘缺不全，鉄犁呈长方形，已殘。鐮刀作新月状，薄胎单刃。刮刀呈璜形，双刃刀寬叶扁莖平头单刃刀扁叶尖莖，木把已殘腐，小削刀状若剃刀，需安插木柄才能使用。鉄剪刀作交股形，富有彈性。鉄釘錘仅出土一件，通长8厘米，魚尾形錘头，长柄上穿有一环。

2. 貨币：近半数的墓葬都出土了鉄质的天策府宝或乾封泉宝，但出土时多已銹蝕，大小輕重略有出入。一般鉄币直徑3.8厘米，背面有一天字。开元通宝很多，其中很多是小形开元銅錢，直徑仅2厘米左右，胎很薄，文字多模糊不清。鉛錢中有模糊不清的开元通宝字样，胎薄如紙，直徑約2.3厘米。除了上列常見的貨币外，有許多貨币沒有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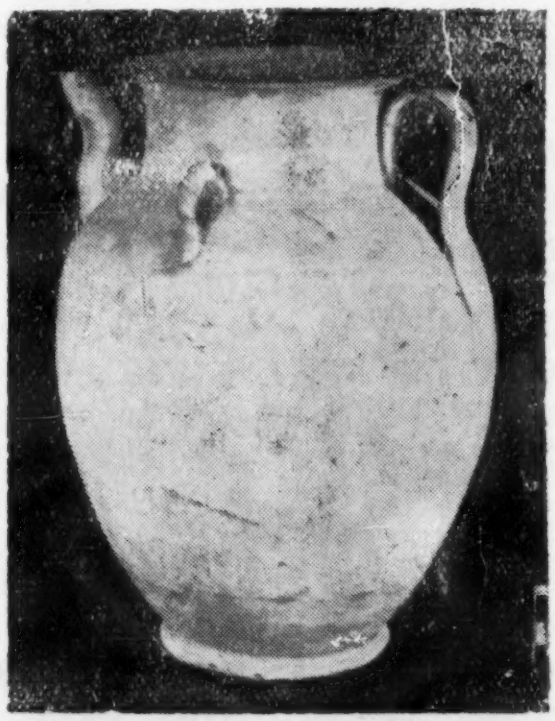
3. 陶瓷器具：

①陶碗：多圈足式，外壁施青綠单色彩釉，造型多作葵花形、荷叶形及敞口卷緣形等。釉水常有冰裂紋，碗心殘留掙釘。

②陶碟：有淺腹平底式，平底荷叶式及平底葵花式等。釉色大致与陶碗相同。

③陶壶：多盘口形，壶頸两側附有半环形拱耳，壶嘴尖小，鋬手呈半环形或叶子形，器形大小不一致，有扁圓腹小壶，也有喇叭形口圓腹短嘴壶(图2)釉色青綠、酱綠或棕黑，但以青綠色占多数。

④陶盒　形制一般比較大，造型多圈足直腹式，盖上飾团花或同心圓紋(水渦紋)；釉色酱黃或酱綠，底部露胎。



2. 陶　壶　五代

⑤陶杯　出土不多，造型有三种：一种是平底凸緣式；一种是平底敞口无凸緣；另一种是带盖式陶杯，这种陶杯內盛有香粉，說明是作粉盒用的。

⑥陶瓶　形制可分为六种：即胆瓶、扁腹小瓶、小盘口大陶瓶、四耳陶瓶、小頸陶瓶、葫芦形小瓷瓶或罍形大陶瓶等，其中以罍形大陶瓶占絕大多数，每一座墓都有。这种陶瓶特点是无釉、形制大、有盘口，肩部多飾附加堆紋。

⑦陶洗　出土的数量不亚于罍形大陶瓶，有十余种之多。一般常見的是平底弇口洗，个别的有圈足，子口，敞口及蓮花形口緣等。有些陶洗的外腹壁还用綠釉划成块状图案。

⑧多角罐　也是五代墓中比較特殊的器物之一，多角罐作宝塔形，罐身分五級，每級附四只尖角，并且很規矩的纵列排成四行。胎色多作鉄青色，无釉，个别的罈口盖有僧帽式盖頂。

⑨陶唾盂　間或出土，但数量不多。

瓷器方面以白瓷为主，青瓷很少，白瓷中以碗碟为主。

①白瓷碗　多圈足凸緣，釉汁微泛青色，碗的大小不一，一般高5、徑16厘米左右。还有一种五出葵花形的瓷碗，口微斂，淺腹圈足，胎薄如紙，通高4.5、口徑15厘米。部分白釉开片，或斑斑剝落。屬于这种瓷系的胎质不够坚实。

②瓷碟　有五出葵花形、十出葵花形及卷緣式等。胎釉与瓷碗大致相同。

③瓷盒　有印花式双彩瓷盒，平底直腹式小白瓷盒，大圈足瓷盒及菱花形瓷盒等。

4. 烟墨石硯　北宋

④瓷壶　有短嘴小白瓷壶(图1)，但数量很少。

3. 浮雕蓮花形陶罐　北宋

4. 金屬工艺品　以銅鏡为主。五代墓出土的銅鏡有圓形鏡、方形鏡、海馬葡萄鏡、弦紋鏡、都省銅坊鏡、蓮花鏡、荷叶鏡和茶花鏡等，其中海馬葡萄鏡及弦紋鏡等是唐代的遺物，可能是早年流傳下来的。其他銅鏡已开始脫离唐代銅鏡的風格。

①都省銅坊鏡　薄胎凸緣，紐小，背面有三处鑄有銘文，右边鑄“都省銅坊”四字；中間鑄“官”字；左边鑄匠人的名字，我們发現的有匠人李成、謝昭等鑄的。这种銅鏡在安徽合肥西郊的南唐保大四年紀年墓內曾出土过，在断代問題上是一个很好的旁証

②蓮花鏡　呈不規則半球形小紐，背面飾以盛开的蓮花(頁28图36)。

③茶花鏡　形制很小，背面有板瓦形小紐。

④双魚鏡　背上浮雕飞魚一对，魚首作龙头状，大嘴有耳，背上有双翅，作浮游飞翔状。

⑤四神八卦鏡　紐已失，边緣折平，四神殘留玄武，八卦殘留震、坎、乾三卦，鏡角飾蜜蜂一双，图案系在模鑄的基础上刻划而成。

⑥八角形鏡　又称亚字鏡，半球形紐，凸緣折平，背面无紋飾。

⑦鎏金刻花銅粉盒　通高2.3、口徑4.5厘米，扁腹薄胎，外壁刻飾纏枝牡丹。

⑧銅鑷子　一般长約13.5厘米，一端做成小挖耳；另一端为两片扁薄銅片組成的小夹子。

⑨銀簪　系一根长长的銀絲捶打而成，并在中間切开，一端連在一起；一端分为两片，未切处飾以菱紋。簪的种类很多，个别的系銅质或鎏金，簪末飾有魚形等装飾。文具有圓柱形烟墨和風字形石硯池等，有些石硯上还刻有制硯人的姓名或卖价。

两宋墓

一、北宋墓

北宋墓的墓葬形制与五代墓基本相同，目前尙未发現磚室墓。土坑墓的龕比以前增多了，遺物中以陶瓷器为主，貨币也不多，鉄器更少。石器只有石硯比較多(图4)，所以北宋墓主要是出土一些陶

瓷器。

1. 陶器：

①陶碗：有多种式样：凸緣式陶碗，淺腹，大敞口，小圈足，碗心有掙釘，灰胎黃釉，底部露胎，一般通高44、口徑12.4厘米。卷緣滿釉陶碗，大敞口，矮圈足，外壁施开片黃釉。滿釉葵花形碗，敞口卷緣，緣上刻着葵花形，底心有掙釘四点，施棕黃色釉，不开片。此外还有敞口不卷緣葵花碗，圈足露胎葵花形碗（頁28图31），圈足凸緣陶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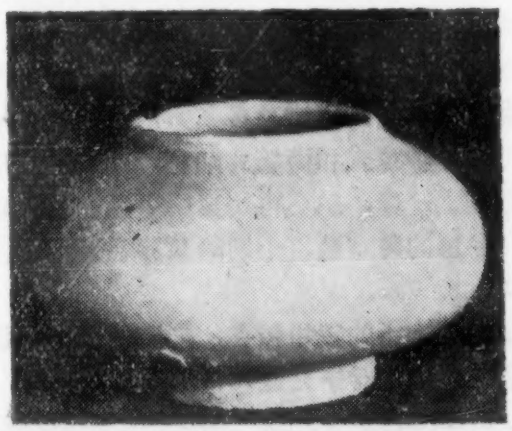
②陶碟：有凸綫矮圈足陶碟、平底陶碟、荷叶边小陶碟三种。荷叶边小陶碟可能是五代遺物，胎色淺灰，外壁施黃色半釉，碟心有掙釘四顆，个别的陶碟外壁施有滿釉，但为数不多。

③陶盒：有扁腹圈足小陶盒，外壁施黃色滿釉圈足大陶盒，外壁施灰綠色滿釉，不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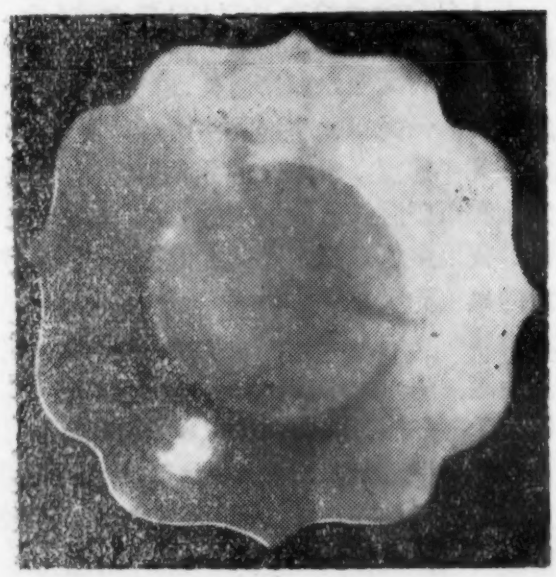
④陶鉢：有圈足小陶鉢，施开片灰綠色半釉。圜底陶鉢，外壁施酱色滿釉。

⑤高足杯：器口与圜底鉢同，器作高圈足，胎壁甚薄，杯心压印六出蓮花。蓮花上殘留掙釘四顆，綠釉开片。

⑥陶唾壺：釉色草黃，施滿釉。



7. 小陶盂



8. 蓮花形白瓷碟

5. 带盖陶罐　　6. 小陶盂

⑦陶壺：有双嘴壺，双嘴卷曲，鋬手作竹叶形，施黃釉。棱角形直嘴陶壺，施草綠色粗釉。

⑧陶罐：有半浮雕形蓮花陶罐（图3），肩部飾淺浮雕六出蓮花，外壁施黃色滿釉。带盖式陶罐，（图5）盖面扁平，盖頂附扁圓形捉手，釉色豆青。此外还有卷緣圈足陶罐、卷緣扁腹陶罐、盘口形圓腹陶罐、盘口圓肩高腹陶罐、高腹敞口陶罐、侈口金瓜式陶罐、水盂式金瓜形陶罐、带盖式金瓜陶罐等。

⑨陶盂：金瓜形小陶盂（图6），柿形扁腹，釉色酱黃。圈足平唇小陶盂，釉色淺黃。高圈足凸緣小陶盂，造型大致与圈足平唇小陶盂相同。另外还有一种平底斂口小陶盂（图7）及平底凸緣小陶盂等。除底部制作略有不同外，造型大体均无区别。

⑩陶洗：有斂口假圈足陶洗，屬于这一类的陶洗数量最多，大小大致相同。器形有两种，一种是斂口，有圓肩，腹部內收，假圈足，小平底；一种口形較大，腹部鼓圓，胎色大致分灰胎与紫胎两种。凡是胎色作紫灰或褐色者，胎骨上則常常塗一层白粉，然后再施黃釉，底部露胎。此外，在北宋墓中还发現有滿釉平底陶洗、圈足陶洗、假圈足弦带紋陶洗、子母口式陶洗、侈口陶洗、弦带紋圈足陶洗、小口陶洗等。其中有些施青綠色釉，少数施黑釉。

⑪双耳陶罐：肩部附拱形双耳，腹部飾弦紋，施酱色釉，釉汁多剝落。

⑫罍形陶瓶：胎骨与五代罍形陶瓶相同，只是附加堆紋更加复杂，其中有直櫺式附加堆紋陶瓶、新月形或花形鏤空附加堆紋陶瓶（图10）、卷草附加堆紋陶瓶（图9）、荷叶形紋附加堆紋陶瓶、蓮花划紋陶瓶及多层波状附加堆紋陶瓶等。陶胎多呈灰褐色，个别的陶瓶上有彩繪，但却不施釉。

⑬多角陶罐：宝塔式，四层，十六个角，素胎无釉。（图14）

2. 瓷器

①瓷碗：絕大部分是凸緣白瓷碗，其次为敞口不卷緣白瓷碗、粉白色釉小瓷碗、軟胎开片白瓷碗、葵花形白瓷碗等。凸緣白瓷碗，圈足露胎，碗心常密布掙釘痕一圈，胎质有硬胎与軟胎两种。軟胎有吸水性，尙未全部瓷化。一般小碗通高4、口徑13

厘米，大碗通高6.5、口徑22厘米，个别的碗底有"王康"之类的墨书文字。葵花形白瓷碗，边緣多五出葵花形，白釉带灰黄色，开片。

②瓷碟：有梅花形小瓷碟、荷菜形小瓷碟、卷緣瓷碟、葵花形瓷碟、蓮花形瓷碟(图8)、凸緣小圈足瓷碟等，梅花形小瓷碟，碟心折平，底心微凹，白釉带黄，有碎紋，造型輕巧玲瓏，葵花形碟，边緣刻成五出葵花瓣，唇緣微卷，釉色粉白略带黄色。部分釉汁中央夹有魚子紋小点。蓮花高足盘，口緣四出蓮瓣，釉色純白有泪痕。

③瓷盒：有平底白瓷盒、圈足白瓷盒等，平底白瓷盒，无盖，器口微斂，子唇較高，腹部扁圓下收，平底露胎，釉色白中微黄，有冰裂碎块。圈足白瓷盒，外形与平底瓷盒大致相同，白釉带蛋青色。

3. 金屬工艺品

金屬工艺品主要是銅鏡，銅鏡的种类有方形鏡、双魚鏡、亚字形八卦鏡、鴛鴦蓮花鏡（图12)、素圓鏡、龟紋圓鏡、秦王鏡、都省銅坊鏡、鸞凤啣花鏡(頁28图34)、云紋团花鏡、变形蓮花鏡、盾形八卦鏡(图13)圓形花瓣鏡及凤紋鏡等。其中双魚鏡亚字八卦鏡、都省銅坊鏡和秦王鏡等，都是在宋代以前遺留下来的一种形式，秦王鏡中有銘文："賞得秦王鏡，判不惜千金，非关欲照胆，特是自明心"。

此外，还出土了一些鉄质交股剪及单刃鉄刀等。

二、南宋墓

14. 多角陶罐

9. 陶　瓶

10. 陶　瓶

11. 多角陶罐

12. 鴛鴦蓮花鏡紋飾

13. 八卦鏡紋飾

南宋墓有土坑墓和磚室墓两种。土坑墓与北宋墓沒有多大区别，磚室墓多长方形单室墓。形制和构造可分为券頂式和磚壙式两种，券頂式墓頂先用楔形磚砌上一券，然后再用素磚平鋪一层。磚壙墓是沒有券頂的磚室墓。个别的墓葬在頂上鋪上一层大石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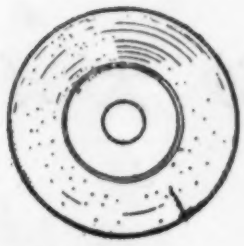
南宋墓出土的貨币較多，陶瓷工艺已衰退，只在小量的出土瓷器中見过几件珍品。

1. 貨币：有些是北宋以前遺留下来的，常見的貨币中有小开元通宝及北宋太宗时鑄造的太平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眞宗时鑄造的咸平元宝、景德元宝、祥符元宝，仁宗时鑄造的皇宋通宝，英宗时鑄造的天圣元宝、皇祐元宝，神宗时鑄造的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哲宗时的元祐通宝、紹圣通宝、元符元宝和徽宗时鑄造的圣宋通宝、宣和通宝等，南宋时代的貨币主要是高宗时鑄造的建炎通宝，理宗时鑄造的皇宋元宝。

2. 陶器有陶碗、陶碟、多角罐（图11)、陶壶、陶杯、陶罐、陶盒、陶洗、罍形陶瓶、碾輪（图15)陶盂等。陶碗以深腹大斂口圈足碗为主，胎色褐紅，有吸水性，外壁施黄色半釉，施綠釉者較少。个别墓葬又出高圈足葵花形碗，斂口收腹陶碗等。陶碟有平底褐胎陶碟，大侈口圈足陶碟等。陶壶出土不多。54长·黄12号墓出土的陶壶口部作喇叭形，寬肩直

腹，长嘴弯曲，整手飾竹叶紋，器身通高17.5厘米。陶罐有隐花陶罐、平底斂口式陶罐、圓唇小口陶罐、斂口式陶罐、卷緣足陶罐、卷緣扁腹陶罐及侈口平底陶等罐。陶罐的造型一般都不很大，外壁施黃釉、綠釉或黑釉，部分陶圈的底部模印文字。陶盒，扁腹圈足，有大小几种形制，陶洗有平底斂口式、折唇式、附加堆紋式、隐花式等多种形制，釉色有綠色或黃色等。黑釉陶洗的胎质比較粗糙。碾輪作环璧形，采集品中曾有与碾槽置于一起的，可以說明它的用途。陶盂，口斂，圓肩收腹，灰胎施黃釉，通高5厘米。

3. 瓷器：有凸緣白瓷碗、蓮花碗、薄緣斂口瓷碗和白瓷盒等。白釉往往呈蛋青色或斑黃色，质地比較粗糙。瓷盒中有带盖扁圓形瓷盒及印花瓷盒，这都是瓷器中的精品。印花瓷盒，器身作扁圓形，盖頂圓平，子母口，平底露胎，胎色粉白，器盖上模印小团花，釉色白中泛青，盒內附有三个小瓷碟，也很精巧。（頁28图32）



15. 陶輾輪

16. 桃花鏡

4. 装飾用品：有脂粉、銀耳环、銅耳环、琉璃耳环及銅鏡、琉璃簪等。脂粉洁白，因年代久远，已失去香味。銀耳环，直徑4.2厘米。琉璃耳环，状若环璧，天藍色，琉璃簪，色白透明，銅鏡絕大部分是湖州鏡，銘文作“湖州眞石三十郎家照子“及“无比炼銅、每两一百文”等字样。此外还有素面圓鏡、桃花鏡(图16)及刘氏七娘刻紋銅鏡。（頁25图17）

泉州郑和行香碑

呂荣芳

明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的行香碑，于1929年在泉州东門外灵山圣墓发現（圣墓即回教祖三賢四賢之墓）。原碑現尙保留在泉州东門外。

明永乐至宣德年間(公元1405—1433年)，郑和曾七次出使西洋，在第五次出使西洋时，路过泉州，曾在东門外灵山圣墓行香，并立碑以志其事，碑文如下：

“欽差總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祐，鎮撫蒲和日記立。”

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是在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奉命出使，于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在泉州行香，約在十五年冬季始出海，直至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日才回京，前后达三年之久。

关于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一事，明成祖实录及殊域周咨录等均有記載。如明成祖实录載：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十日）古里，爪哇，滿剌加，占城，錫兰山，木骨都京，溜山，喃渤利，卜剌哇，阿丹，苏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阿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諸国及旧港宣慰司使臣辞还，遣中官郑和等齎錦綺紗罗采絹等物偕往。

一般史学家依上述記載誤认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是在永乐十四年，此碑的发現，首先糾正了这一錯誤。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之前，在泉州东門外圣墓行香并立碑，有二种目的。

（一）祈求灵圣庇祐。据閩书卷七方域志載：“墓有灵異，其有遭运不佳，或抱病不起者，皆来此祈禱二賢保佑，有求必应。每屈冬季，常有多人自远方至此墓，瞻礼行香，归家无不健康安全，俱叹行千里而不徒劳也”。这說明了郑和行香的目的。

（二）由此碑的記載，更进一步的知道郑和本人是一个回教徒。据周钟岳署“郑和家譜考釋”載：“知和之先，原昆阳回族馬氏。和事永乐于燕邸，始賜姓郑”。郑和是云南昆阳州人，原姓馬，回族人，后改姓郑。郑和因系回族，当他第五次出使西洋时，途往泉州，而往回教徒的祖先三賢四賢墓前行香，这是很自然的。

郑和行香碑，除了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文物及記录郑和出使西洋的时間外，还証实了泉州港在当时的繁荣以及它在中外交通上的重要地位。

长沙太子冲文化遺存

周世荣

太子冲位于长沙南郊約十里，它是树木岭附近的一个小地名。此地北面是第四紀的紅土丘陵地带，南面是一片广闊的稻田，穿插在稻田中有一条曲折的小溪流。1958年11月間，因为修筑京广复綫鉄路而把这座山劈成了两半，山脚下的田壠边挖下去两米多。我們就在这田壠的断面上发現了九个小灰坑。灰坑上原来是种水田的（現已种蔬菜）砂土下沉，在田底結了一层坚硬的"鉄夹子"土，把表土与下面的文化层灰土隔开，层次非常明显。这九个灰坑我們只清理了五个，其他四个已保护起来了。

一、灰坑概况

1号灰坑：已殘，出土了绳紋陶片和鬲腿。

2号灰坑，作橢圓形，一端大，一端小，长2.34、寬1.34厘米，距地表深96厘米。第一层为黃沙土地表层，厚26厘米，无文化遺物；第二层是鉄夹子土层，厚4厘米，亦无文化遺物；第三层是灰土层，厚70厘米，灰土中含大量竹子屑，(图3之1)陶片和紅燒土。文化遺物有鬲、豆、鉢等（图1）

3号灰坑：形制較大，因上面种着庄稼，不便全部清理。灰坑呈"8"字形，似两个毗連的灰坑，已清理的部份长3.4、寬1.5、深1.5米，坑底呈鍋底形。表土厚45厘米，第二层厚4厘米，底层厚70厘米。三层土质的区分，与2号灰坑完全相同。文化遺物有石刀、礪石、印紋硬陶片、陶罐、圜底器、大口器、陶豆、陶鼎及角形器殘片等(图12)。

4号灰坑：平面作长方形、近圓，长2、寬1.6米，深20厘米，文化层次与2号灰坑同。文化遺物有陶鉢、陶鬲、陶罐、陶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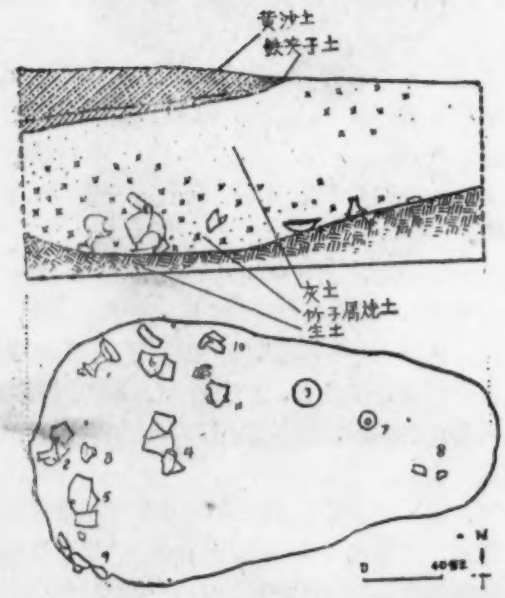
二、文化遺物

(一)石器：有石刀与礪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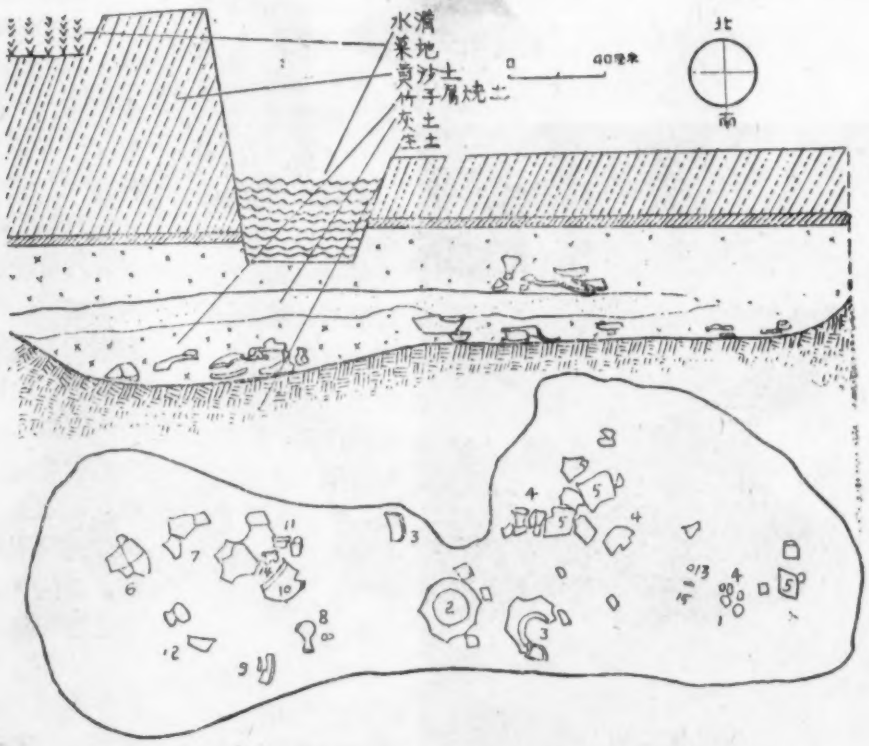
（1）石刀（图3之2），3号灰坑出土，砂岩、自然河卵石制成，刃口稍加磨光，长44厘米。

（2）礪石(图3之3)：3号灰坑出土，青色板岩，状似不規則棱形，断面呈三角形，表面磨光，有棱边。

(二)陶器：有鬲、鼎、豆、罐、鉢、大口器、圜底器、



1. 2号灰坑剖面图(上)、平面图(下)



2. 3号灰坑剖面图(上)、平面图(下)

3. 1.竹子屑(H_2) 2.石刀(H_3) 3.礪石(H_3) 4.陶鬲足(H_2) 5.陶鼎腿(H_3) 6.陶豆底座(H_2) 7.陶豆(H_2) 8.陶罐殘片(H_3) 9.陶缽(H_2) 10.圜底罐(H_2) 11.印紋硬陶片(H_3) 12.角形器殘片(H_3)

角形器等。

陶系有泥质灰陶、泥质紅陶、加砂灰陶加砂紅陶和印紋灰色硬陶等。由于火候氧化不匀，灰陶中常带黑色或灰黃色；紅陶中常带棕紅、淺褐、褐紅或酱紅色，个别的成为“內灰外黃”或“內黑外褐”的夹心陶”。屬于泥质陶系的以豆为主；个别的陶鉢屬之。屬于加砂陶系的以鬲为主；罐、鉢、大口器、角形器屬之。有一件陶豆也是加砂陶质，这仅仅是一个孤例。灰色印紋硬陶只发現两块殘片，器形不明。

紋飾很簡单，有绳紋、針叶紋和弦紋三种。绳紋主要是用于陶鬲与圜底罐、大口器；弦紋夹杂在绳紋中使用，其中豆底座上的凸輪，也可說是弦紋的一种；針叶紋仅見于硬胎陶片，其他器物中不見使用。

制作主要是輪制与手制，模印为輔。輪制与手制时常并用，模印仅仅是第二步加工。

（1）陶鬲：加砂陶，个别的外壁塗黑衣。束頸，折緣（或卷緣），款足較矮，襠很淺，出土后多已殘碎。（图3之4）

（2）陶鼎：3号灰坑出土，已殘，仅留鼎腿与鼎耳。鼎腿为圓柱形蹄足式（图3之5），胎色淺褐，內含小量砂质。

（3）陶豆：泥质灰陶为主，外壁或敷黑衣，造型有三种，都是按座底的特点来区别的，以2号灰坑出土的陶豆为例，I式底座作喇叭形，状如倒垂的牵牛花（图3之6）II式底座飾有凸輪两道，边緣折直（图3之6、7左）III式底座扁平，状如复盘（图3之7右）

（4）陶罐：（图3之8）加砂陶，口緣外侈，矮

4. 陶器口緣断面图

頸，腹扁圓，底部微凹，3号灰坑出土。

（5）陶鉢：分两式，I式泥质灰胎素面圜底陶鉢5号灰坑出土；II式加砂棕色胎平底素面陶鉢（图3之9）2号灰坑出土，手制，外壁敷有黑衣。

（6）大口器：加砂陶，大口寬唇，短頸，腹扁圓，底微凹，出土后大半殘破，口徑約25厘米左右（图3之10）。

(7) 角形器：3号灰坑出土，夹砂紅陶，黑衣，可能是陶器上的一个附件（图3之12）

(8)殘陶片：有素面泥质陶片、加砂绳紋陶片及印紋硬陶片等。其中以加砂绳紋陶片为最多，約占百分之八十；硬陶片仅有两片，其余則是素面泥质陶片。绳紋陶的绳紋作直条或斜綫形下垂，近底部則交織在一起。硬陶片交織的印針叶紋（图3之11），这些陶片当中有許多是器物的口緣（图4）。

三、結語

这五个小灰坑，文化层次相同，文化遺物也相同，应該是同时代的。其中以炊器和食器为最多（如鬲、豆等），陶器的胎质顏色較杂，陶豆屬于細把豆，陶鬲屬于淺襠矮足式，这两种器形的陶器在湘阴古罗城遺址中出土頗多，而且特征相同，因此这些遺存的时代也应該相当于春秋战国。

‖更　正‖

本刊1959年第11期文物工作报导栏“西宁南滩明祁秉忠墓清理状况”一文中，祁氏墓志上刻“明誥贈太子少保特进荣祿大夫左都督鎮守甘肃平关将軍总兵官爱宇祁公奉敕諭葬墓志銘丙辰甲子季癸初四日”，其中“太子”二字为衍文，应删，“平关将軍”应为“平羌将軍”，“丙辰”应为“天啓”，“季癸”应为“季冬”。

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調查記

湖南省博物館

湖南近几年来，在清理唐、宋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陶瓷器，就其器形来讲，有盅、碟、盂、杯、粉盒等日常用具。釉色以青釉为主，次为褐釉，或青黃釉繪褐彩，間亦有繪綠彩者，再次为白瓷。为了摸清这些陶瓷的燒造地点，1958年9月，省文管会曾派人到长沙县銅官鎮等地进行了初步調查，采集了不少的陶瓷片及完整的器物，对研究湖南唐、宋时代陶瓷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資料。

此次調查，从长沙出发，沿湘江而下，經长沙县的銅官，湘阴县的鉄官咀、烏龙咀，直至洞庭湖边的虞公庙、云田等地，都发現有唐或宋代的古窑遺址。尤以在长沙县銅官鎮附近的瓦渣坪一带，所采集的唐代彩繪瓷片及完整的器物最为精美，可以說明湖南在距今一千年以前，燒制瓷器的工艺，就有了高度的发展，无論在造型、施釉及彩繪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現将长沙瓦渣坪窑址分布情况及所采集的标本擇要簡介，以供研究陶瓷史者的参考。

瓦渣坪位于湘江东岸，离长沙市約五十余里，在銅官——湖南現在最有名的燒造陶器地点——上游約五、六里，原为望城县屬，1958年后仍划归长沙县管轄。

瓦渣坪的得名，即由于当地遍地皆有破碎陶瓷片，俯拾即是。当地群众傳說，唐代曾在这里燒制陶瓷器，以后因为缺乏料土——燒制陶瓷器的主要原料，才迁往他处。但究竟是什么时候停止燒造，現已无人知曉。

瓦渣坪是挖泥墩、藍家坡、廖家屋場、都司坡、长坡壠（一名金鸡岭）等地的总称，它南临石注湖，西靠湘江，北抵覚华山，东接古城山，周圍約三、四里。

到了覚华山，即可看到挖泥墩的住屋后有由破碎陶瓷片及窑具所堆集的高大窑堡。附近田地上，散布有不少陶瓷片及殘破的窑鉢等。瓷片主要是青釉或青黃釉，胎灰白而厚重，质极坚硬。向南約行半里，即为藍家坡。这里的綠彩白瓷及綠釉破片甚多，在地面采集了一件綠釉的瓷杯口沿殘片，釉色极潤澤。由藍家坡东行約半里至廖家屋場，屋場后有一大窑堡，几全由殘破窑具及青黃釉繪褐彩的碗碟破片堆成。由廖家屋場向东南行到都司坡。这里的陶瓷片，主要为青黃釉、黃釉繪綠褐彩及白釉繪綠彩的。黃釉瓷片，瓷胎灰白色；白釉瓷片，瓷胎白中微泛黃色。在这里采集到一件花形大碗，仅有部分殘缺，造型及釉色、花紋俱极精美。都司坡系一小阜（图1），在其山麓的断层上，发現窑址二处，窑頂及窑壁俱塌毁，仅殘剩窑底的鋪磚。磚寬23厘米，长33厘米，厚12厘米。在窑底下层40—60厘米的生土因燒窑时的高溫已变为紅色燒土。窑底寬約2.8米。

长坡壠（一名金鸡岭）在都司坡对面，中間隔一畦田疇。在长坡壠的斜岭上，亦发現窑址一处，窑底約成30度的斜坡，窑頂已下塌，殘剩的窑壁高約40余厘米。磚寬23厘米，厚12厘米，长度因未发現完整磚块，不詳。窑底鋪有窑渣厚約16厘米。窑底下层10—30厘米的生土，亦因經高溫而变成紅色燒土。这种斜坡形的窑，与現銅官鎮燒造陶器的长窑頗为相似。

在长坡壠附近，采集有白釉綠彩殘瓷壶、青釉盂片、黃釉綠褐彩瓷片，带藍彩的小盒上沿殘片及白釉圜形器等。

由长坡壠沿山峪向东南行約一里即至长坡。此处堆集有殘破窑鉢及青釉碗片甚多，未发現其他器形或釉色的破片，可能为专燒造瓷碗的窑址。

瓦渣坪一带，在解放前及1954年的时候，农

1. 瓦渣坪都司坡远景

民修建房屋，挖平地基时，曾挖出不少較为完整的陶瓷器，現所存留的壶、罐等，胎质、釉色、花紋与調查时在地面采集或試掘时所发現的陶瓷片完全相同，是非常可珍貴的。

現将采集的有代表性的器物及瓷片，按照地区，分别簡述于后：

一、挖泥墩

挖泥墩宋集的器物，主要的为罐、壶等，壶的式样有下列几种：

1、青黃釉綠褐彩繪花鳥瓷壶（頁31图1）

壶作瓜形，頸部已殘断，壶柄也已殘毁。全器殘高21厘米，頸殘高5.5厘米，肩以下微向外張，腹最大徑15厘米，底徑13厘米，离底1厘米处，腹壁向內微收，使底凸出一綫为弦紋状，壶咀頗短，作八角柱形，徑2厘米，与器壁相接处徑約3厘米。

壶咀下用綠褐色釉繪花鳥、鳥首微昂，长尾略向上翹，作跳跃状，虽仅数笔，而姿态若生。鳥的外廓作綠色，咀、翅、羽毛作褐色，叶及花等用褐彩繪外廓，中塡綠彩，极为鮮艳。彩繪后，全器施以青黃釉，塗至离底2厘米处为止。釉质甚薄，开碎片。

这件彩繪花鳥壶的发現，說明湖南在唐代已能燒制釉下彩的瓷器。

2、青黃釉褐彩貼花壶頁（31图5）

壶身作圓筒形，高22.5厘米，頸高3.5厘米，口緣外張，口徑8厘米，腹最大徑17厘米，底徑14.8厘米，壶咀长2厘米，口徑2厘米，壁厚約0.5厘米，与器壁相接处，徑約3.5厘米，作八角柱形。肩側有环形两系，其断面作山字形。壶后有执手，其断面与系相同。器身塗釉至离底1.5厘米处为止，釉黃中微带青色，开碎片。胎灰白色，质細膩坚实，

在壶咀及两系下，各塗有褐色釉如盾形，釉厚处成黑色。壶下有褐釉貼花，高出器壁約0.2厘米，紋飾上端为两带結成蝴蝶状結，結下有一楷书"張"字。带的外側，各有垂叶及鳥。各側系下，貼花作獅形，獅身中亦有一"張"字。左側系下的貼花与壶咀下貼花的紋飾，大致相同，但沒有"張"字。壶上的貼花俱为模制。推測"張"字可能为制造者或当时窰主的姓氏。

3、黃釉褐彩貼花壶

器高18厘米，頸高3.5厘米，口緣外折，口徑9厘米，短咀，咀长2.5厘米，咀徑2厘米，与器壁相接处約3.2厘米。腹最大徑14.5厘米，有两系及执手，执手已殘断，系断面作山字形。咀及两系下，各塗有褐色釉如叶形，貼花作双鳥、垂叶及蝶形紐带紋。器全身塗釉，釉黃色甚薄，口緣下部稍有剝落。胎为灰黃色。

2. 褐釉直柄壶

4、青黃釉貼花双魚壶

器殘高18厘米，頸部已殘，腹最大徑14厘米，胎作灰色。壶咀下有双魚貼花。双魚之間，有一"張"字。壶身作四瓣瓜形，釉作青黃色，不到底。有爆釉現象，釉质凸起，如水泡，开碎片。

5、褐釉直柄壶（图2）

器高19.5厘米，頸高4.5厘米，口緣外侈，口徑5.4厘米，腹最大經11厘米，底徑8.5厘米。直柄，殘长2.2厘米，寬2.5厘米，厚1.3厘米。

胎灰白色，质細膩，施全釉。釉色黑褐，光亮而潤澤，开碎片。壶底微向內凹，亦塗釉，惟边緣突起地方的釉有削去的痕迹。

6、褐釉瓜形壶

壶作四瓣瓜形，肩有两方耳，器高19.5厘米，頸高3.3厘米，口緣外折。腹最大徑15厘米。八角柱形短咀，咀徑1.8厘米，与器壁相接处，徑約3厘米。器身施以褐釉，色光澤匀潤，塗至离底2.5厘米处为止，下为黃色薄釉，但大部已剝落。胎灰白而略带黃色。

7、黃釉两系壶

器高14.5厘米，頸高1.5厘米，敞口作漏斗状，徑7厘米，腹最大徑10.5厘米，短咀，咀下于黃釉上加施褐釉如叶形。

8、綠釉壶（图3）

器高15.2厘米，短頸，直口，口徑4.3厘米。自肩以下，逐漸收縮，成为上大下小。腹最大徑12厘米。八角柱形嘴，长約3厘米。底微向內凹，底徑8厘米。全身施以綠釉，底周凸起处无釉。釉色深綠，溫潤如玉，极为美观。肩上有一殘缺的系痕及壶柄。瓷胎灰白色，质极細膩坚实。

9、綠釉小壶

3.綠 釉 壺

器高 9 厘米。頸作喇叭形，长 3 厘米，口緣外張，徑4.5 厘米。腹最大徑 6 厘米。平底，底徑 4.3 厘米。釉色翠綠，光色較上述綠釉壺稍差，釉塗至离底 1.5厘米为止。胎质坚实，白中略带黃色。

二 藍家坡

1、黃釉两系褐彩壺 器高 13.5 厘米，頸高 2 厘米，口緣已殘毁，短咀，作八角柱形。全身施以黃色薄釉，塗至离底 1.2厘米为止。壺咀下于黃釉上加塗有黑褐色釉如叶形。

2、青釉瓜形壺

器身作六瓣瓜形，高 16.5 厘米，頸高 5 厘米，徑 5.2 厘米，口緣外折，凸出頸外 0.8 厘米。腹最大徑 9 厘米。塗釉至离底 1 厘米处为止，釉青中微带黃色，不开片。

3. 青釉两系綠彩壺（頁32图 6）

器高 17 厘米，頸高 2 厘米，口緣外 折，唇 寬 0.8 厘米，腹最大徑 12.5 厘 米，平 底，底 徑 12 厘米，全身施青釉，釉色較深并夹有黃色斑点。开碎片，器身用綠釉繪簡单紋飾。

4. 綠釉瓷杯

口緣部份已殘毁，器壁較直，殘高約 3 厘米，底徑 4 厘米，外壁仅塗半截釉，釉色深綠，光澤匀潤，与挖泥墩的綠釉壺相似。

5. 黃釉褐彩水丞

器高 5 厘米，口 徑 3 厘 米，底 徑 3 厘 米，高 0.6 厘米。外壁塗半截釉，黃色中微泛青 色。开 碎片，有褐釉繪作“云”状的紋飾。

6. 褐釉花形碗

碗作四瓣花形，口緣外侈，器高 4.2 厘 米，口徑 12 厘米。碗托高 0.4 厘米。全身塗黑褐色釉，釉表似有一层銀光，釉开碎片。

三 廖家屋場

廖家屋場附近所采集的标本，俱为青釉或黃釉繪褐彩的碗碟碎片，仅有一黃釉繪褐彩碗及青瓷碟尙完整，胎质一般較粗，无藍家坡等地的坚实細膩。

1. 青釉瓷碟

器高 3.5 厘米，口徑15.5厘米，托高 0.5 厘米，碟壁外敞，外壁仅施半截釉，釉色較深而带艾色。

2. 青釉褐彩碗片

器高 3.5 厘米，徑約 13 厘米，托高 0.3 厘米，碟內緣微向內弇，內壁施黃釉，外壁施青釉，俱仅塗半截釉，碟底用褐釉彩繪。

3. 青釉褐彩碟片（頁31图4）

共采集了黃釉褐彩碟片十余件，俱为碟的底部，中有用彩褐繪的“荷花”、“葵花”、“水草”等花紋，用笔簡单，但頗生动。

4. 青釉托盞

盞与托相連，口緣外張如喇叭状，徑 9.5厘米，高 4 厘米，托的直徑約 16 厘米，器壁由底向外舒張如盘，釉青中微带黃色，开碎片。胎灰白色。

5. 黃釉繪褐彩碗（頁32图 8、9）

碗淺腹，口緣外侈，器高 4.5 厘米，口 徑 12.2 厘米，碗底用褐釉繪丛草紋样。

四、都司坡

都司坡附近散布的瓷片，种类比較复杂，有白瓷片、白釉綠彩、白釉綠褐彩、青釉、黃釉等碎片。器形有壺、碗、水丞、杯等。

1. 白瓷直柄壺

器高 16 厘米，頸长 3.5 厘米，口徑 5 厘米，腹最大徑 11厘米。底微向內凹，徑 8.3 厘米。柄为条状直柄，殘长 3.5 厘米，厚 1.5 厘 米，寬 2—2.5 厘米，与挖泥墩褐釉直柄壺（图 2）完全相同。

釉白色中微泛青色，施全釉，底部亦塗釉，惟凸起的边沿部份将釉刮去。通身有“爆釉”現象，显系廢品。

2. 白釉綠彩瓜形壺（頁32图 7）

器身作四瓣瓜形，咀、頸、柄俱已殘毁，殘高 15 厘米，腹最大徑 12 厘米，底微向內凹，底 徑 9 厘米，胎灰黃色。

釉色白中泛黃，塗至离底 2 厘米处为止。肩、腹用綠釉繪水草紋。

3. 黃釉褐綠彩鸡形壺（頁32图 14）

壺作鸡形，高 7 厘米，咀为头（已 殘），柄 为尾，翅則凸起貼于两側。腹作扁圓形，最大徑10厘

米，黄色薄釉，开碎片。

4. 青釉印花高足杯

杯作五瓣花形，口緣外侈，徑 10.5厘米，足外侈，高 1.2 厘米，全高 5.3 厘米，施全釉，釉青中微泛黄色，底部有印花。

5. 黄釉印花高足杯片

器形与青釉印花高足杯相同，惟杯底的印花不一样，釉为黄色薄釉，且稍脱落。杯高 6.2 厘米，足高 2 厘米，口徑 10 厘米。

6. 青釉印花高足杯片（頁 32 图 12）

杯高 5.7 厘米，足高 2 厘米，作花瓣形，器內壁施艾青色釉。外壁及足塗黄色薄釉。底中有飞鳥及卷叶紋。

7. 黄釉殘羽觴（頁 32 图 10）

器作橢圓形，纵长 2 厘米，横长 6 厘米，殘高約 4 厘米，两側飾以凸起的翅状貼花，望之如浮游的水鳥。

8. 白瓷托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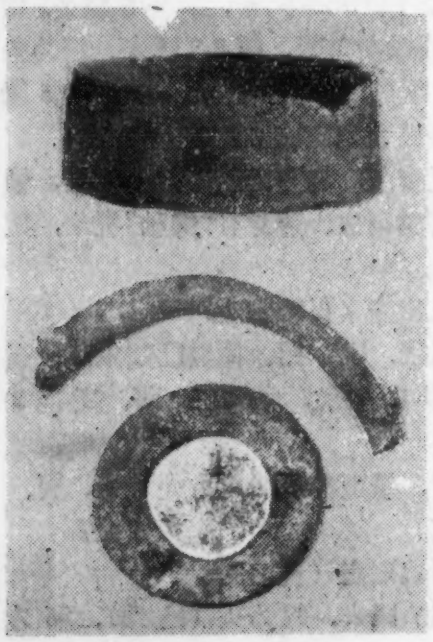
器高 4.7 厘米，盞高 3 厘米，壁成弧形，微向內斂，徑 7.9 厘米，托徑 8.3 厘米，外壁施半截釉，內中微泛青色，开碎片。胎灰白色，厚重坚实。

9. 黄釉褐彩水丞

器为扁圓形，高 4 厘米，徑 2.2 厘米，底徑 3.7 厘米。釉黄色中微泛青色，开碎片，仅施半截釉。胎带黄色，略含細砂，质較粗松。口緣用褐釉繪有星点状花紋。

10. 青釉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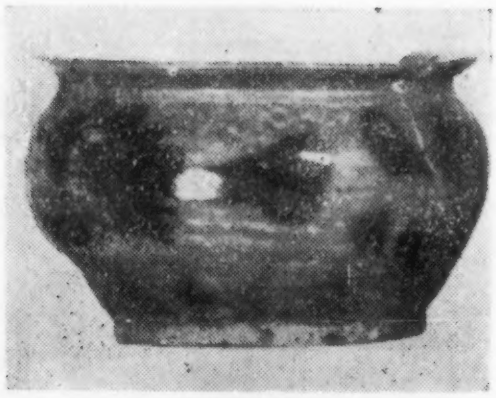
洗口緣內卷，淺腹，高 3.7 厘米，口徑 11 厘米，圈足徑 5.3 厘米，高 0.5 厘米，施全釉，釉色青中微带黄色。胎灰白色，器壁厚重。



5. 窑鉢(上)、窑托(中、下)

11. 青釉褐綠彩繪盂片

作圜形，可能为盂的底部，从碎片的弧度推測，原器直徑約 12—16厘米。器外壁无釉，內壁施青釉，繪联圓形珠紋，中一点为褐色，周为綠色珠点，外为褐色珠点，色調极为匀称。从殘片来看，整个花紋，系由五个联珠圓形所組成。



4. 青釉褐彩盂

12. 黄釉褐綠彩繪盘片（頁 32 图 11）

用褐綠釉繪折枝花紋，花瓣用綠彩勾輪廓，莖、蕊則用褐彩，外加施黄釉。釉、彩极为鮮艳潤澤。

13. 黄釉綠褐彩繪盘片

以綠褐彩繪丛叶紋飾，用綠彩勾画叶的輪廓，褐彩繪画叶的脉絡，外加施黄釉，釉色黄中带青。

14. 青釉褐彩盂（图 4）

器高 7.7 厘米，口徑 12厘米，唇向外折，寬約 1 厘米，底徑 9 厘米，內外俱施青釉，在腹部用褐彩繪作菊花形。

15. 黄釉綠褐彩繪花形大碗（頁 31 图 2）

碗作五瓣花形，高 12 厘米，足外卷，徑 13 厘米，高 1.5 厘米，以綠褐彩繪作联珠圓圈及菱形紋，口緣以綠褐彩相間繪五出花叶紋(图中深色为褐色，淺色为綠色)，外施以全釉，制作精美。

16. 青釉綠彩两系罐片

青釉褐綠彩两系罐的碎片，在都司坡附近采集甚多，其口徑由 13—17 厘米不等，多短頸，折唇，用褐綠彩繪作联珠圓圈或联珠菱形、方形等紋飾，綠褐相間，变化頗多。

17. 褐釉印花瓷片（頁 31 图 3）

寬約 5 厘米，长約 7.5 厘米，胎灰白色，质細腻坚实，外施褐釉，惟大部份已脱落。印花图案为棕树、水鳥和栏干紋，构图甚美，似为器身的貼花。

五、长坡墟

1. 白釉綠彩殘壶（頁 32 图 13）

壶下部已殘毁，口緣外卷，口徑 6 厘米，頸长 5.5 厘米，八角柱形咀。釉作乳白色，綠彩分布器身如流云。胎色灰白，质細腻。

除以上瓷片及完整器物外，尙有窑鉢、窑托等（图 5）。在瓦渣坪所采集的标本，窑鉢作圓筒形，平底，高 8—9.5 厘米，口徑 18—21 厘米。其中一件完整的，离底 2.5 厘米处有一直徑 2 厘米的“火

（下接 84 頁）

从两次調查长沙銅官窑所得到的几点收获

馮先銘

岳州窑是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唐人陆羽茶經一书中早已提到了它。十年来在长沙近郊唐宋古墓葬清理工作中出土了大量青釉瓷器，这类瓷器解放前也出土不少，过去一向把它看作岳州窑，但是缺少科学根据。1953年湖南省文管会得到了岳州窑窑址綫索以后，派人調查，在湘阴县鉄罐嘴发現了唐代岳州窑窑址，从而証实了一向被认为是岳州窑的瓷器确系岳州窑的作品无疑。长沙近郊出土瓷器除了岳州窑之外，还有不少青釉带彩瓷器，这类瓷器过去也把它列入岳州窑范疇之內，但在鉄罐嘴窑址里沒有見到这种带彩瓷器，因此知道它是另外一个瓷窑的作品，但窑址在那里，当时还沒有綫索可寻。1956年省文管会在普查工作中，在距长沙五十余里的銅官鎮瓦渣坪地方发現了这类带彩瓷器的大量标本，初步知道了它的燒制地点。1957年夏我曾与李輝柄同志到瓦渣坪做了一次調查，因为时間很短，又值阴雨，仅在地面上采集了一些标本，到得一些肤淺的认識。为了比較全面的了解一下，去冬借在长沙之便，又到瓦渣坪做了两天的調查。第一次調查路綫是乘輪到望城后乘小船过江，再步行三、四里到达瓦渣坪。第二次是到銅官鎮后东南行，沿馬場山脚小路到达古城大队，瓦渣坪距离大队只有三里之遙。

瓦渣坪是当地的俗称，是因地面瓷片而得名，它包括有都司坡、挖泥墩、藍家坡、胡家壠、长坡壠和廖家屋場几处地方。前四处遺址散布标本以青釉带褐綠彩为主，长坡壠和廖家屋場以青釉素碗为主。瓦渣坪整个遺址面积虽不很大，散布标本是比較丰富的，关于其分布情况以及每一品种的特征，在本期发表的湖南省博物館調查报告中做了詳尽的介紹，本文只着重談一下从两次調查中得到的几点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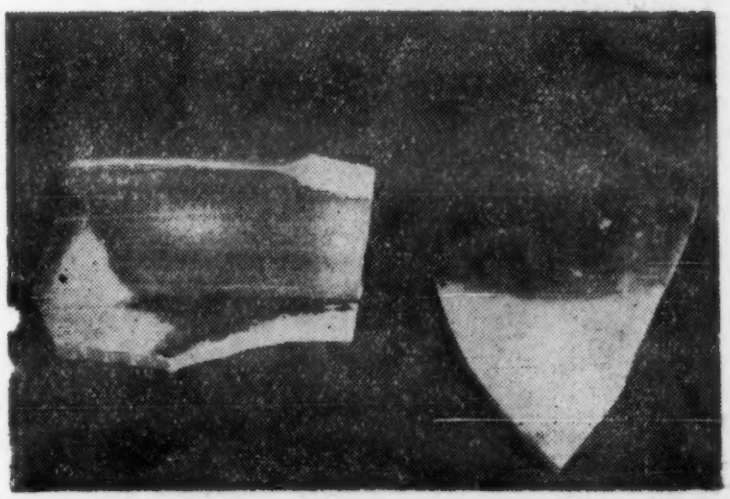
（一）中国陶瓷的发展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时代風格和地域性特点　唐代的瓷器仍以单色釉为主，青白两种釉色居于主流地位。从傳世瓷器看，唐代的装飾有三种方法构成时代風格，一种屬于造型方面，在瓶、壶、碗等器身上划刻上几条直綫紋，瓶壶有做瓜棱形的，碗口以花瓣形为多。一种为划刻花紋，这种装飾見之于上林湖越窑瓷器，划刻的紋飾綫条較粗，紋飾簡单，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新兴的装飾手法。一种是屬于釉子方面的装飾，这种装飾也只見于河南出土的一种黑釉藍斑和褐釉灰斑壶罐的器皿上。这三种装飾方法都处于初創阶段，都还沒有达到成熟的境地。

銅官鎮瓦渣坪燒制的瓷器，它所采用的装飾方法超出了当时一般規律，突破了傳統的单色釉，燒成了青釉带褐綠彩的瓷器，在一件瓷器上面出現三种色彩。一千年以前能够用三种不同金屬燒出三种不同色澤的花紋，这一成就应当給以极高的評价。特别是褐綠彩都是釉下彩，尤其难得。銅官窑釉下彩有以下几种不同装飾：

1. 釉下褐色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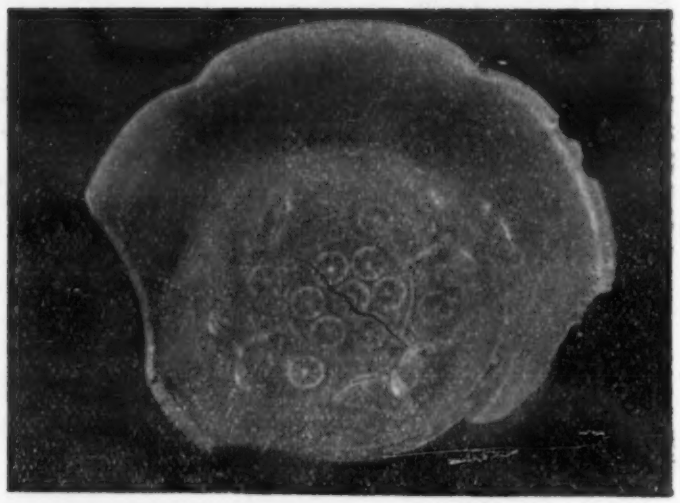
青褐瓷器带褐色斑点最早出現在东晋时期早期越窑瓷器上面，制做程序是在施好青釉以后随即点上一些褐色斑点，斑点因在釉上，燒成后很容易剝落。这种装飾方法东晋以后就不再出現。銅官窑所燒青釉褐斑是在釉下，先点褐斑然后施青釉，燒后釉面平整，褐斑永不脫落。这种装飾有两种，一种为大斑点，在壶和罐的口部或肩部画三四个（图1）；一种为小斑点，在壶、罐的器身上用連串着的斑点組成菱形、斜十字形或方形等图案紋飾。

2. 釉下褐綠色斑点　这类标本在藍家坡、都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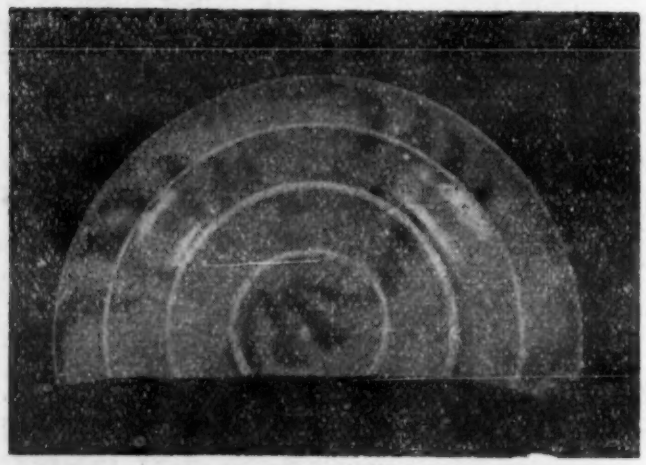


1. 銅官窑采集到的瓷片

1. 釉下褐綠斑点紋瓷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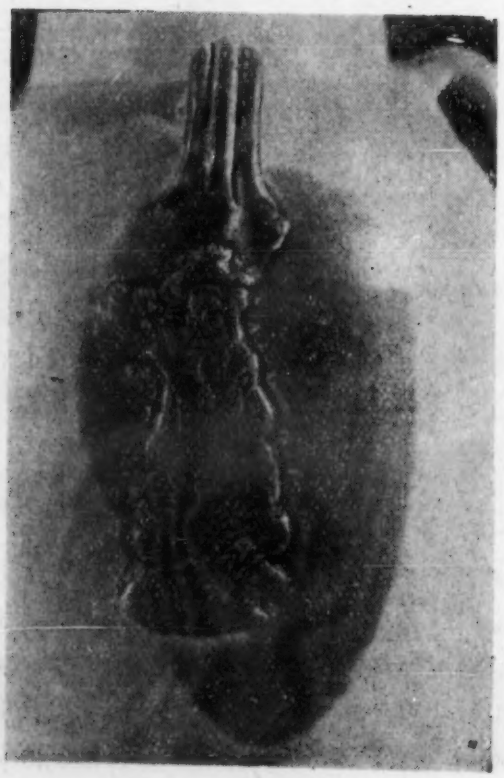


2. 印花蝴蝶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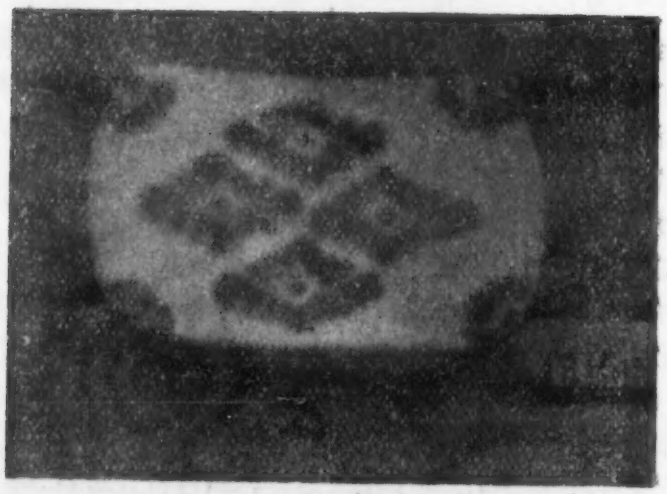


3. 釉下綠彩盒盖

4. 貼花人物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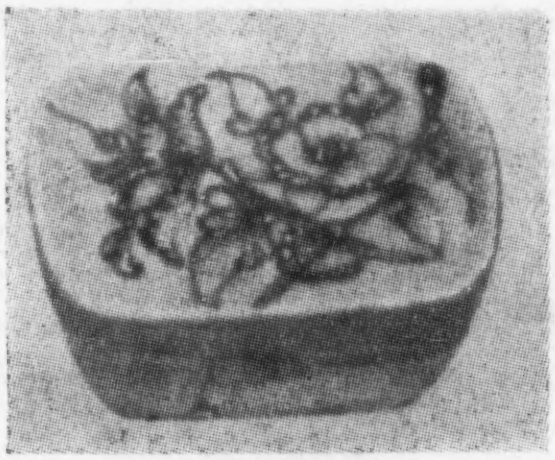


5. 貼花人物壺貼花部分



6. 釉下綠斑枕

坡、胡家壠和挖泥墩四处采集得到，其中都司坡散布較多，这是銅官窑瓷器中产量比較多的一个品种。这种装飾也以壶、罐等器皿为多，大型洗和碗上也常采用。斑点的排列方法是褐綠相間隔的連串在一起組成斜方、四方、六方和环状等多种图案紋飾（頁72图1）。也有褐綠彩大斑点装飾在壶的上部，但这类标本很少。釉下褐綠彩是銅官窑中最美的一种，也是燒制过程中最难掌握的一种，燒好它必須熟练地掌握三种金屬的变化，但是这样复杂的燒制技巧完全为古代銅官窑的匠师所掌握，燒出鮮艳的褐彩綠彩，与青黃色釉子配在一起极为調和。关于綠彩問題有特别提出的必要，按照一般的理解，綠色只有銅金屬可以燒出，在两种溫度下都能燒好，汉唐时期低溫綠釉陶器屬这种类型；在氧化焰高溫中也可以燒成綠色，还原焰中燒成紅色。銅官窑瓷器是屬于高溫氧化焰燒成的一种，那么綠彩应当是銅金屬燒成的了。但从頁72图1右下方标本来看，它上面的一排綠彩斑点，呈現了两种顏色，斑点上半部未施釉处呈現藍色，其色調与唐三彩中的藍彩完全相同；斑点的下半部由于外面施釉而呈綠色。这个現象就使我們提出一个問題，上半部沒釉为什么燒成藍色，下半部有釉为什么会呈現綠色？这首先这使人怀疑到这片标本上的綠斑不是用銅金屬燒成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銅不会燒出藍的顏色，三彩中的藍彩和青花瓷器之能燒出藍色是因为用鈷的关系。这样就进一步联想到这片标本是否用的鈷，但鈷又为什么能燒出綠色呢？經过仔細观察，可以肯定这片标本确是用鈷，它的下半部其实也是藍色，但是由于上面层了一罩青黃色釉，黃色与藍色重叠在一起构成了綠色。发現这个情况后再仔細观察所有釉下褐綠彩标本，都可以証实这一点。这个看法虽然是仅依据一般金屬的化学变化来推断的，但姑且提出来，供大家研究，問題的解决还需要經过化驗分析来得出結論。



3. 花卉枕

2. 鸚鵡枕

3. 釉下綠彩：

这类标本共有两种，一种为白釉，一种为青黃釉。白釉綠彩的装飾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在瓶、罐或壶身上任意画几笔似云霞或水波状的花紋；另一种是用小圓斑点組成各种菱形（頁72图6）、圓形的图案或花紋。这类标本，白釉的色調极柔和，而綠彩又极淡雅，配合在一起非常調和，其綠彩是銅金屬所燒成的。青黃釉綠彩也有两种装飾方法，比較簡单的也是任意画几笔，頁72图3盒盖上的紋飾就屬于这类。这件釉下綠彩就用的是鈷，藍色很重，如果上面罩的是白釉的話，那就会显出青花瓷器的效果。所以从这片标本看，无論是从原料或是燒制工序說，都可以看成是青花瓷器的鼻祖。此外还有图案比較繁杂的，上面画象征性的花草或花卉紋。

4. 釉下褐綠彩繪：

这是銅官窑装飾最复杂的一种，制法也有两种，一种是在用褐綠彩在胎上平画花鳥紋，繪画題材应用到瓷器上面，这又是銅官窑的另一項創举。另一种手法是在胎上先划刻花鳥的輪廓，然后在輪廓綫內塡褐綠彩，最后再施青釉。这在制造工序上是很繁复的，这不仅要經过一般制瓷的工序，还要結合雕刻和繪画的手法在內，这种装飾的創造不知要匠师們付出多少心血！图2鸚鵡枕，枕面鸚鵡互相顧盼，比翼双飞，姿态活潑生动，是銅官窑釉下彩繪中的精湛作品。图3花卉枕花卉布局严謹，富有生气，但这件瓷器都在解放前已流出国外。

（二）銅官窑瓷器的对外傳布　中国瓷器唐代时流傳到国外的很多，多年来在印度、埃及、伊朗和日本等国的古城廢墟和寺院里都发現有越窑、邢窑和三彩陶器的碎片和完整器物。这一方面說明了唐代海上交通的发展，文化經济上的交流情况，也說明这些陶瓷器在当时是深受欢迎的，这也可以从

文献上得到印証。二十多年前在朝鮮龙媒島的古遺址里出土了一件青釉褐斑貼花人物壶(图4)，壶肩部两面有双系，一面有八方形短流，与流相对的一面有一柄，两系及流下各貼一人物，上各有一褐彩圓斑。这种壶以往长沙唐墓中时有出土，解放后治淮工程中在安徽省寿县亳县也各出土一件。这种壶因寿县出土过，曾怀疑它是寿州窑，現在知道它也是銅官窑的出品。頁72图4是第一次調查时采集到的一件。朝鮮出土的还有类似者两件，一件比龙媒島出土的稍大，造型釉色都大同小異，柄下有褐彩书"卡家小口天下有名"八字。另一件基本上与前两壶相同，人物上沒有褐斑，柄下有"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八字(注)。这种貼花人物壶，人的形象大致相同，都是作乐舞的胡俑(頁72图5)，身着短服，帽有飄带，或吹笛，或奏乐，或做舞姿，足下都踏有圓垫。从風格上看，吸收了外来因素。貼花人物多固定在流及两系的下面，有三面都貼人物的，有一面貼人物两面貼坐獅的，也有两面貼人物一面貼双鳥紋的。銅官窑貼花壶有不带褐斑的，有貼花双魚紋的，很别致。从三件壶上的字看，知道"卡家""郑家"和"張家"(頁31图4)是銅官窑中有名的作坊，因为瓷器燒得很美，就写上了带有宣傳性的"天下有名"和"天下第一"了。

銅官窑不仅傳到国外去，国內其他地方瓷窑也吸收了它的优点，四川邛崍窑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两个窑所燒瓷器基本上差不多，青釉褐斑、綠斑的風格一样，在輪旋方法上也相同，这些特点絕不是偶然的巧合。一个时期里的产品是有其共同点的，但又各有其地域性的特点，特别在輪旋和支燒方法上絕少有完全相同的，而这两个窑的巧合說明它們之間的关系是比較密切的。邛窑瓷器中仿上林湖越窑式样花紋的很多，还有印花鸚鵡紋小盒和海棠式杯等等。善于学习的邛窑匠师对銅官窑器从成形輪旋以至施釉全部工序的尽量模仿，使得两窑产品在風格上区别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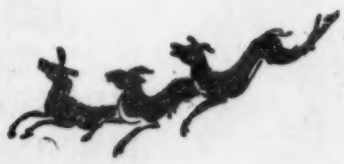
(三) 銅官窑燒制时限　从瓦渣坪窑址所采集的标本結合长沙近郊唐代墓葬出土瓷器看，尙未发現有早于唐代的器物。湖南省博物館藏品中有一件带貞明年款的小枕，枕的形式与唐代的沒有区别。长坡壠及廖家屋場两处的青釉素碗，五代时期的为数不少。整个窑址里宋代的标本还未发現，它的燒制时限应在唐与五代这段期間之內。

4. 朝鮮出土的貼花人物壶

(四) 印花标本中有一件上带有蝴蝶紋飾(頁72图2)，用印花蝴蝶来做瓷器上面的装飾，以湖南长沙出土唐瓷稍多，其中有一种白釉小盒，盒盖印一只蝴蝶，上点褐彩，这种小盒陝西河南唐墓中也有出土，过去不能肯定其窑口，今天也得到了解决。

(五) "壶"的名称始于明，关于唐代壶的名称究竟叫什么，唐人李匡乂資暇集里有"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无遺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罄，而盖、嘴、柄皆具，大和九年(公元835)后，中貴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傾仄，今見行用"的記載，可以知道唐时称壶为"注子"和"偏提"。而朝鮮出土的两件壶銘文上都称为"小口"，"小口"一名未見文献記載，这名称可能是当时当地的一种俗称或作坊里的术語，使我們于"注子"和"偏提"之外又多了解到一种名称。

注：参考奥平武彦"朝鮮出土の支那陶瓷器杂見"一文，1937年出版陶磁九卷二号



介紹几件从廢銅中檢选出来的重要文物

湖南省博物館

解放以来，湖南省从廢銅中檢选出大批的珍貴文物，現选擇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件，介紹如下：

（一）商梟卣　共两件，是1957年在株州廢銅交接站采集来的。卣均作两梟鳥相背立，四足一梁，极其生动，与商周彝器通考图版六四七、六四八所載两梟卣形制，如出一范。一器花紋細密，精美異常，一器虽較簡单而形态毕肖。原器盖已失去，經湖南省博物館修复始成完器。（頁29图2、3）

（二）西汉楊子贛銘文銅鋬　楊子贛銅鋬，系放解前在长沙市东南郊区徐家灣楊家山发現的。器全高20、口徑14、腹徑25厘米。器盖和器口边沿均有"楊子贛家銅鋬盖并重十六斤"和"楊子贛家銅鋬容三斗有盖重十六斤"等銘文，器內貯有粟米。据說同时出土的器物极多，銅器有鼎、壶、鈁、盒、鍑、箕、灯、灶、劍等；漆器有銀扣漆盘、銀扣漆梧、方漆盒和玳瑁小盘、珮环等；其中尤以书有"元康四年"銘文的漆方盒和"楊主家盘今长沙王后家盘"銘文的漆盘更为重要。按汉书景帝十三王长沙定王刘发傳云"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故王卑湿貧国，二十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鮈嗣，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宣帝时，坐猎纵火燔民九十六家，杀二人，又以县官事，怨內史，教誣告，以棄世罪，削八县，罢中尉官，三十四年薨云云"。根据这段史料，則长沙刺王建德承嗣王位，当在汉宣帝时，而漆盒和漆盘上面又有"元康四年楊子贛緒具子下"和"楊主家盘今长沙王后家盘"等銘刻，由此推知，此墓为长沙刺王建德夫妇的合葬墓，楊子贛应即长沙王后的"名諱"。（頁30图5、6）

（三）东汉銅鍾　是1958年在株州廢銅交接站选出的。共两器，小頸鼓腹，上有凹絃紋七匝，兽耳高足，鍾頸两面均鏤刻紋飾。一器头的一面作鷺捕魚，画后有隶书"主师作上牢，宜子孙"八字銘文。另一面刻一人佩刀張手，作捕鳥状，底足作六方形，每方刻有各种鳥兽，作飞跃奔逃状，一人佩刀張弓銜矢，在后面追逐；另一方刻有"邓次严銅鍾一只，直錢六千五百卅"銘文，鍾底有阳文"主人相宜"四字。另一器，形制与前器相同，惟花紋較复杂，一面刻一碉堡，下坐一人，口中銜矢，以足張弩，一面刻枯树一枝，上系一馬，馬前置槽，树枝上立一鷹隼。器口有"富貴昌乐未央李是"八字阳文。（頁29图1）

（四）銅鼓　为我省西南一带兄弟民族所用的打击乐器，現在各兄弟民族在庆祝和集会时，还有用此种銅鼓的。湖南省博物館历年来在长沙株州各廢銅仓庫中所采集的銅鼓，有二十余面。大的直徑为94、高26.7厘米，一般的直徑20、高25厘米。时代由汉至清。上面的花紋，大都因时代而異制，汉代的銅鼓，多采用人物和船形，或者用雀鳥、古錢、芦席等紋飾，鼓的上面还有突出的青蛙、双魚、人馬等装飾。唐代的銅鼓，多用十二生肖。（頁30图8、9）明清則用八宝紋飾鼓面絕少用青蛙和人馬等装飾的。这些銅鼓中，尤以在株州交接站廢銅中选出的一件鼓口边沿有突出的雀鳥的最为特出。此鼓鼓面有四蛙，花紋和一般汉代銅鼓相同，惟鼓下口边沿鑄一雀鳥，腹部成空洞，推測其作用，可能是安插鼓槌之处。

1. 雀鳥紋銅鼓

（五）錞于　亦为兄弟民族乐器之一，在我国西南各省发現最多，时代則仅限于战国至两汉。湖南省博物館历年来在各廢銅仓庫和常德采集的，大小約十三件，其中一件系1956年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出土的。汉代的多作虎紐，也有作馬紐的。战国則多作环紐。同时还有一件有底的錞于，为历代金石书中所未見。这些錞于中，最重要的就是上面刻有特殊图案的，图案用文字和物象組

成，很可能是兄弟民族原始的記事符号，現在将刻有特殊图案的錞于說明如下：

（1）椎髻人头紋飾錞于：是1957年在长沙物資局廢銅中选出的，体质厚重，作淺綠色，紐作虎形，虎紐的四周均刻有紋飾，前面刻一椎髻人头，右側刻有用文字組成的船形，左側刻魚形和梭子形云雷紋飾。

（2）側身人象錞于：是1956年在常德采集的。形制大小与前器相同，惟色澤深碧，光滑異常，虎紐殘缺，紐的右側刻有一人两手前伸側立，人后刻魚形和梭子形云雷紋，形制和前一器相同，左側刻一用文字組成的船形，船中設两圓墩，上插树枝状物。（頁30图7）

（3）馬紐錞于：較前器略小，紐作馬形，紐的前面紋飾作ᴗ形，右側作船形，左側作魚形，后面作彡形。

（4）虎紐錞于：紐前紋飾作ᴗ形，右側作魚形，左側作鷺形，后方作S形。

（5）五銖錢文錞于：紐前作五銖錢文，右側作船形，上插羽毛形紋飾，左側作魚形、后作O形。

（6）貨泉錞于：紐前紋飾作π形，右側作魚形，左側作"兮罕宜亖"四字，后作貨泉錢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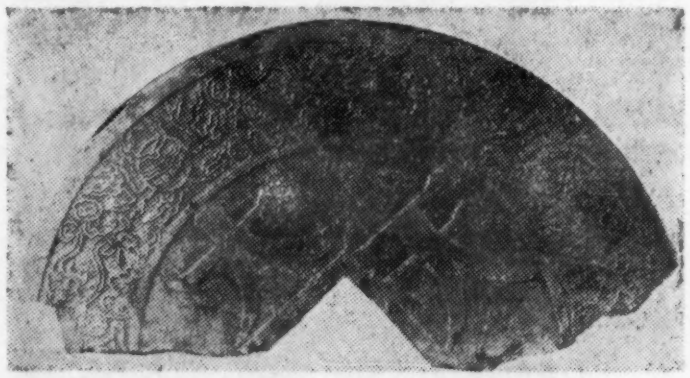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一器下面口沿有云雷紋一周，器身两面均刻有极凶猛立虎，虎紐亦較其它虎錞为精細，可能为战国时物。（頁29图4）

綜合以上所举的各种图案，多与兄弟民族生活有关，如第一器的人头上椎髻，即为兄弟民族装飾的特征，現在湘南一带的傜族，尙綰这种发髻。第二器上的船形图案，船的前方和后方均有招（等于前面的舵，湘西一带称为招）和橹，因为我省湘西一带，大都是灣多水急，如果全凭后面的舵和橹来控制船只的行駛，是会发生危險的，非得前面招来协助不可，至今行駛灘河的船只，前面还有招的設备，甚为明显。此外魚形与梭子云雷紋的合拼的图案，和解放前四川万县出土的錞于图案相同（說文月刊巴蜀号）。錞于上面的特殊形象的图案，是否为古代兄弟民族記事用的符号或文字，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問題。

2. 五代楚王馬殷"天策府宝"銅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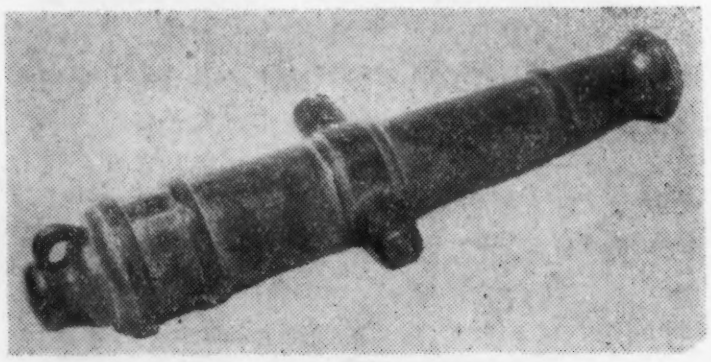
（六）五代馬殷天策府宝大錢　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的"天策府宝"大錢三品，都是在株州交接站廢銅中选擇出来的。体质厚重，文为"天策府宝"四字环讀，是五代楚王馬殷所鑄。当时并有鉛錢和鉄錢两品，均以唐代"开通元宝"和"乾封泉宝"为文。按五代史楚世家云"馬殷請于梁，依唐太宗故事，开天策府，置官屬，太祖拜殷为天策上将軍"；又十国春秋云"楚武穆王乾化元年鑄天策府錢，文曰天策府宝"。据此則此錢为五代楚王馬殷开天策府时所鑄的紀念币，故傳世很少。

（七）太平天国龙凤紋大錢　太平天国龙凤紋大錢，湖南省博物館历年来在各地仑庫廢銅中采集甚多，其中除了当时各种行用品以外，有龙凤八宝花紋的大錢三种，一种正面的边沿作二龙戏珠，当中为太平天国四字，背面边沿作八宝紋飾，正中直书圣宝二字，两旁配以双凤，对徑11.5、厚0.8厘米；一种花紋相同，惟龙珠里面有三小圓点，直徑14厘米、厚0.8厘米。其中尤以在株州廢銅交接站仑庫选出的鎏金龙凤紋太平天国大錢，更为突出，錢的直徑为33.5、厚0.8厘米，花紋与上述大相同，惟龙珠上面多五个小圈，通体鎏金，已殘缺，仅余一半。根据此錢形制，决非当时行用的貨币，故体质重大，花紋繁細。



3. 太平天国鎏金龙凤紋大錢

（八）太平天国銅炮　太平天国銅炮大小两尊，系1956年在长沙物資局和株州交接站仑庫廢銅中选出的，炮用紅銅鑄成，极为精致，一尊正中有"太平天国乙荣五年置造"十字銘刻，左有"重三百五十斤"右有"实粉　　两"。另一尊銘刻为"太平天国丙辰年置造"，左为"重貳伯觔"、右为"粉拾两"，"太平"二字均系横列，余皆直书。銘文正楷双鈎，整齐異常。　　执笔人：蔡季襄



4. 太平天国丙辰年銅炮

湖南的文物工作

高至喜

建国十年来，在党的正确領导下，在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社会主义建設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物工作也随着蓬勃地发展起来。湖南和全国各地一样，十年来的文物工作成績是巨大的。配合省內各县、市的基本建設工程清理发掘了古墓葬五千余座，出土文物四万三千余件。特别是其中的一千余座楚墓，一万余件楚文物，更是丰富多采，为历史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資料。調查发現了新石器时代遺址或有遺物的地点四十余处，采集到大批的石器和陶片等。春秋战国及汉唐遺址和窑址，也不断地被发現。全省范圍內的文物普查也已基本完成，仅据四十九个县市的統計，发現古文化遺址217处，古墓葬573处，有重要意义的革命紀念建筑物、革命遺迹60处，古建筑564处，石刻碑記178处，收集各种文物資料14,620件。在普查的基础上，省人民委員会前后公布了两批保护单位，共131处。各专、县、市也分别公布了文物保护名单。从廢銅中檢选和从流散文物中收集的古銅器一万六千余件，古旧图书近百万册，字画碑帖20,346件，古錢242,509个。对革命紀念地如清水塘、船山学社和重要名胜古迹南岳、岳阳楼、岳麓山等，共撥款九十多万元进行了修繕或采取加固維修措施，并开放供广大群众游覽。資料的整理研究工作也大力开展起来，所有积存的四千余座墓葬資料，已在全面大跃进的高潮中基本上整理完毕。写出有“长沙楚墓发掘报告”，“长沙汉墓发掘报告”等十多个报告。历年来还編写了“湖南古文物图录”、“长沙出土漆器图录”、“湖南出土銅鏡图录”、“湖南楚汉兵器选集”、“湖南的名胜古迹”、“鋼鉄史話”及“文物考古常識”等十一种书稿。已发表的文章、发掘报告、簡报、簡訊等在二百篇以上。此外还制发了大量的标語、宣傳画、傳单、小册子、幻灯片、和举办各种出土文物展覽会。用口头、文字、广播、座談等多种方式，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文物政策法令的宣傳和文物知識的普及工作。省、专、县分别举办了文物考古訓练班，培訓的文物考古干部已有四百余人，成为湖南省文物考古工作的基本队伍。

我們不但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上述的成績，同时从工作实踐中还摸索到了一些經驗教訓，得出了几条結論：

一、文物工作必須由党来領导。十年来，我省在文物工作方面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綫的斗爭有时也是十分激烈的，其中領导权的問題，是一个突出的表現。在一个短时期內，以陈浴新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窃据了省文管会的領导职位，他們壟断文物，招兵买馬，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明目張胆的对抗和破坏中央的保护文物的方針政策。他們誣蔑“党不懂文物工作”，“把文物工作搞得一团糟”，并高唱着“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的濫調，企图篡夺党的領导权。他們暗地里采用盜墓的方法来攫取“珍貴”文物，破坏了二百余座大型的楚汉墓葬。还采用“凡古皆保”，“見墓就挖”，“遍地开花”等办法，来对抗和破坏中央規定的“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針。他們自封为“文物专家”，誣蔑“群众不懂文物”，“群众不能做好文物工作”，来对抗党的群众路綫。他們一切工作墨守成規，慢慢吞吞地进行，以对抗党的高速度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方針。因此曾經一度給省內的文物工作带来一个冷冷清清的局面。反右斗爭胜利后，加强了党的領导，政治挂帅，拔白旗，插紅旗，在全国全面大跃进高潮的影响下，文物工作也出現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生气勃勃的大跃进的局面。由此可見文物工作毫不例外的只有党才能領导，也只有在党的領导下，才能把文物工作大大的推向前进，

二、文物工作必須走群众路綫。群众路綫是党的一条最根本的路綫。当然也不例外的完全适用于文物工作。但曾經有人怀疑文物工作能否走群众路綫，右派分子反对走群众路綫。几年来的事实証明，文物工作必須走群众路綫。如1958年全省的文物普查工作，由于省里举办了两期文物干部訓练班，培訓了一百余干部和一大批文物考古积极分子，紧紧依靠专、县、社各級党委的領导，充分发动群众，仅两个多月的时間，便基本上完成了普查任务，取得了巨大的成績。1958年8月省人民委員会发出通知，把考古发掘权限下放以后，湘乡县就立即抽調三名小学教师成立了文物清理工作队，經省博物館派員輔导，边干边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間內，便掌握了一般田野发掘技术和具备了初步的文物考古知識。担負起了全县內湘黔鉄路和工农业生产建設工程中的文物考古調查发掘任务，并写出了清理簡报。长沙市，衡阳、郴县两专署的各县、市也相继成立了文物工作队或培訓了大批文物考古工作干部，适应了配合当前工农业生产建設大跃进做好文物考古工作的迫切需要。常德市一个文化干

部，只有高小文化水平，經过一个多月的苦钻苦学，也基本上掌握了一般田野发掘技术，能够独立进行工作了。省內积存的四千余座古墓葬資料，以前不敢动手整理，在等待专家来写发掘报告，但在大跃进的洪流中，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大家一齐动手搞整理，保管員、发掘工人也参加，集体研究討論，大家动脑筋找窍門，就这样把原来要三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只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間就基本上完成了。上述事实雄辯地否定了“群众不懂文物考古”和“群众不能做好文物考古工作”的謬論。由于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文物宣傳，提高了群众对保护文物的认識和积极性，因而許多人紛紛把多年珍藏的文物自动捐献給国家，群众自动向政府报告文物綫索。如1958年全省文物普查中收集到的一万四千多件文物，几乎全部是由群众捐献的。湘乡县1958年文物普查中由群众自动捐献的文物将近一千件。湘乡城关鎮西門外一个十三岁的小学生李玉和，看到展覽会上的一些陶器和自己家附近所看到的許多陶片相似，便向政府报告了这个綫索。由于他提供了綫索，在那里发現了一处重要的古遺址。湘乡师范的师生在紅仑山上开荒，发現了一件石器和一只鬲腿，他們立即报告政府，因而在那里发現了一个重要的楚墓群。像这些生动的事例是很多的，可見广大人民群众他們是多么热爱祖国的文物！我們祖国的山河如此辽闊，文物遍地皆是，也只有认眞的走群众路綫，相信群众，发动群众，才有可能把文物工作做好。

三、文物工作能够“多快好省”。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在我們一切工作中都应該坚决貫彻执行，文物工作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是也有些人由于右傾思想作怪，强調文物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多了快了省了，就不符合科学的“規格”，因而不能跃进，只能慢慢来。实事对这种思想給予了有力的駁斥。全省的文物普查原計划三年完成，可是在省委、省文化局和各級党委的正确領导下鼓足了干勁，解放了思想，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竞賽，依靠了广大群众全省的文物普查仅两个多月的时間便完成了。使約一千万群众受到了关于保护文物和文物政策法令的宣傳教育，基本上摸清了全省文物的底細，为今后有計划有重点的保护和清理发掘打下了基础。又如上面提到的資料整理工作，由于采用了“全体动手，分工合作”；“簡化造卡表格”，“实行流水作业”（如实行“六边”，即边放图紙，边开箱，边断代，边分类（划式），边处理破陶片，边上架，六道工序一次完成。）以及同一地区（或同一时代）合并整理等方法后，也較原計划时間大大縮短。写出了长沙楚墓、汉墓、两晋南朝隋墓等发掘报告十余个，达五十余万字，工效提高十倍，时間縮短两年。由此可見，問題不在于文物考古工作本身能不能跃进，而在于是否鼓足了干勁，是否貫彻了总路綫的精神。

四、必須貫彻“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針。

要配合当前規模宏大，波瀾壮闊的社会主义經济建設来作好文物考古工作，必須认眞切实貫彻中央規定的“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針。否則要“凡古皆保”，“見墓就挖”，“遍地开花”，那是不現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前的建設規模如此宏大动土面积如此广闊，遺址墓葬会大批发現，名胜古迹、古代建筑等也会有不少要予以保护或处理。而文物考古方面的人力和物力都有一定限度，只能占着适当的比例，因此在主观力量和客观情况之間便产生了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达到“既对經济建設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两利目的，那就只有貫彻“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的方針。1954年以前，我們在“凡古皆保”“見墓就挖”“遍地开花”的时候，結果往往是顧此失彼，最多时一人兼顧二、三个工地，一天清理近十个墓葬，一天到晚手忙脚乱，工作难免粗糙，材料必然大量积压，反而造成文物的損失，甚至要影响到建設工程的进行。但自从貫彻这个方針以后，情况就改观了。首先普遍調查，摸清情况，然后选擇重点。我們选擇的重点是：在地区上选擇对解决历史考古学的問題有重大价值的地方，如长沙、常德等地；在一个地区內則选擇有較大价值的遺址和墓葬而工程又紧急的工地；在一个工地內則选擇动土区或基础下要遭到破坏的先清理。在动土区、基础下的再选擇完整的、典型的、科学价值較大的先清理，这样一来，不但重要的文物可以保証不遭破坏，提高了工作质量，而且又保証了基建工程的順利进行。同时还可以騰出人手来整理积存資料和实行“边挖边整边研究”。可以說是多快好省，全面完成任务。

* *

浯　溪

湖南省博物館

护碑亭

浯溪在祁阳县城西南四里，濒临湘江左岸，峭壁悬立，怪石嵯峨，溪流环繞，林木葱蔚，風景极为幽美，唐至明清的碑刻摩崖甚多。有“鏡石”、渡香桥、引胜桥等名迹。浯溪因唐元結(次山)撰顏魯公(眞卿）书写的摩崖“大唐中兴頌”而名始著称。潘来遂“元次山罢道州，乐其幽胜，遂移家焉。一水一石，各为之銘，又乞顏魯公书其所作中兴頌，鏡諸崖壁”。

大唐中兴頌，为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元結撰，顏眞卿书，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夏六月摩刻于浯溪峭壁上，因石质坚硬，故历千余年尙保存完整，俗称为“摩崖碑”。浯溪旧志說：“崖石在浯溪之东北，高二十余丈，横闊二十余丈，崖巔多老树瘦藤，其下三丈許，平坦如削，石色青潤，元次山因安史旣平，作大唐中兴頌，請顏魯公楷书，鐫于崖壁上，共三百三十二字，大四寸五分，是魯公生平第一得意书”。金石文篇曾有著录。大唐中兴頌是我国唐代著名的摩崖四川省的劍州鶴鳴山，資州东岩、北岩，俱有中兴頌的翻刻本，可見它受世人之珍視。

摩崖石壁，因年代久远，受自然風雨的浸蝕及拓摹的損毁，已发現裂縫数处，并有少数字迹模糊不清。1953年人民政府为了保护名胜古迹，特重修建护碑亭，上以水泥作横檐，使水溜不致下浸，并于摩崖前装木栏，禁止任意拓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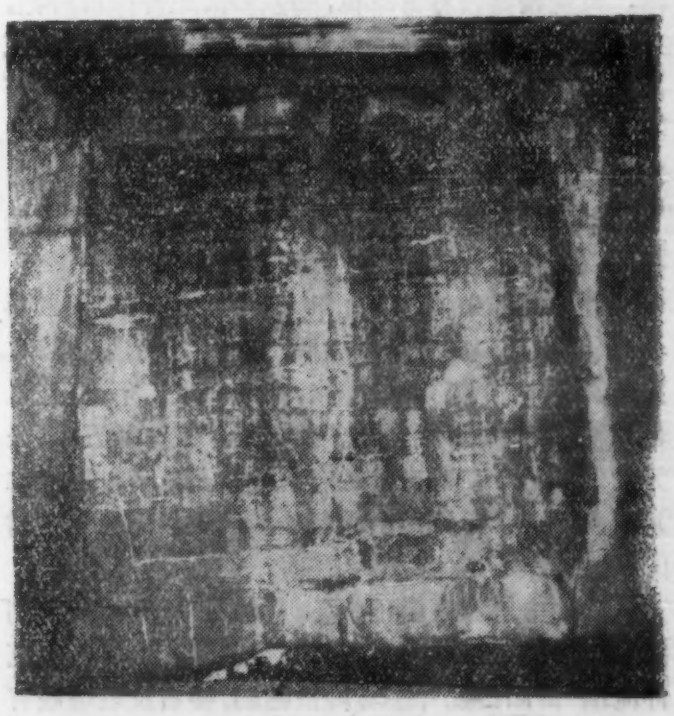
浯溪除最著名的大唐中兴頌摩崖外，尙有元結的三銘——峿台銘、語溪銘、居瘐銘及宋黃庭堅的浯溪詩等。浯溪銘、居瘐銘系刻于大唐中兴頌的对面东崖，久掩埋于蔓草荆棘中，以前或以为已損毁，1957年全省进行文物普查时，披荆斬棘，始复寻获。

峿台銘刻于青石上，寬1.12元、高2.06米，元結撰，篆书，字作长方形，长11、寬6厘米，无篆书姓名，末署大历二年（公元781年）六月。

浯溪銘磨刻于一块凸出的岩石上，篆书，未署书写人姓名，长約2.4、寬約0.55米，随石欹斜，不少字迹因風化已不清楚。

（下轉81頁）

大唐中兴頌



峿台銘

岳阳楼位于岳阳城西的城墙上，坐东朝西，面临洞庭湖，俯瞰湖波，遙望君山，眼界非常开闊。楼身为木結构，平面寬深各三間，三层三檐，高約14米左右。屋頂及各层檐均复以琉璃瓦，各檐翼角高翘，上飾釉陶飞凤，非常生动。脊上均有各种花样的釉制装飾。最上层檐下施“如意斗栱”，为清代手法。中层四面环以明廊，可供游人凭栏远眺。下层正面均装木制隔門，上半截雕有玲瓏剔透的几何形紋欞格。楼中是用徑50厘米的粗壮枏木四根，从地至頂，作为核心支柱，二楼用中徑42厘米的大木十二根作內圍支柱，底层用中徑30厘米大木二十根作外圍支柱，彼此牵制，結成整体。各柱均髹以朱漆，使全楼显得非常雄偉，而色彩又配合得很鮮艳。

楼前的两边有三醉亭和仙梅亭，与楼衬托，成品字形。楼前数十步，即城墙边緣，临湖一面建有石栏，高約一米余，望柱上刻有獅、象、蓮花等，南北两端建短磚墙，开門，两門額各书“北通巫峡”、“南极瀟湘”，游人可由两端石級而登。因此楼前余坪地，植树木、蒔花草，有石櫈供人憩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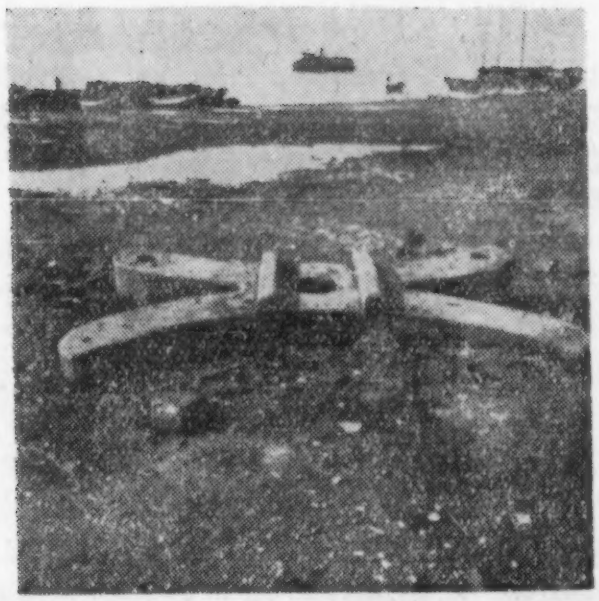
坪中置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大鉄鼎一，高2米余。两旁各置鉄桶，自名“鉄梢”，侈口，上徑寬94、下徑寬98厘米，高1.18米。下有三足，作云紋，两側有兽面銜环。銘文鑄：“宋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十二月吉日孟府十位鑄到鉄梢，一样二只，各重一千斤。”按县志記載：这对鉄梢原置于君山崇胜寺，不知何时移于楼前。

楼的中层和底层正中各有木刻字屏六幅，上刻清乾隆八年（1743年）名书家張照（字得天）所写宋范仲淹撰“岳阳楼記”，字写得很遒勁。楼右及后墙嵌有一些石碑，多是清代及以后的重修碑記和游覽詩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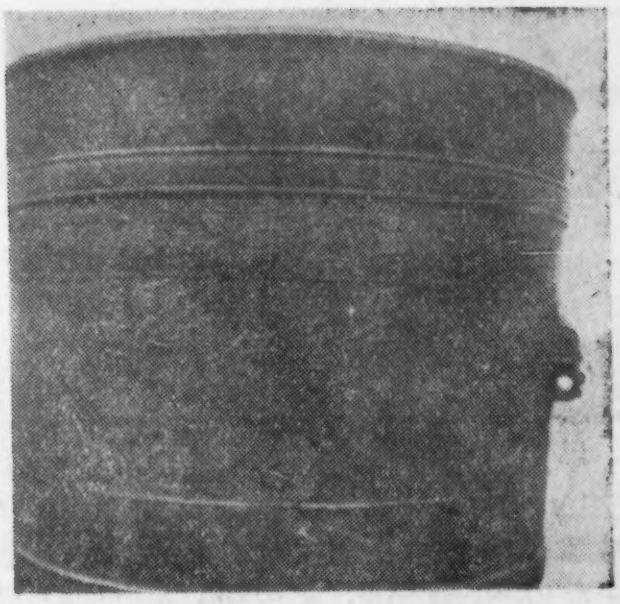
岳阳楼傳說历史很古：三国时吳将魯肃曾在此建閱兵楼，南北朝刘宋时詩人顏延之登巴陵（时称岳阳为巴陵郡）城楼詩有“清雰霽岳阳”句，宋范致明所写岳阳風土記載：“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中书令張說除守此州，每与才士登楼賦詩，自尔名著。”但張說的詩題只有“南楼”的名称，如他与赵冬曦登南楼詩“危楼泻洞湖，积水照城隅”，盖因楼在郡署的南方，所以称为南楼。从唐天宝、大历以来，如詩人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韓愈：“岳阳楼别竇司直”，白居易：“題岳阳楼”諸詩題；杜甫詩：“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才固定的用“岳阳楼”这一名称。

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巴陵守滕宗諒（号子京）重修岳阳楼，致书范仲淹請撰記文，原书中說：“岳阳楼不知俶落于何代何人，自有唐以来，文

岳阳楼正面



岳阳楼下古鉄械



岳阳楼前宋代"鉄掮"銘文

士編集中无不載其声討賦詠，与洞庭君山率相表里。"可見宋时已不詳楼的創始，因此范仲淹所写"岳阳楼記"，将四周景物，早、晚、晴、雨各种不同的感触，作了极細致动人的描写，而楼的沿革，却不詳叙述。他这篇膾炙人口的記文当时是請了大书家苏子美（名舜欽）书丹，大篆刻家邵竦篆額，并滕、范二人，"时称四絕"（見方輿胜覽）。明万历时王圻所写三才图会曾載楼的形制："岳阳楼其制三层，四面突軒、状如十字，面各二溜水。"但其間不知已經过若干次的修建了。

清以后的修建，多有文献可考，清順治、康熙时就經过两次火災，又經过大水冲击，乾隆、道光时都經过修葺，同治六年（1867年）楼与三醉、仙梅两亭都經过大的修葺，三醉亭旧名望仙亭，继改斗姆閣，此次修葺才改今名。清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因楼基（即城墙）拆裂，次年修建，据現存的碑記所載："乃于原基之后加筑六丈有余，建正楼于其上，……左仙梅亭、右三醉亭，皆視旧制有加，楼前雉堞亦加坚筑，以固吾圉。""庚辰正月开始，十二月告成。"为时一年，可見工程不小。以后虽有过修整，但楼与三醉亭可能还是那时的規模，只是仙梅亭內扶梯等，可能是在"民国"时有些改变，

解放后，湖南省文化局曾于1955年撥款进行修整，并由县派干部予以管理，后因楼基拆裂多处，又于1957年秋撥款筑好基址，綠化环境，把古老的楼閣，換上了漂亮的新装，但按修整古建筑的原則，不曾变更結构原式。从此飽經災难的岳阳楼，将永远以豪迈的雄姿，迎接前来游憩的劳动人民。

附带还要介紹一下岳阳楼的一种古文物：岳阳楼下有城門，直通后級，下到湖边，沙中有鉄械三个，各长3米余，厚約70厘米，重千余斤，中間各有大孔一，孔的直徑約30厘米，鉄质很坚韌，不生斑銹。据县志記載，共有五个，亦称鉄杻，現只发現三个。如此笨重的鉄器，作何用途？傳說不一，北宋时范致明所著岳阳風土記載："盖晋伐吳，吳人以鉄鎖横截之，或者此即植标系鎖之具。"这也是揣測之詞，但有力地証明了它至少在宋代以前就存在了。

（上接79頁）

唐摩銘摩刻在浯溪銘的左側崖石上，长2.5、高0.43米。篆书，其文自左而右。

宋黃庭坚浯溪題名并詩石刻，在大唐中兴頌左側，字奇偉可喜，后人称为小接崖。保存极完好。

此外宋、元、明、清的石刻甚多，使人有入"碑林"之感，琳琅滿目，应接不暇。浯溪濒临湘水，在鉄路、汽車路未修建以前，为通广西及越南的要道。在碑刻中有清代时越南使王有光郑怀德的詩碑，这可反映我国同越南在历史上的交往情形。清吳大澂的篆书碑刻尤多，其所篆书的浯溪銘石碑，1953年曾建亭其上，旁有傳为宋代的槐树一株。

东崖的石刻，在抗日战爭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在此修筑汽車路，大部分已被炸毁，使祖国文物，遭受到巨大的損失。現浯溪石刻摩崖古树等已列为省的文物保护单位并将建为公园，供人游覽休憩。

南　岳

湖南省博物館

南岳是中国的五岳之一，逶迤数百里，有“迴雁（衡阳市迴雁峰）为首，岳麓（长沙市岳麓山）为足”的諺語。但它的主峰，俱在衡山县境內。由衡山县城去南岳，約三十余里，乘坐汽車，半小时即可到达山麓的南岳鎮。

南岳有七十二峰，最大者五峰，即祝融、紫盖、云密（一作芙蓉）石廩、天柱等峰。以祝融峰为最高，約海拔1333米，紫盖、天柱等峰，海拔亦超过1000米以上。南岳鎮位于山麓小盆地上，海拔仅50米，由南岳鎮仰望祝融峰，更显出它的高大雄偉。

南岳因地势高峻，气溫常較平地为低，尤以半山亭以上为最，平地初雪，而山頂已厚冰累累了。宋庭坚南岳詩云：“才到初秋霜已降，每逢春尽雪方消，偎岩老衲針常把，度夏禪僧扇懶搖”。（全集未載，見明弘治衡山县志）这是南岳气候的最好写照，因夏天凉爽，是避暑的胜地，在解放以前，軍閥、官僚在半山亭、磨鏡台一带，建有不少的“别墅”，今已扩建修葺，改为招待所，成为人民共有的財产了。

历代的封建帝王，把祭祀南岳，作为重大的典礼。尙书上說：（舜）“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在汉以前，俱以衡山为南岳，到了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改祀南岳于今安徽的霍山，至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才又以衡山为南岳，自隋至清，俱沿而未改。

解放后，人民政府为了保护名胜古迹及其附屬的文物，曾撥款修葺了南岳大庙、福严寺等处的建筑物，修筑了上山馬路，由南岳鎮到半山亭、磨鏡台可通汽車，培植風景林，并在絡絲潭上的华严湖，建修了一座南岳水庫。

南岳的名胜古迹甚多，石刻与寺庙建筑，較有历史及艺术价值的，亦复不少，茲擇要簡介于下：

南岳大庙。庙在南岳鎮，坐北朝南，后枕赤帝峰，前有寿澗环繞。始建于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6年），名眞君祠。宋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元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58年）、明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均經重建，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庙毁于火，現存的建筑物，为清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所重建，黃瓦紅墻，飞閣流丹，极为宏偉壮丽。

全庙的平面，約作长方形，长約417米，前段寬約154米，后段寬約193米。首为櫺星門，左右有东西便門。次为正南門，門楼上的建筑物，于抗日战爭时期，为美帝飞机所炸毁，左右有东西川門。又次为嘉应門，門側树立有不少明、清两代祭祀南岳的“御祭碑”，左右有东西角門。再次为御书楼，楼后为广闊的大坪，墁以平整的石面，正殿即巍然矗立于坪的末端。最后为寝殿。

庙的总体布置，正殿建立于高大的石台上，为建筑群的主体，两側建筑物，左右对称。在中軸綫上的建筑，除寝殿、正殿、御书楼外，在嘉应門与正南門之間有御碑亭，亭作八角形，重楼歇山頂，亭內树立有高大的清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重修碑記，碑石色黝黑而光潤，碑趺雕刻頗精。在正南門与櫺星門之間有奎星楼（一名蟠龙亭），楼作四方形，为演戏的戏台，藻井下所刻的蟠龙，极为精美。上层周檐五层，施一斗三升斗栱。門額横石枋上，刻有“砌工衡阳何长桂”、“木工衡山丁秀庄”、石工长沙徐长卿”，“水工衡山宾仁七”等工人的姓名。

南岳大庙石栏板上的浮雕

南嶽大庙

两側的建筑物，东有四观一殿及钟楼，西有“六寺月門”、忠靖王殿、关圣殿、观音閣及鼓楼等。寝殿的两側，东为轄神祠，西为注生宫。正殿前的两側，各有廊屋五十余間，現东側的廊屋，作为南岳博物館的古文物陈列室，陈列有历代的陶、瓷、玉、石、銅器等及明清和近代的字画。

正殿建于高大的石台上，台前有石雕蟠龙，两側有石級，台周及石阶的外側，俱以祁阳白石作栏干，栏板上浮雕花鳥、走兽等紋飾。台的轉角处，飾石雕螭首，用以排除台面的雨水。殿基长35.13、寬54米，而闊七間，殿为重檐歇山頂，布黄色琉璃瓦，上檐下施如意斗栱，横枋及門隔，俱浮雕人物故事或花鳥，朱漆彩繪，金碧輝煌。殿高七丈二尺，內外共用柱七十二根，柱最大直徑約1米，柱的下段，为湖南著名的麻石制成，上段則为巨木，并飾以舞凤，展翅长鳴，奕奕如生。据傳說殿的高度及柱的数目，是作为南岳七十二峰的象征。殿中的岳神神座，系由巨大的祁阳白石砌成，雕鏤极精，正面及两側所浮雕的云龙、舞凤等紋飾，尤具匠心，有独特的風格。

正殿为南岳大庙建筑群的主体，在設計、建筑技巧、雕刻等方面，都是劳动人民的精心杰构。

南岳大庙，因它有悠久的历史，故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和雕刻艺术品。較重要的有五代时楚王馬殷供献的大鉄盆，直徑1.4、高0.7、边寬0.11米，口緣內鑄有“楚王舍南岳司天王庙永充供养”的銘文。現置于正殿前的廊檐下。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的鉄钟，螭紐，高約2米，鑄有“大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甲子冬十月吉日鑄鎮缶洪钟一，重九千斤”及“湘潭州人易仲富捐鑄”等字样，悬挂于奎星楼东側钟楼內的木架上。还有明崇禎时鑄造的銅佛，趺作于蓮花座上，佛高1.8、蓮座高0.72米。今供奉于寝殿左上方。明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桂王鑄献的鉄炉，高約3米，下有三兽面足，置于大殿石台下的大坪內。碑刻有明詹濂书的唐李白衡山詩石碑，文为：“衡山詩，唐李白。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回飈吹散五峰雪，往往飞花入洞庭。大明万历十五年二月朔新安詹濂书”，此外尚有明成化九年(公元1465年）商輅撰的重修岳庙碑、弘治十年(公元1497年）的“御祭碑”等。

大庙后为接龙桥。由此沿上山馬路，經絡絲潭发电站、南岳水庫、华严湖、玉版桥、忠烈祠、延寿亭等处，而达半山亭。由南岳鎮上山至祝融峰共三十里，至此約十五里，故名半山亭，有玄都观建于丛林中。由半山亭以上，山势陡峻，經紫竹林、鄴侯书院、寿福殿、鉄佛寺、五岳殿、南天門至上封寺。上封寺旧名光天观，隋大业(公元605—616年)中，始改为寺，屡經兴廢，仅存后殿及后楼为清代重建，原大殿前两側，有明嘉靖时的鉄鑄天王象四尊，高与人等，威猛武勇，可看出明代塑像艺术的成就。

上封寺附近有獅子岩、观音岩、罗汉洞、会仙桥、望日台等胜迹。

望日台在上封寺后山頂，建有石壁鉄瓦的小屋，名望日亭，东側有石栏干。台为元世祖时所創立，是当时全国二十七个測驗所之一(讀文献通考象緯考：“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詔立海內測驗所，凡二十有七”。又元史天文志：“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衡岳北极，出地二十五度。）当晴天无云的清晨，从望日台东望，可以看到日出的奇景。

过上封寺約半里，即为祝融峰，此为南岳最高处。

明万历（公元1573—1620年）时，始于祝融峰頂建祠，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建老圣殿（又名祝融殿），光緒时又加重修，其所布鉄瓦，

鉄盆　五代

現尙存乾隆、光緒等年号。

由半山亭沿上山馬路向西，經麻姑桥至磨鏡台，有唐怀让禪师墓，磨鏡台即因怀让的磨磚，何能成鏡的偈語而得名。磨鏡台附近，有“祖源”二字石刻。招待所亦建于此处，古树参天，風景极为清幽。西去二十余里，可达方广寺。

方广寺，在蓮花峰（一名双髻峰）下，始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数經修葺重建，明崇禎間，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夫之（人称为船山先生），为反抗清代的統治，曾避居在这里，与堵允錫等将方广寺复加修建，并著有蓮花峰志五卷。

望日亭

王夫之于明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避居于蓮花峰下的黑紗潭（俗呼为黑龙潭）畔，明年，建“續寮菴”以居，永历二年（清順治五年，公元1648年）曾在衡山領导人民起义抗清，失敗后，遂由桂阳渡岭赴肇庆，到永历十二年(公元1658年)又回到“續寮菴”居住，現其住宅已毁，无遺迹可寻。

方广寺，風景极佳，“方广之深”，为南岳四絕之一，但以地僻，游人很少。寺內尙存有宋代的鉄鈡等文物。

福严寺，距磨鏡台約一里，在擲鉢峰下，依山建筑，占地約二亩有余。寺为六朝陈大光二年（公元568年)創建，初名般若寺，又称般若台。現寺为清代重建。山門有“天下法院”四字横額。过殿內供有銅岳神象一尊，高3.3米，垂毓执圭。据南岳志引黃庭坚南行录說：“福严寺在南岳，依岩架空为之，蓋思公道場，有三生塔、有岳神銅像”。可証当为宋以前的遺物。正殿內供有銅佛象三尊，中高1.2米，左右各高1.9米（带蓮座），鑄制甚精。

寺右有古銀杏一株，枝叶繁茂，大可数人合抱。寺后尙有唐李泌书的“极高明”石刻等古迹。

从福严寺沿山而下，有三生塔、南台寺、白龙潭、黃庭观等名胜。

祝圣寺，在南岳鎭东街，距南岳大庙仅半里，为南岳較大的寺观之一。唐代創建，初名弥陀台，后名般舟道場，旋改名大业寺。現建筑物为清康熙时建，原为备康熙南巡的行宫，故規模頗大，占地約三亩有余，后遂改名为祝圣寺，寺內讲經堂的左右壁上，嵌有五百罗汉像石刻，頗精美。

水帘洞，在南岳鎭东北八里，清时曾建有“雪浪亭”。水帘洞附近的峭壁上，有唐、宋石刻甚多，左山壁刻有“南岳第一泉。咸淳庚午，李义山书，住持王如壁上石”。“鎭岳飞天法輪。張孝祥謹书”宋張孝祥号干湖，官粤西經略，又常知潭州)。还有明正德及清代題字。

解放十年来，南岳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历史意义及艺术价值的建筑物，都加以修葺，并建筑了不少疗养院和学校，今后并拟扩大培植風景林，建筑馬路，使它成为劳动人民游覽的胜地。

(上接70頁)

孔”。另一件窑鉢底部，粘有青釉碗的口緣部份。从遺痕来看，可以說明当时的燒造方法是把瓷坯放于窑鉢內，再把窑鉢相叠，放置碗內。窑托有两种，一为圜形，一为圓圈形，下俱有凸起的掙釘三顆。圓圈形的窑托，直徑較大，一般約为10—13厘米，可能系置于壶底用的。圜形窑托較小，似为燒碗之用。

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的发現，对研究湖南陶瓷发展是极重要的資料。它的造型精美，釉色匀潤，繪画雅致，彩釉和諧，且大部份的彩繪俱为釉下彩，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現，証实了我国釉下彩的发明不是始于宋代，而早在唐代就能燒造了。

湖南在唐代最有名的瓷器为岳州窑，长沙瓦渣坪所燒造的青瓷及彩繪瓷器，当为岳州窑的系統（瓦渣坪与唐代岳州轄境，仅相距十余里)，这对研究我国南方青瓷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实物資料，并提出了新的綫索。岳州窑的燒制地点，不仅限于当时岳州的轄境內，其邻近地区，亦能燒制最著名的青瓷器。

陆羽茶經謂岳州窑次于婺州窑，今从瓦渣坪采集的瓷片来看，釉色潤澤，彩繪及印花，丰富多彩，实不亚于越窑，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問題。

“楚公豪戈”辨伪

于省吾　姚孝遂

“文物”1959年第12期博物館藏品栏內載有高至喜同志的“楚公豪戈”一文，对“楚公豪戈”作了詳細的介紹。据說这件戈是湖南省博物館从廢銅中拣选出来的，現藏于湖南省博物館。据文中关于“楚公豪戈”的描叙以及所附的图片看来，我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件贋品。其理由如下：

一、这件所謂“楚公豪戈”，其銘文“楚公豪秉戈”五字，自左而右，繞列于“內”上。其中“秉戈”二字，尤其是“戈”字，在納柲之后，势必为夹柲所掩。凡戈类銘文的部位适当于納柲处者，其銘文必伪无疑。例如，“周金文存”卷六第四十頁之一的所謂“作盥右戈”，同卷第四十四頁之二的所謂“隧右戈”；又“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九第二十七頁之二的所謂“薛戈”，同卷第三十一頁之一的奇字戈，銘文都适当“內”上納柲处，均系作伪的一种显証。过去所著录的此类伪品甚多，在这里我們仅举出以上四例，其余的就不一一备列了。

二、就所謂“楚公豪戈”的形制而言，当屬商代，至迟也不可能晚于周初。而其銘文中則有“楚公豪”三字，这和“楚公豪钟”的“楚公豪”自是一人，字体也相同，其时代当屬于春秋。如果据郭沫若同志的考証，以“楚公豪”即“熊仪”，則充其量也不能早于西周末期。器的形制和銘文在时代上相距悬殊，这除了充分証明其为伪作以外，是沒有任何其它理由能够加以解釋的。

三、就其銘文的行款来說，是自“內”的左端繞行而右，像这样的銘文排列方法，在商末周初无“胡”的戈上，是从来所沒有过的。

四、商末周初的戈上，通常仅在“內”的末端有一两个字的銘文，其文字較多者，則是在“援”上鑄以“譜系”。春秋、战国的戈，或称“用戈”，或称“元用”，而这件所謂“楚公豪戈”，却称作“秉戈”，这显然是后世的語例。

五、凡商末周初无“胡”的戈，“援”上从沒有以銀块或銀斑为飾者。戎器上有鎏銀花紋的，都开始于春秋后期。而这件所謂“楚公豪戈”，是一种不带“胡”的，乃商末周初的形制。該文說：“戈面有黑色橢圓形斑块，大小不一，愈近鋒处愈小，每面有十四块。这种斑块，应是銀斑，因經久变黑。”在这类形制的戈上竟出現了銀飾，也是伪造的显証。

六、据文中所附图片，“內”上的穿孔距“援”甚近，这样就使得納柲的部位非常狭窄。同时，“援”的后端与“內”交接处呈現弧形，“內”上的穿孔作梭形，凡此种种，都与一般句兵的形制不符。因此，我們断定戈的本身也是伪造的。

总之，从銘文的部位、行款、語例的各种舛誤，以及器的形制和銘文之間在时代上的矛盾等加以推断，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肯定，“楚公豪戈”的銘文是伪造的。从戈本身的形制、銀飾来看，器物本身也当是伪制的。至于其作伪的来源，乃根据于“楚公豪钟”。傳世的“楚公豪钟”共有五件，其中有一件首先著录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識”（摹本），和“陶斋吉金录”（拓本），也是伪器。这一件伪钟的“豪”字与伪戈的“豪”字所从之“爪”都不显明，与眞器“豪”字的形体不符。所以我們认为，很可能伪钟和伪戈的制造都出于同一人之手。

我国古代的文物是非常宝貴的史料，我們必須加以珍視。但是，过去也有不少贋品杂糅其間，应該审愼地加以鉴别，作好辨伪存眞的工作。近年来在书刊上所介紹的旧文物中，就有一些是认伪为眞的。例如“人文杂志”1957年第3期所載的段紹嘉同志“师克盨盖考釋”一文中的师克盨盖銘文，系拼凑各器的銘文而作成者；又“人文杂志”1958年第2期所載的段紹嘉同志“商𤼈鼎介紹”一文中的“𤼈鼎”，其形制屬于西周中叶，而加上了商末周初的篆文，并且篆法也軟弱无力，可以看出其为伪造。可是迄今为止，犹未見有加以指正者。由于談到伪造的“楚公豪戈”所以順便在这里一并指出，无暇一一加以論辨了。

北京鲁迅博物館开展业务工作的几点体会

北京鲁迅博物館

北京鲁迅博物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陈列表現鲁迅在党領导下战斗的一生，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因此，博物館首先要不断充实陈列內容，提高陈列思想，爭取更多的观众，扩大宣傳教育效果。1959年我館修改和充实基本陈列的材料，如“鲁迅生平大事及著作年表”和“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鲁迅故居”的模型等，都是观众很喜爱的展品。

把展覽送上門去，送到工厂、矿山、学校和其他公共場所，是我們在1959年內的一項重点工作。这一年內，我們先后在頤和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永定門火車站、石景山、門头沟、北京棉紡織厂第一、二、三厂和北京大学等处举办流动展覽，让那些平时因为生产、工作、学习繁忙，不能来館参观的同志就便看到展覽。流动展覽是深受有关部門的重視和欢迎的，有的单位为了配合我們的流展，举行报告晚会，約我們去作有关鲁迅事迹的报告；有的工厂还組織工人座談参观以后的收获和感想。1959年在北京地区的观众达八十二万人次以上，超額完成計划百分之一百六十四。为了把流动展覽推向全国，1959年我們編制了十六套“鲁迅生平事迹”的流展图片，寄发到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由当地文化部門組織巡迴展出。如山东省博物館接到我們寄去的图片后，立即在济南展出，四十天以后，又派干部携带图片前往青島、濰坊、曲阜、烟台、泰安、淄博等地展出。从十个省、市、自治区的来信中，普遍反映图片很受观众欢迎。据不完全統計，参观这些流动展覽的观众約达四十万人次，一年来的事实証明，随着社会主义經济建設的飞跃发展，人民群众的文化要求也日益广泛和迫切；为人民所热爱的偉大文化战士鲁迅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事迹，对提高人民政治覚悟、激发人民工作热情和促进知識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起了积极的作用。广大的劳动人民，是需要各种有益的文化活动为他們服务的。我們应該更加努力工作滿足他們的这种需要。

我們在大抓展覽工作的同时，也抓紧了文物資料的征集、整理和科学研究工作，这两者之間是相互結合和促进的。1959年，我們征集到鲁迅手稿八十四种一百四十八頁，征购了鲁迅藏书付本約九百册。其中有些手稿是一經发現綫索就不厌其煩地追寻到底，一直找到青海才找到的。关于資料的研究和整理，1959年我們編輯出版了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三册）、鲁迅生平事迹（图片）和“北京鲁迅博物館”等三种。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介紹了鲁迅一生收藏的全部中、外文书籍和我館收存和調查了解的全部鲁迅手迹，是一部研究鲁迅的重要的目录性的資料，出版后有計划地供应給全国文化学术事业单位应用。鲁迅生平事迹图片是一套輕便的可供展覽和教学之用的挂图。“北京鲁迅博物館”介紹了我館建立的經过、館藏文物和陈列內容（包括鲁迅故居），是受到观众喜爱的小册子。此外，我們还清理了全部鲁迅藏书、鲁迅手迹和他的各种遺物，做到了类别清楚，数目确实，取閱方便，保管妥当。对各兄弟博物館、研究单位和出版单位，发揚协作精神，供应了大量的資料。

我館在1959年取得这些成績，是在上級党的領导下，政治挂帅，坚决反右傾，鼓干勁，貫彻了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結果，同时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貫彻了博物館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針，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和群众路綫；加强了工作人員的时事政策、政治理論学习和思想教育。

我們在貫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針上，对于普及和提高相結合，展覽和研究相結合，作好基本陈列和大搞流动展覽相結合，自力钻研和爭取外援相結合等問題，都給予了重視。在提高工作人員的政治思想水平上，坚持每周在一定时間內学习，随时解决思想問題。同志們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热情都很飽滿，能够积极地去做好工作。特别是对于干部下放劳动鍛炼，使同志們的政治立場和思想感情都起了不小的变化，工作情緒稳定了，責任心加强了，干勁增大了，批評和自我批評較前开展了；不少青年同志还紛紛申請入党入团。

我們覚得在工作中，不断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及时克服右傾保守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在迎接建国十周年的偉大节日时，提出把年度計划的主要工作爭取在第三季度以前完成。同志們为此鼓足了干勁，不計較工作时間，自願放棄节日假日，日夜加班，紧張突击。当各項工作将要按計划胜利完成的时候，一部份同志产生了“差不多”和“松一口气”的思想，这时正值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召开，領导上及时批判了右傾松勁情緒，并且提出新的工作指标，我們继續鼓足了干勁和掀起更大跃进的工作热潮。此外，我們开展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运动，也給工作带来了許多新气象。我們有信心在新的更大跃进的1960年，在党的領导下取得更多的成績。

瓷·器·浅·說(續)

馮 先 銘

三、嘉靖一朝四十五年間，青花瓷器始終盛燒不衰，时間既长，产量又很大，我們仅从浮梁县志卷五物产志里的不完全統計材料，知道自嘉靖八年至三十八年的三十一年当中，景德鎮御窑厂专为宫廷燒制了六十多万件瓷器。因之流傳下来的瓷器很多，其中青花瓷器占的比重最大，其数量仅次于宣德时期。

在这一段較长的时間里，它一方面继承了前一时期的傳統，同时也有不少新的創造，出現了很多新的造型和装飾花紋，这些新的因素的出現，形成了嘉靖时期青花瓷器的独特風格。

这时期瓷器在造型方面，除承继宣德、成化时期的优秀傳統外，在原有基础上有了很多演变，葫芦瓶就是其中之一。宣德时期葫芦瓶較小，和植物中的葫芦形态大小都基本上相同，嘉靖时演变很大，瓶体庞大，形状也与宣德时截然不同，实际上已成为一种象征吉祥的陈設品。瓶有三种形式，一种为

1. 万历青花花鳥草虫大瓶

2. 万历青花人物大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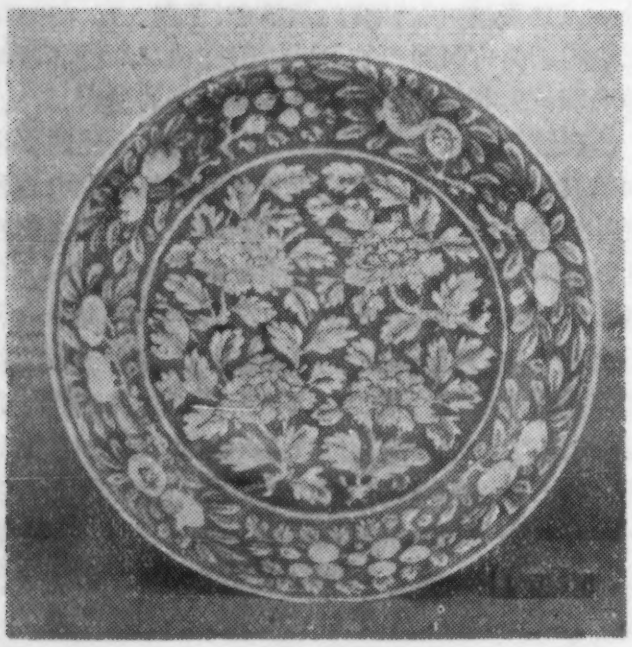
上下两节都做圓形，腰部极短，口直而短，圈足；一种为上节长圓而下节做方形，腰部較长，口較长，上窄而下寬，平底；另一种与第二种上节相同，下节圓形而平底。三种瓶高度都在50厘米以上。执壶的形式也有很大变化，它不同于前期的玉壶春式壶身，演变为頸部稍长，肩部与底部都稍收斂，圈足高而微外撇的形状。最大不同点为壶腹部做扁形，这一点是嘉靖执壶独有的風格(封三图1)。另外，还出現了仿古銅器形燒制的出戟尊和双耳活环瓶，钟形碗、方斗形杯和方形盖罐等等新的造型。

在装飾花紋方面，嘉靖青花瓷器最常見的要以云鶴紋为最多，它經常出現在瓶的腹部、盘中心及碗外等主要部分上，往往在几只翱翔的白鶴之間衬托以卍形云紋，做为器皿的主要装飾(封三图2)。八仙庆寿附以八卦和寿字，也是常用的題材，多見于比較大型的瓶、罐上面。魚藻紋虽然在元和明初青花瓷器上早已出現，但运用得远不如嘉靖青花瓷器普遍，它由前期的单画一条鯽魚演变到画鯖、鮐、鯉、鯽四种魚，在瓶、罐或盘、碗的四面各画一魚，互相对称，空間衬以浮萍、水草、蓮花等紋，魚体肥大。嘉靖时纓絡紋开始在瓶、碗一类器皿上出現。此外，云龙、云凤、龙凤、花間行龙和凤穿花等等傳統花紋还大量的被采用，但笔調及風格都不及前期活潑有力。

在民間日常使用的青花瓷器方面，傳世品以小碗最多，这种碗在明代坟墓中时有出土，以江苏震

泽县东山一带出土的最多。青花碗为明墓中常見的陪葬品，数目从几件到十多件不等。因为它出于墓中，一般称为圹碗。青花圹碗在明代早期墓中虽有出土，但还不是普遍的現象。正德时期墓中出土比前期为多，最普遍的是見于嘉靖万历时期墓葬。这种青花碗都是民間日常生活中的用品，有浓厚的民間風格，装飾花紋不像官窑那样讲究对称，画意也不似官窑那样拘謹。封三图3牧牛碗是嘉靖时期民窑青花瓷器中一件代表作品，画面上牧童牵拉肥壮的水牛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水牛側身扭首，绳子被扯成一条直綫，构成极为动人的一幅画图。封三图4鷺鷥蓮花碗的构图也很成熟，題材虽然在前一时期的作品里已經出現过，但这件碗上面出現的画面与过去不同，画师們用深色画蓮花水草与浮萍，花草間点綴几只姿态不同的鷺鷥，有的飞翔，有的昂首长鳴，有的低首啄魚，鷺鷥用淡描法，只勾勒輪廓綫与主要部分，这种处理手法看后使人对画上的白鷺鷥产生十分鮮明的印象。这种处理手法是一种創举，突破了当时的傳統做法。

隆庆时期較短，傳世青花瓷器远較明代各期为少，从絕大部分傳世品看，盘、碗所占比重稍大，其次是各种形式的盖盒，有銀錠式，有方胜式，有长方式和多角式多种，这几种盖盒的形式是以前各期所沒有的，可以說是隆庆时期开始出現的新品种。提梁壶也是这时期新品种之一，它是由嘉靖时的执壶蜕变而来，这个变化便利了提携，以后在万历及清代前期沿襲了很久一直不衰。这时期的装飾花紋仍沿用龙凤、魚藻、花鳥、团螭等題材，画稿也多因襲嘉靖，新的內容較少。



3. 万历藍地白花花果盘

4. 万历青花花卉松兽大盘

万历为明代历时最久的一朝，傳世青花瓷器的数量与嘉靖时期相仿佛。造型方面很多品种都按照嘉靖青花瓷器形式燒制，像双耳活环瓶、出戟尊、圓捧盒等等，如不从款識或花紋上去識别就很容易混淆。图1大瓶是万历时期新品种之一，在青花和五彩瓷器中这种大瓶比較常見，由于瓶口很像蒜头，俗称这种瓶为蒜头瓶。梅瓶的形式与嘉靖时沒有变化，仍然是丰肩斂足。梅瓶本来都有盖，而傳世品中絕大多数都失去了盖，定陵发掘品中有带盖大梅瓶两对，这是极为难得的。多层套盒也是这时新創品种，盒几层叠套，每层一屉，每屉由数格組成不同形状花紋，里面可放果品。

在装飾方面，云鶴、纓絡紋还經常做为器物的主要装飾。在大瓶和大罐一类器物上，人物故事画較多。一向做为瓶身下部装飾的蓮花瓣紋，这时已趋向于簡单和图案化。图2梅瓶下部蓮花瓣紋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花卉草虫題材这时期被广泛的运用到瓷器上去，在蒜头瓶等大件瓶子上面常常描繪着花卉山石，其間点綴着蜻蜓、螞蚱、蜜蜂、蝴蝶等等草虫。图3藍地白花盘是件别致作品，青花瓷器本来是白地画藍花的，而这件剛好相反，它以藍色作地，托出白色花果来，别具風格。这种大胆的嚐試在元代青花瓷器中已經出現过，但是在明代早期、

中期这种画法又复失傳，宣德时期虽然也有藍地白葡萄大盘和藍地白魚藻盘，但做法与使用的青料以及燒后所得效果都不相同。图3这种盘也有填彩的，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殘盘，盘中心四朵花及盘边果子填深淺紅黃彩，叶子都填以綠彩。

民間青花瓷碗花卉紋飾最多，嬰戏題材也常見，碗外一周画十数儿童做不同游戏姿态，形象极生动。此外有为专銷南洋一带而燒制的青花瓷器，封三图5是适合当地需用的水瓶（旧称軍持，寄归傳里有"軍持有二，甓瓦者凈用，銅鉄者浊用"語）。瓶具有我国青花瓷器特点，而乳头状的流又带有外来風格。图4大盘也是这时期大量暢銷南洋一带的瓷器，这种大盘在新加坡雷佛士博物館里收藏得很多，在柔佛也发現了无数殘片注，这些，都是我国瓷器远銷南洋的实物例証。

四、天启崇禎时期青花瓷器傳世最少，而带款識的尤不多見。正由于这个原因，对于认識这两个时期的青花瓷器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多年来，一直籠統的把这时期器物划入了明末清初的范疇，天启崇禎时期的瓷器因而成为研究上的空白点。近些年发現了几件带款識的器物，研究陶瓷的人从比照分析中找到了一些規律，解决了一些問題。故宫博物院陶瓷館陈列出四件带天启款識的青花瓷器，也为研究这一时期青花瓷器提供了一些材料。这四件瓷器造型各不相同，装飾花紋也不一样，其中一件为人物山水盘，盘底楷书"天启年制"四字款識。图5

5. 天启元年青花龙鶴双耳尊

6. 崇禎十二年青花人物凈水碗

双龙耳尊，器身上下五組花紋，頸部两側凸雕双龙形耳，龙耳装飾在明代青花瓷器中是很少見的。腹部三面各繪一团龙，另一面青花书写信士弟子祈求用語，末行书"皇明天启元年孟秋月谷旦立"十二字。封三图6龙紐钟，器身繪十八罗汉，肩部划刻"天启元年孟夏月造"八字。另一件是带"天启年米石隐制"款識的方瓶（参見陶瓷选輯第二輯图），这件瓶是傳世天启青花器物中造型最美的一件，色調淡雅，花紋細致工整。此外还有一件殘瓶，也是信士弟子施舍的供器，末行书"龙飞天启元年仲夏月吉日立"十二字。广州市博物館陶瓷专室里陈列着一件带天启三年款識的青花大香炉。这几件器物青花色調不同，甚至三件带天启元年款識的器物色調也不一样，这告訴我們，仅用一个色調来概括一个时期的瓷器是不恰当的。

崇禎青花瓷器带款識的比天启为少，故宫博物院陶瓷館陈列了一件崇禎八年青花香炉（封三图17）炉的三足已演变到炉身上，作为一种装飾，龙头有了很大变化。图6是中国历史博物館陈列的一件带崇禎十二年款識的凈水碗，色調与所繪蕉叶都很接近康熙时期的風格。1944年出版的"华瓷"里有一件带崇禎二年款識的青花炉，炉形及花紋都与图封三图7几全相同。两件炉色調花紋与凈水碗之間却很难找出它們的共同点，因此对崇禎时期青花瓷器的特点还須寻找出更多的实物来作进一步的探討。

注　参考韓槐準先生"柔佛河流域发見有款識之我国殘瓷"一文，見新加坡中国学会1953年年刊。

文物工作報導

北京市

天坛公园內出土一对銅壺

1959年末，北京市政三公司在天坛公园的北部二道坛門以西，挖沟埋設自来水管时，在挖下一米多深处，出土銅壺一对。这对銅壺很像用一个范模鑄成，平底圈足，大腹短頸，削肩直口，两耳作兽面銜环，連足高36、口徑12、腹的圓徑80厘米。由于銅壺出土以后很久。文化局才获訊，出土情形已不了解，只从挖出銅壺的工人口中得知，这两件銅壺是在一处比較松軟土中并排的埋着，沒发現其他文物。估計出土銅壺的地方可能是一个墓葬。从壺的形制看，可能是秦汉时代的。（王汉彥）

銅　壺

河北省

曲周县东風渠发現宋代遺址

去年11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邯鄲专区东風渠曲周地段調查了古代遺址一处。該遺址位于曲周县东南三十五里，安寨付西。从渠岸所暴露的遺迹看，面积南北长約200米，文化层陆續不断，薄厚不匀，一般多在2—3米左右，灰土內常常夹有燒土、炭屑等。根据当地民工反映，过去在挖土时常发現瓷片，在一处灰土底下还发現过一片平鋪的磚地，可能是当时的房基。这次調查中搜集到宋代白釉黑花双魚瓷碗和青釉瓷碗各一件，明代青花小瓷瓶二件。因此推測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到明代时仍未廢棄的宋代以来的居住遺址。

另外，在曲周县附近还搜集到一件完整的宋代白釉黑花瓷罈一件，从花紋和造型看，当屬河北省观台窑的产品。

（李德云）

白釉黑花瓷罈　宋

岳城水庫英烈村西周遺址試掘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岳城水庫上潘汪村2号遺址发掘的同时，又在漳河南岸英烈村东約50米处发現了一处面积約14万平方米的古代遺址。为了对这个遺址进行全面了解，1959年12月在遺址北部进行了試掘，共开探沟三条，面积85平方米，获得較完整遺物四十八件。玆报导如下：

从所开探沟地层看，只有一层文化层，上部顏色較灰，下部灰黃，土质坚硬。出土遺物有折頸、寬沿、上有弦紋及绳紋的圓足陶鬲、淺盘、束腰上有凸棱的圈足陶豆、折肩圜底陶盆、陶紡輪，扁平长方穿孔石刀、蚌鐮、蚌刀、蚌鋸、骨錐、骨鏃、骨笄等。遺迹只有灰坑一种，共十三个，皆为圓形和橢圓形，口小底大，最深的只有2米余，有的灰坑口上还有圓形小灶，火口在上口，火門在坑壁。灰坑与灰坑之間虽有打破关系，但遺物很少，从仅有的一些陶器看无区别，因此說明在时間上是不会相隔很远的。

从出土遺物和灰坑形制看，这个遺址与上潘汪村2号遺址西周层完全相同，从而說明在漳河两岸西周文化遺存还是相当丰富的。另外，試掘前在該遺址其它地面还采集到斂口紅陶缽，与上潘汪村仰韶层出土的相似，深盘磨光黑陶豆与邯鄲澗沟村殷代早期层的豆略同。这个現象說明这个遺址的本身并不是很单純的。（罗　平）

陝西省

陝西省成立名胜古迹整修委員会

陝西省有很多名胜古迹和革命紀念物，解放后几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視和支持下，絕大部分已得到整理和修繕，并得到妥善的保护。1959年12月31日省人民委員会第十七次会議通过成立"陝西省名胜古迹整修委員会"，計划对全省名胜古迹有計划、有系統的进行整頓、修繕和保护。

省名胜古迹整修委員会由省人民委員会領导，其主要任务是負責名胜古迹的調查、研究、保护、整理、修繕以及規划、設計、經費开支、材料供应、督促檢查工作等。委員会的主任由陝西省付省长时逸云同志担任，付主任有

楊曉初、苏資琛、武伯綸。

經委員会初步确定重点整修单位有：渭南县的华山、玉泉院和华岳庙；西安市的南五台、翠华山、杜公祠、牛头寺、水陆菴、老洞和上悟眞寺；临潼华清池；延安县的革命紀念物和万花山、青凉山、狄青牢、少陵寺；榆林的青云山、雄山寺、扶苏墓；銅川市耀县药王山；鄠厓县楼观台；留坝張良庙；沔县武侯祠；乾县乾陵的整理和发掘；城固县張騫墓；韓城县司馬迁墓；凤翔东湖；汉中市飲馬池和汉台；商县蓮湖；邠县大佛寺；黃陵县黃帝陵；米脂县白云山等。以上工程拟在第二个五年計划內进行整修。1960年先整修南五台、华清池、华山等。

省人委指示，上述这些重点整修单位的县（市），亦应相应的成立名胜古迹整修委員会，由县（市）人民委員会領导，在业务上受省名胜古迹整修委員会指导。（王翰章）

江苏省

苏州市文管会在廢品回收运动中抢救文物

苏州市在1959年12月中旬，发动了一次爱国卫生廢品回收突击运动，苏州市文管会，配合了这次运动，进行了一次从廢品中檢选文物工作，在前后一星期的时間，共撿选出各种图书杂志一万余册，其中有价值的有1925年出版的"响导周报"、原刻"康熙字典"等；古銅器有一百余件，內中有西周时代百乳銅簋、战国时代銅劍，唐代銅鏡等；古代画有五十余幅，內中有明代文征明字幅、清代陈鵬年詩字卷、清代翁同龢信札等。这次檢选工作，能够有这样成績，是与发动群众、人人政治挂帅、个个动手分不开的，而且檢选的同时还进行了一次广泛的爱护文物人人有責的宣傳。（錢鏞）

百乳銅簋

福建省

閩侯县的宋代陶千佛宝塔

閩侯县城門公社下洋乡梁厝村的龙瑞寺內，有两座陶制的"千佛宝塔"。塔平面八角形，素面紫褐色釉，边寬2米，塔座分为上、中、下三层，底层作八角圭脚，中层叠扁平石板，上层为琉璃座，座每面浮雕獅子，每角有菩薩一尊。再上层为蓮花座和栏杆。塔身四面設佛龕，龕內置一尊坐佛。龕外两側各有二十八尊坐佛。在东南面一块磚上刻着造塔題記。从左塔的塔的題記可以知道塔造于北宋元丰五年。右面的建造时間从題記看，也是元丰五年。塔簷下施斗栱，轉角斗栱系五鋪作双抄偷心造，要头砍法如下昂，每面又置补間鋪作一朵。簷角反翹上置坐佛。塔現存高度为6米，一——九层的外观結构基本相同。

（林登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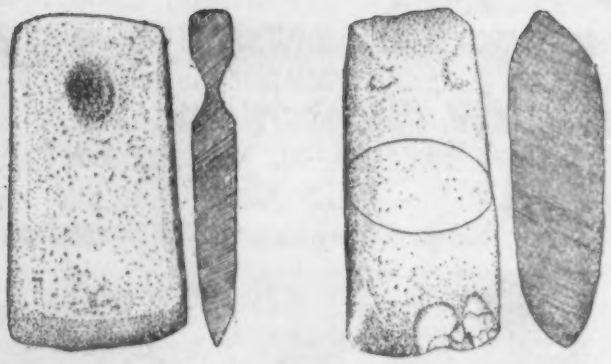
千佛宝塔

山东省

惠民专区几处古代文化遺址

惠民专区位于魯北，共十五个县，十个县在黃河以北，五个县居黃河以南。1956年冬至1957年春，山东文管处派人协助該专区开展文物普查工作，調查了几处較有价值的遺址，現将所得材料簡介如下：

1. 惠民专区示意图



濱县臥佛台遺址扁平带孔斧(左)、两端有刃斧(右)

一、濱县臥佛台遺址　位于城內十字北街，是1954年发現的，当时仅采集了几块黑陶片。遺址除被晚期墓葬破坏外，还在中心从东至西被挖了一条防空洞。現台高2—2.5米，周圍約170米左右，露出灰土、紅燒土、各种陶片和一些晚期遺物。采集和搜集到的有石器和一些薄而光的黑陶片、細泥紅陶片、加沙灰陶片等。

石器有长方扁平带孔斧一件，孔由两面钻，未穿透，长14.5，寬6.5，厚1.5厘米。厚刃斧两件，一件体圓若柱，一件体扁平，两端有刃，下端刃寬而磨光，上端刃窄而粗糙，这种石斧很少見到。箭鏃一，扁平，中有脊，后鋒鈍角收作圓錐銍。

黑陶片中有带凸弦紋，腹有横鼻（已殘）的大型圈足器殘片一；带横鼻及子口的殘片一，細泥紅陶片多素面磨光，辨不出器形。

器足有黑陶側三角双根单尖足；加沙灰陶凸尖錐足，和凹鈍尖錐鬲足等。还有一些未加工的鹿角。

从以上器物、陶片等来看，这个遺址与山东各地龙山文化遺址中常見的器形相同。

二、兰家村遺址　位于濱县城西二十五里胡家乡兰家村东南，西距徒駭河約四里，以前黃河和徒駭河泛濫，遺址常被淹沒，遺址程高于周圍的耕地，范圍甚难估計，仅知在兰家村西半里的胡家村也出土过同期器物。

遺址地表有大量的灰陶绳紋鬲足和陶片，从群众中收集到的有銅器五件，陶器七件。

銅器有：

（1）卣一件，圈足和口沿部分各有夔紋等細致的花紋一周，在盖上有雷紋和三角紋，鋬形提梁，通高20、腹徑8.5厘米。

（2）觚二件，一件飾饕餮紋，有觚稜，通高29、口徑16厘米；一件飾云雷紋，无觚稜，通高28.7，口徑15.4厘米。

（3）爵二件，腹飾饕餮紋，一件通高20厘米；另一件花紋精細，通高19.5厘米。

陶器：除鬲为加沙粗灰陶，手制外，余皆为細泥灰陶，輪制。

（1）鬲一件，近平口，唇外折，腹至襠飾绳紋，頸，足素面，足粗較矮，通高15、口徑12.5厘米。

（2）簋一件，大口，折唇，唇下、腹下段和圈足上皆飾弦紋。

（3）豆二件，一件豆盘較深，圈足粗，稍高，手制，周身有明显的刮削痕，通高15、口徑17.5，足徑11厘米。与輝县琉璃3式豆相近；一件豆盘較淺，圈足，較矮，輪制，規整，在圈足中間有平行弦紋两周，通高11.5，口徑13.5，足徑9.5厘米，与輝县琉璃閣1式豆相近。

罐一件，小口高頸，平底，頸部飾平行凸弦紋三周，頸、腹部各飾凹弦紋一周。通高15.5、口徑10.5、腹徑17、底徑7.6厘米。

尊形器二件，敞口。一件近直腹，下部內收作圜底，底下附高圈足，腹、足相接处有手捏痕，似为后加的，通高18.3、口徑19.3、足高6.2、徑10厘米；一件底殘，腹中部內收，下部外凸再內收作圜底，从殘存足看，亦为圈足，唇下及腹中、下部各有平行凸弦紋二周，在腹下部弦紋的一面有平列的五个圓圈紋，殘高17、口徑21.5厘米。

据群众說，以前还出土过石斧、銅戈等，但早已散失。

根据上述器物特征，这个遺址大概屬于殷代末期。

三、济阳遺址，位于城西十八里平坟(棚)店西南半里的隆起高地上，西南半里是蔗家村，东二里有小陈家村。敌伪时期遺址上曾筑碉堡、挖战壕，遺到严重破坏。从表面看去，高地上呈灰色，与四周之黃色土截然不同，灰土层厚約40厘米。

采集到的有殘石鏃一件，与現代鏃的式样差不多。还有細泥紅陶和黑陶，加沙或細泥的灰陶片。紅陶有绳紋和

陶卣　兰家村出土

觚　兰家村出土

陶甗　兰家村出土

豆　兰家村出土

陶尊　兰家村出土

条紋。紅、黑陶片多素面磨光，质地坚硬。加沙灰陶中有高矮不同的鬲足和各种器物上的口沿。黑陶片为輪制，有旋痕，有的表里皆黑，有光澤；有的表黑色里灰，磨光，一般厚度在0.5厘米左右。紅陶片中能看出器形的有五片，鉢形器口壁，与仰韶文化中的鉢相同，手制，表里磨光，削痕显明，虽未着彩，但凡鉢形器口和腹壁的顏色不同，有的上部紅色，下部呈紫色，有的口沿黑色，下部为紫色，內中也有一片全为紅色的。

四、淮里庄遺址，在城西25里淮里庄西南角，西南和南面距張家村和寺前刘家村皆里許，据說原系一大土台，上面寺庙建筑，現为耕地，常出土陶器。遺址能看出的范圍南北約70、东南約60米，土色灰褐。

在这里采集到有灰、紅色陶片，紋飾多绳紋和条紋，也有許多绳紋加沙灰陶的空心鬲足，蚌片很多，其中一片是有使用痕迹明显的蚌刀，呈长方形，稍殘。

五、刘家台遺址，位于城东北40里刘家台村西端，遺址高于四周耕地。从断崖上可看出灰土层內有灰、紅色陶片，紋飾有绳紋和条紋，有鬲足和兽骨等遺物。

六、曹家村遺址，在城西北60里的曹家村南里許的一块稍高于耕地的地方，北距紅庙約三里，范圍南北約40、东西約27米左右，灰土层明显。有加沙或細泥的灰、紅色陶片，紋飾多绳紋、划紋，看出器形的有鬲足和器物的口沿、器壁殘片很多。

七、广饒遺址，在城东18里的刘集区东营村西北角，北面5里有溜河，土台的周圍約300米左右，該遺址破坏甚重，早年台上曾筑有庙宇，現上面有瓜窖及若干晚期墓葬，严重的破坏遺址。

遺址上暴露有灰土、紅燒土，遍地全是加沙或細泥的灰、紅陶片，紋飾多粗、細绳紋，方格紋和条紋等。还有許多兽骨、蚌片等遺物。采集到的有較矮的鬲足，也有鬲襠和口沿及平底等，在細泥灰陶中还有一种細绳紋較規則的罐的腹壁。群众挖出的器物多被砸碎，仅存一骨枪头，扁平，不甚鋒利，后端有插柲的銎，长15、寬3、厚2、銎长3、徑1.8厘米。这种形式还是比較罕見的。

八、鄒平县化庄遺址，位于城西南34里，东临东河，西有西河，北面平原，遺址就在一个三角形的大形梯田上。

遺址的周圍約1600米左右，在断崖上可看到灰土和紅燒土，采集有陶片五十一片，其中有紅陶四十二片、灰陶九片，大部为素面，其次有绳紋、附加堆紋二片。紅陶多加沙素面，鬲片最多，有的只能看出一个尖状的鬲足口、襠等，也有几个不知器形的、上粗下細的柱足。細泥灰陶片中有細高的豆柄，淺而規則的豆、盘等。石器共二件，一件是当場采集的寬刃厚斧，体形較小；一件为李升山先生捐献的，在斧的上半部有凹槽，这种石斧是比較少見的一种。

九、在惠民专区沿海一带的霑化县楊家庄子附近徒駭河旁；无棣县的盐場附近；广饒县引黃灌溉工程区都发現了許多盔形器遺址。当地群众叫这种器为"盔头"，器平口，唇微外折，自口向下，收成尖底，器身遍布紐绳紋，高25、口徑20、壁厚3厘米。数量很多，遍地皆是，在遺址的陶片中約占90%以上。霑化楊家庄子徒駭河附近的遺址，省文管处为配合治河工程曾試掘一次，开五方，所得資料較为丰富，和这种盔形器共存的还有鬲等，大抵屬东周。

惠民专区的考古工作过去較其他地区作得少，經过这次全省性的文物普查，惠民专区和其他专区一样，发現很多文物。

濱县城內臥佛台遺址，据所得器物的特征，其文化性质比較容易确定，面积虽不太大，但在黃河以北的惠民专区还是第一处；兰家村遺址，采集遺物不多，搜集到的很丰富，器物的形制、花紋都是殷代比較常見的东西，这个遺址面积大，保存完整，在山东地区像这样遺址发現的还不多；济阳县、淮里庄、刘家台和曹家村等遺址，所采集到的遺物較少，文化性质不太明确。特别是济阳县遺址的

"将軍盔"形器　广饒出土

情况尤为复杂，采集的黑陶片不多，特征不明显，石器仅一件，有較高的鬲足，估計时代不会晚过商周。这个遺址所采集的鉢片，在河南、山西，陕西的仰韶文化中常見，但在山东的古文化遺址中却很少。这遺址与仰韶文化有无关系，值得再进一步調查研究。

沿海一带霑化、无棣、广饒等地出土很多盔形器，这种东西在昌濰专区沿海地区的濰县、寿光等地也有发現，它的用途，因为試掘所得資料尙未整理出来，沒得出結論，不过从現在所得遺物遺迹来看，可能与当时煮盐有关，但这也仅是一个設想，是否正确尙待以后进行发掘研究。

（王思礼）

江苏 宜兴会元状元坊

江苏宜兴县城內文庙前，聳立着一座秀丽的石坊，高近10米。它的平面呈〈形，在結构上較一字形牌坊大大增强了稳定性。面闊三間，明間突起，上复歇山頂。斜向的两次間斜作歇山頂，左右两側面呈一間，亦复歇山頂。各屋頂高低錯落，纵横陈置。

整座石坊雕有各种装飾，正面明間上层大額枋浮雕有五鶴翱翔在蒼海上空；陡匾阴刻"会元状元"四字。下层大額枋綫刻錦地，其上浮雕單龙；由額垫板与小額枋分别題刻"万历癸丑科会試第一名周延儒"、"万历癸丑科廷試第一甲第一名周延儒"；小額枋与龙門枋之間設一条卐字連續的透心雕花板；龙門枋上的高浮雕更加精丽，內容是四条行龙一条坐龙，隐現于白云之間。两次間的大小額枋分别淺浮雕牡丹与麟鳳；由額垫板上題刻立坊的官員职务姓名，下款为"皇明天启岁次丁卯孟秋谷旦立"（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背面浮雕与正面基本相同，但两次間小額枋的高浮雕双、单龙，更为精致。左右两側面上层大額枋淺浮雕翱翔双鶴，下层額枋淺浮雕二獅滚綉球、二夔龙。明

状元坊全景

間二柱夹杆石雕雌雄獅，雄獅腹背各有綉球一个，雌獅各有小獅一只，特别是胸前小獅，口啣錦带，后肢蹬在雌獅膝上，神态如生，柱头綫刻米字錦紋，复頂正脊透雕卷草，两端飾以鰲魚大吻。石坊雕刻周致，不放过任何細小的部分，如額枋的底面，檐下的大斗和枋子等等。

更少見的是石料全部选用汉白玉，皎洁的质地，衬着优美的造型，精巧的雕飾，更增强了艺术效果。（紀思）

状元坊正面明間雕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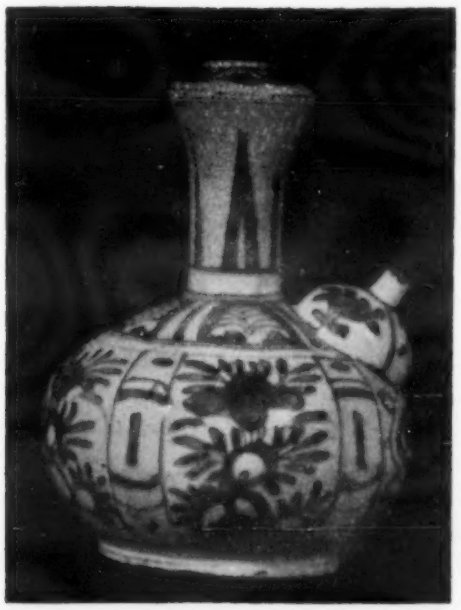
状元坊夹杆石雕刻

1. 嘉靖青花人物执壶

2. 嘉庆青花玉鹤盘

3. 嘉靖民窑青花牧牛碗

4. 嘉靖民窑青花鹭莲碗



5. 万历青花花卉水瓶

6. 天启元年龙紐钟

7. 崇禎八年青花云龙炉

新书預告

敦煌壁画（实物摄影）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图版230幅（彩色10幅） 10开 精装 33元

林逋詩卷（法书）

故宫博物院藏
宣紙珂罗版影印 8开 盒装 5元

元人画册（第二集）

故宫博物院藏
按原大彩色銅版精印 10幅 盒装 8元

元赵孟頫人騎图

故宫博物院藏
按原大彩色銅版精印 附題跋 4开 盒装 10元

梅清黄山图册

故宫博物院藏
胶印紙珂罗版影印 6开 平装 3元

天　坛（彩色图片）

銅版紙彩色胶印 46开 套装 0.50元

文物出版社出版　　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文物
（月刊）
第三期（总115号）
1960年3月8日

编辑者 文物編輯委員会
北京故宫内
电話4局1440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总发行处 北京市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定价每册0.50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1.50元
半年六期 3.00元
全年十二期 6.00元
平邮在内挂号費另加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邮局新聞稿件另寄堅付許可証第92号
本刊代号25-27